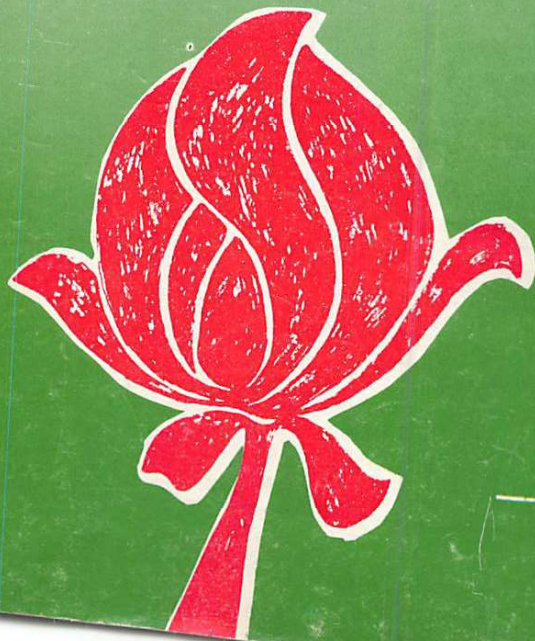


C H I N A S P R I N G

# 中國之春

總第二期



US\$2.50

一九八三年二月

總第二期

目 錄

民主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	本刊評論員	( 3 )
對一些問題的澄清與回答	李 林	( 5 )
<b>思想與理論</b>		
社會主義各國計劃經濟的比較	關宏微	( 9 )
“布拉格之春”告訴了人們什麼？	魯 楓	(17)
“李一哲”給後來人的幾點啟示	汪 岷	(17)
<b>讀者來信</b>		
來信摘編	本刊編輯	(27)
<b>爭鳴園地</b>		
王紹光同學來信	王紹光	(36)
答王紹光同學來信	李浩然	(37)
對中國之春的幾點意見	周正欣、李文通(國內)	(41)
中報不“中”	盧衡、曉達	(46)
中報大地震	轉載「華語快報」	(48)
<b>雜 文</b>		
胡總書記的諾言能夠兌現嗎？	歐陽平(國內)	(49)
野火燒不盡	「小草」編輯部(國內)	(51)
歷史的使命	一個新移民	(51)
孫中山的中國	仁 度	(52)
拿出良心，支援中國之春	阿修伯	(54)
小小的改動，大大的不同	一丁(香港)	(56)
死而後“已”	趙小青(國內)	(57)
<b>文 藝</b>		
他為什麼要申請政治避難？(報告文學)	木木(加拿大)	(60)
民運戰士之歌(詩歌)	聶 紫	(69)
<b>資 料</b>		
名譽編輯簡介(二)	本刊資料室	(70)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第一號公告		(73)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第二號公告		(74)
編後語		(封三)
人(銅版面)	汪 岷	(封四)

三年前，魏京生提出了五個現代化的口號，最後一個是民主政治的現代化。這最後一個，恰恰是最重要的一個。

提不提民主政治現代化，現在是，將來也是中國大陸問題上改革派和改良派的區別。

鄧小平的一個親信，共產黨中央負責人曾經這樣對王希哲說：「飯都吃不飽，還搞什麼民主？」這句話貌似有理，其實淺薄。

政治和經濟是相輔相成的，可以互相促進，也可以互相促退，硬是把它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就只能促退。吃飯和民主，不是一個先後問題。

美國的人權宣言不是先搞好經濟才有的。日本的明治維新，也不是有了電子計算機才產生。生產力的解放，不觸及到生產關係，經濟基礎的增長，不觸及政治思想領域，就象罩了緊箍帽的孫悟空，跳不出哪裏去。毛澤東死後的中國，經濟政策調整了又調整，始終邁不出大步子，原因就在此。要不要先吃飽飯？人人都說要。如何才能先吃飽飯？就得討論。一討論，就會涉及到思想制度，社會結構問題。接着，緊箍帽就來了。魏京生判了十五年，王希哲判了十四年。誰還要討論來着？不討論，又如何搞好經濟？

怎樣才能實現民主政治現代化？——必須改革思想、主義、社會體制。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些話毫無歷史根據。地球上人類存在了幾十萬年，有國家和制度的社會存在了幾千年。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才一百多年，毛澤東思想問世更短，幾十年。在這浩浩歷史長河中，充其量不過是一剎那，怎能說他們已經發現了人類社會的極終真理？怎麼就批不得，碰不得？批了碰了要殺頭？！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搞了七十年，「真正的馬列主義」中國搞了卅年，最最徹底的紅色越南、柬埔寨搞了幾年，一個個搞成這樣子，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優越在什麼地方？

因此，「四個堅持」論行不通。

什麼是民主政治現代化？從蹶復、康梁討論到今天，一百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衆說紛紛，各執一見，好不熱鬧，然而他們盡管舞文弄墨，政客們却自有主張。於是中國一日日地不

民主下去。

我們以為，不要光說，而要去做。怎樣去做？先做第一步：曰：開黨禁、開言禁，釋放政治犯。

何謂開黨禁？國家不能一黨專政，黨內不能一派專政，派內不能一人專政。

一人專政太危險。以反右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為例，千萬人頭落地，億萬人民遭殃，到頭來落得一句輕描淡寫的話：「他老了，病了，說錯了一些話。」要問，如果他遲遲不翹辮子，躺在病床上，說他個十、二十年信口開河的「最高指示」呢？整個中國不就完了嗎？

一派專政也不行。一伙人蛇鼠一窩，勾結一氣，「針插不進，水潑不入」，黨、政、軍一把抓，搞個天昏地暗，老百姓却蒙在鼓裏，被人當阿斗。大家都會記得林彪一伙逃上了天空的那天，全國在地下還在作「早請示，晚匯報」的祈禱：「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誰會想到一幫人全是壞蛋。

一黨專政可以了吧，中國共產黨是四千萬人的大黨，「光榮、偉大、正確的黨。」「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這個「最有組織、最有紀律、最有能力領導中國」的黨應該信得過。誰知開中央全會，一人表態，幾百個中央委員（包括什麼農民陳永貴，售貨員李素文）一齊舉手，一邊倒，一風吹，千萬黨員、億萬人民被「運動」得跑來跑去，然後齊齊立正，說是「站錯了隊，跟錯了人」了。這一錯不打緊，中國又落後了幾十年。

說來說去，一個那麼大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政治力量來均衡局面，這樣安全系數大一點。

在法律上應該明文規定：執政黨外可以有在野黨，（註：不是那些七老八十，凡「運動」一開始先送到監牢的「民主黨派」——我們稱之為花瓶黨），黨內允許有派，派裏那些敢於直言的人受法律保護。這樣中國的局面大概就不會這樣搖擺不定了。至少，有人要去按原子彈的按鈕，有人敢反對，有人能反對。中國人才能安心吃飯。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連毛澤東這樣專制的人，都會說一句門面話。今天在中國自認糾正了毛澤東專制錯誤的人，怎麼就不敢比毛走得更遠些，去開放

黨禁呢？！

何謂「開言禁」？——就是讓人說話。

讓人說話不是空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上當受騙的次數太多，我們要的是切實的法律保障。這種保障有四：

一、憲法上要明文規定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組黨、結社、示威游行、罷工罷課等等自由。把「四個堅持」從憲法上撤下來。黨章是黨章，國法是國法。黨章不能強加於國法。

二、法律上保障人權，一個文明國家只會有刑事犯，不能有思想犯和言論犯。一有思想言論犯，執政黨就可以亂捉人。

三、新聞獨立於政府。新聞獨立是人民在輿論上監督政府的最效辦法。

四、有一個新的保證言論自由的出版法。

以上這四點，是讓不讓人說話的試金石，真貨假貨，一試就知道。

在「釋放政治思想犯」的問題上，我們要

求釋放歷次政治運動中無辜迫害的人，我們特別強調要釋放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劉青、王希哲這樣的年輕人有什麼罪？無非就是講了幾句要民主的話而已，就得害他們一輩子？什麼叫做裏通外國罪？只要鄧小平願意，我們可以為他們打官司，海外延聘律師，回去對簿公庭。

我們認為，今天中國大陸上囚禁的政治思想犯，大都是西方人士稱之為「良心犯」的人，大都是「為民喉舌」，不釋放他們，不給予政治上的平反，大陸內人民重足而立，道路以目，無法談民主。

「萬事起頭難」。要走出民主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決不是容易的事。我們不求神，不拜佛，也不寄於什麼「鄧青天」或某某「青天」，我們寄希望於全體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寄希望於大陸民衆，台灣民衆，港澳和海外民衆，只要我們團結起來，從一點一滴做起，這一步一定會達到。■

本期“答王紹光同學信”漏校，錯字很多，茲更正如下：

- P35 (左) 第 11 行第 6 個字應為“僅”。
- P35 (右) 倒數 10 行第 3 個字應為“，”。
- P36 (左) 第 20 行行首增加一個“、”。
- P36 (右) 第 28 行起首應為“如果他們沒有生產剩餘價值”……。
- P36 (右) 倒數 11 行中刪去“(注)”。
- P37 (左) 第 4 行起首應為“此外，甚至在歷史上，不同性質的”……。
- P37 (左) 第 27 行倒數第 4 個字應為“倍”。
- P37 (右) 第 7 行倒數第 6 個字處應加一個字“和”。
- P38 (左) 第 11 行起首應為“人民群眾和保護官”……。
- P38 (左) 第 3 行末尾增加一個“：”。
- P38 (左) 倒數 27 行倒數第 2 個字處增加一個“要”。
- P38 (左) 倒數 14 行倒數第 7 個字應為“為”。
- P38 (右) 第 17 行第 4 個字應為“從”。
- P39 (左) 第 3 行第 6 個字應為“有”。
- P39 (左) 倒數 18 行倒數第 7 個字應為“習”。
- P39 (左) 倒數 6 行第 2 個字為“屑”。
- P39 (右) 倒數 23 行第 9 個字應為“熱”。
- P39 (右) 倒數 22 行倒數第 8 個字應為“運”。
- P39 (右) 倒數 16 行第一個字應為“和”。
- P40 (右) 第 3 行第 10 個字應為“風”。
- P40 (右) 第 24 行倒數第 2 個字處增加一個“能”。
- P40 (右) 第 31 行第 5 個字應為“摧”。
- P40 (右) 倒數第 5 行中間刪去“內容”二字。

# 對一些問題的澄清與回答

——李林

「中國之春」繼續舉起中國民運的大旗已有兩個月了。在這短短的幾十天中，我們收到了大量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書信和稿件。同時，海外的各種報刊雜誌也刊登出了許多有關「中國之春」的報導和文章。從這些來信來稿和報刊的文章裏，我們看到了廣大同胞對我們的熱情鼓勵、支持和希望；也看到了有少部份人對我們的運動還不太了解，因此存在着誤解或是持觀望懷疑的態度；另外，我們還看到有極個別懷有某種政治目的的人對我們的運動進行不負責任的粗暴攻擊和造謠。

廣大同胞對我們的支持和幫助，在精神和物質上給予了我們巨大的力量，使我們更加堅定了為國家和民族獻身的信心，同時也使我們更覺肩上責任擔子的重大而督促我們把民運工作做得更好。

至於少部份人對「中國之春」民運存在着某些誤解，說明我們的工作還做得不夠細和不好，也正是我們將來需努力的地方。對於存在的種種誤解，確實也需要做出清楚的解釋和澄清，使抱有懷疑態度觀點的人不再觀望。

對於向「中國之春」進行粗暴攻擊和惡毒造謠的文章或論點，必須堅決予以批駁，以正視聽。

綜上所述，我在此就人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做出解釋或回答：

## ——「中國之春」沒有人住過希爾頓——

首先還是從「中國之春」誕生時說起。由於「中國之春」是在希爾頓旅店第五二四號會議室裏的記者會上宣告誕生成立的，因此有些人幾家報刊便利用此事大做文章，硬說「中國之春」的人背景不簡單，因其下榻之處是曼哈頓中城區第一流的希爾頓大旅店。如上述講的是事實，那人們肯定會對「中國之春」民運打大問號的——如果沒有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強有力的經濟來源支持，「中國之春」的人又怎能住進屬一流豪華的希爾頓大旅店呢？既然說「中國之春」是由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發起的民主運動，那麼憑一個留學生每月幾百美元的生活費用能住得進希爾頓大旅店嗎？

然而，事實就是事實。「中國之春」沒有任何人在希爾頓大旅店裏住過。

租用會議室的費用，是由一位從中國來的自費留學生資助的。因他的經濟條件較好，所以在未定希爾頓之前兩天，他就曾先拿出五十元來資助。當定下希爾頓之後，他又拿出一百元來。租會議室用去一百五十元，加上稅兩元（由另外一位同志拿出。），一共一百五十二

元正。（見附件收據）

隨帶一提的是，由於希爾頓旅店這樣的地方是任何人都可以隨便自由地進出，也無須像國內進入北京飯店（或其它任何賓館飯店）那樣必須出示證件、填各種會客單，再加上詳細的盤問和先打電話去通知住在裏邊的人的查對。此外，希爾頓的大廳裏到處都是空閑的沙發、座椅、茶几和旅館內部的值班警衛人員，所以我們的其他一些同志也利用這樣一個無須任何花費而又安全的地方來與我們的朋友們見面和商談。例如，「百姓」半月刊的社長陸鏗先生和「北美日報」的總編輯陳婉婷女士，也就是在希爾頓旅店裏與「中國之春」的人見面討論一些問題的。

至於我們住的地方，除了在自己同志的住處裏「塞滿」之外，我們住過的旅店的最高價錢為二十元一間的住房，而且是一間住四人：兩人床上，兩人放下床墊睡地板。這一點，有許多到過我們住的地方的朋友們，都曾親眼看到過的。這些朋友中有教授、工程師、醫生、律師、會計師、記者、作家、報刊雜誌的編輯人員、商人、店員、港澳同胞、台灣同胞、老華僑、新移民、國內來的人、自費生留學生等等。其中有許多人就是在親眼見到我們艱苦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之後，便由原來對「中國之春」所持的懷疑觀望態度轉變為同情和支持，進而也有很多人參加「中國之春」投身於民主運動。（見附件旅館收據）

## ——捏造出來的「美國保安人員」——

使一些人感到懷疑的，是「中國之春」既然是稱為中國的民主運動，可怎麼又與美國當局聯繫上了呢？其根據是兩家報刊所報導的，當「中國之春」的發言人在希爾頓旅店舉行記者會時，曾有一位健碩的美國「保安人員」陪同。（注2）

在希爾頓旅店舉行記者招待會，並不等於就住在裏面，因為會議室與住房畢竟不是一回事。對這個簡單事實的分辨，那些動筆做文章的人還不至於搞不清楚吧！

我們之所以當初選用希爾頓旅店做為召開記者會的地方，是因為數名在新聞界任職的，同情和支持中國民運的朋友們向我們提出建議，說為了擴大影響讓更多的人知道「中國之春」的誕生，應該讓英文的西方報界的記者們來參加記者會。而根據他們的經驗，舉行記者會的地方，對西方記者來說，地方越是高級，就越認為重要。這一點，也正如某報自己所講的

那樣「在曼哈頓中城區一流的希爾頓酒店召開記者招待會，并非華人一貫的做法，那是美國政界經常會晤記者的地方。」（注1）

另一方面，我們之所以選希爾頓旅店的原因，是因為裏面旅館內部的值班警衛人員很多，危險程度也小。

因為記者會之前，我們連希爾頓旅店在什麼地方和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所以在記者會的前一天下午，才請一位支持民運的朋友的太太為我們通過電話預定了會議室。

這家報紙還無中生有地造謠說「據悉，王炳章已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保護。」（注3）。而更有趣的是一家平時與上述報紙是冤家死對頭經常互相攻擊罵戰不絕的報紙，竟也打破常規破天荒地引用了對頭的報紙的那一段話，來證明「中國之春」是受美國當局的操縱利用的。

那個所謂的「美國保安人員」是誰？「中國之春」是否是受美國政府的操縱和支持？還是讓事實來回答吧。

那個被人所描述得活靈活現的「美國保安人員」，事實上與美國政府之間沒有任何關係。講出來也許人們會為謠言的製造者們感到可悲和可笑。他的名字叫做馬克·喬頓（Mark Jordan），他的工作職務是希爾頓旅店裏專門負責安排出租會議室等方面事務的負責人（Account Executive）。（見附件喬頓先生的名片。）

舉行記者會的前一天下午，幫我們預訂會議室的那位朋友打電話給喬頓先生時，他還不太願意出租會議室給我們。他問在這個記者會上發佈的消息是否具有「爆炸性」；還問會不會引起騷動或危險。

記者會召開的當天上午，我們負責安排具體事務的同志在希爾頓旅店裏見到了喬頓先生。他還問及與前一天相同的問題和問記者會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我們的同志回答說，這個記者會是溫和的，不會有引起騷動或危險性的東西。至於具體內容，現在還不能講，呆會兒將在記者會上正式宣佈內容。喬頓先生聽後說「既是這樣我也就放心了，但是呆會兒開會時我還是要來會議室裏來看看以免出什麼問題，我對你們的這個記者會也感到很好奇。」當記者會開完後，他還豎起大拇指說：「你們是一批勇敢的年輕人，我很佩服你們的勇敢精神。」喬頓先生並說他非常高興地成為我們的朋友，并把他的名片給了我們。

任何報刊都應該對自己的讀者負責到底。我們希望有關報刊最好是派人到希爾頓旅店去做一次調查採訪。因開記者會的時候，那幾家「筆底生花」的報刊也派出了記者出席。所以，再派出同樣的記者到希爾頓旅店去見喬頓先生，就不會製造出「一個身強力壯的美國保安人員」這類欺騙讀者混蒙視聽的「神話」了。

與中央情報局（CIA）連得上嗎？

在某兩家報紙上發表的文章裏，有人稱「中國之春」為「美國之春」，并造謠說「中國之春」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一手操縱和控制的，請問這種說法的證據何在？對於動不動就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的大帽子扣在別人頭上的這種卑劣低下的做法，對廣大中國民衆來說，并不是一件剛創造發明出來的新鮮事。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在那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不知有多少無辜的同胞，被扣上「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的大帽子，而受盡迫害或冤死獄中。在那封建法西斯專政的年代中，就連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也不能幸免地被打成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而受盡人間折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知道那幾家以「左」或「中」字當頭的報刊對此作何感想？

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近一百多年以來，由於各帝國主義列強對（我們）祖國進行的無恥的侵略、干涉、顛覆、欺壓和掠奪而給我們國家和民族所帶來的深重災難。我們堅定不移地認為：中國的事情，是我們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絕對不能允許任何外國政府或勢力的插手和干涉！我們堅信：我們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來解決我們自己的事情！我們反對那種想依靠外國勢力或告洋狀來解決中國問題的做法！同時，我們也不贊成那種自己看不起自己，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力的自卑觀點！

#### ——無知和別有用心——

「中國之春」宣告誕生後，我們對外首先公佈了兩個與我們聯繫的郵政信箱的地址和號碼，其中一個在美國的信箱是在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郵局。想不到，就開設郵政信箱這件小事，也被一些人用來大做文章。如某報的文章就故弄玄虛地稱：「民運」的對象是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港台青年及華僑，但有關華人活動組織所租用的信箱，一般在華埠附近或上城區哥倫比亞大學郵區，而不會在沒有華人聚居的中城區的「洛克菲勒中心」郵局。（注4）

後來，有關在洛克菲勒中心設立郵政信箱一事，竟被越說越玄。這種故意造謠所產生的後果，也使得一些人上當受騙或是對「中國之春」產生了誤解。如從國內來美從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某著名人物，就曾在某大學的一次公開演講會上，說「中國之春」的辦公室是設在屬美國大財團所在地的洛克菲勒中心，因而對此提出質疑。

我們認為：如果真是分辨不清洛克菲勒中心郵局與洛克菲勒中心所屬的財團辦公地點，那是無知；或是道聽途說沒有調查研究就亂發言。以上兩種情形都情屬可原。但如果明明知道這簡單的事實而又要生拉活扯地捏造謊言，那就是屬於別有用心和欺騙民衆了。

在「中國之春」誕生之前的兩個星期，我們就在為開設通訊信箱之事而到處奔波了。有關報刊上所講的區域裏的郵局，我們都去聯繫

登記過。但郵局的答覆是沒有空的信箱，至少要等三個月或半年之久。甚至遠在皇后區的一些郵局，我們也去聯繫，但都需要等待。最後，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新近開始營業的郵局——這就是洛克菲勒中心郵局。由於是新「開張」的郵局，所以有空的信箱。但由於當時我們受經濟方面的限制，只能租用郵局裏面最小的信箱；並且一年二十元錢的租金當時我們還不能全部付出。這點也許有人不相信，但事實是我們至今也只是付了（十元）半年的租金。

在洛克菲勒中心郵局開設信箱，我們能開，別人也能開；美國人能開，中國人同樣也能開；富人能開，低收入的人也能開。這點並不以階級、出生、成份，或其它成份的東西來劃分或受到什麼特別的限制。所以，我們也希望有關報刊派出人員對此事專門調查研究一下，就會發覺專為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大做文章實在是有点愚蠢。

#### ——「中國之春」與台灣國民黨當局

沒有任何聯繫 ——

「中國之春」誕生兩個月以來，一些人最爲關心或議論較多的問題是「中國之春」與台灣國民黨當局有沒有聯繫？

我們早已公開的聲明「『中國之春』完全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並且，它獨立於國、共兩黨，不受美國、中共、國民黨的操縱和利用，任何方面想利用它都是辦不到的。」這個原則立場，「中國之春」過去是如此，現在也照樣如此，而且將來也決不會有所改變！

我們不僅與台灣的國民黨當局沒有任何聯繫，與在中國大陸的中共當局沒有任何聯繫，而且也與世界上任何政黨或政府沒有任何聯繫。

長期以來，有很多人就習慣以「左」或「右」來看待和分析一切問題，即不是受共產黨支持就是受國民黨的領導；不是親共就是親台；諸如此類等等。我們認爲：持這種觀點本身就是錯誤的。這也是使我們國家民族長期處於一種動亂和分裂狀態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們認爲：中國共產黨並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與此相似，國民黨也不能自稱代表着中國。中國是全中國人民的！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單單指望依靠國共兩黨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國問題的徹底解決，必須由全中國人民自己團結一道地來解決，而不能寄希望於哪一個人的「英明」；或是依靠哪個政黨的勢力強大或「開明」。這一點，歷史已經並將進一步做出公正的證實。

必須指出，一家不負責任的報紙，爲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竟刊登一篇謠言文章。該文造謠說「中國之春」的某成員，在「中國之春」誕生之前，曾秘密赴台灣與國民黨當局會晤」。（注5）。然而，「中國之春」的人在何時、從何地、用什麼方法去的台灣等問題，該

文却提不出一字的根據來。既然無任何根據，又爲何要憑空捏造？所幸的是，廣大海外同胞早已不是那樣容易地被人隨便欺騙的了。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實或是謊言，他們也是分辨得清楚的。所以，這條別有用心的謠言，根本沒有人相信！至今爲止，這無中生有的謠言也只有在那家報紙上才找得到。

今年一月六日，「中國之春」執行主編黃立在會見路透社駐紐約記者懷斯時（M. Wise）曾鄭重地聲明：「中國之春」是一個獨立的民主運動，它與台灣當局沒有任何聯繫。在我們看來，台灣有它自己的問題。（注6）有很多人十分關切地注視着「中國之春」是否會有人將訪問台灣。坦率地說，「中國之春」沒有任何人，也沒有任何計劃要訪問台灣。

值得人們深思的，是爲什麼會有那麼幾個別有用心的人和幾家報刊，要拼命地把「中國之春」與台灣的國民黨當局連在一起呢？他們這樣做的最終目的又是什麼？把「中國之春」與國民黨當局連在一起之後他們又能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好處？

我們奉勸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你們也太小看今天中國年輕的一代了！正如「中國之春」在發刊詞中所講的那樣：「我們這一代人，曾經在喪失理性的年代裏狂熱過，也曾在『傷痕』累累，萬馬齊喑的歲月中痛苦過、呻吟過、迷惘過……然而，我們這一代人有能力擺脫過去可怕的惡夢，有勇氣面對現在艱苦的鬭爭，也有信心開拓未來嶄新的大道。我們要反省、解剖自己的理性世界。我們要詰問、評判現存的價值體系。『中國之春』正是我們這一代人逐步成熟的標誌。」所以，正因爲過去慘痛的經驗教訓喚醒了我們，才使得我們今天不再盲目地輕信任何主義或思想；也不會幼稚或愚蠢到受任何政黨的操縱和利用。那些妄想以各種卑劣手段來扼殺中國年輕一代呼聲的人的陰謀鬼計，是注定要徹底失敗的！徹底變革中國現存的社會制度，爭取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是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歷史任務。而且，當今中國年輕的一代要改變中國現狀的決心和力量，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 歡迎批評意見 ——

兩個月來，許多關心中國民運的同胞給「中國之春」提出了大量好的建議，同時，也對我們工作中出現的缺點和處理具體事務中的不妥，提出了善意的批評。對此，我們表示衷心感謝。某些問題的出現，也有其客觀原因和當時的條件。现就幾個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

一、個人與運動的關係。很多朋友來信指出，應澄清個人與運動的關係。我們亦認爲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中國之春」誕生初期，我們在處理某些新聞問題上缺乏經驗，再加上西方新聞界以個人爲中心進行報導宣傳，使一些人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爲一種運動即是某個人，某個人就等於整個運動。在一些中間

，議論整個運動少，而議論個人事情多。應該強調指出，個人的事情應與整個運動分開；個人是個人，個人並不等於整個運動。個人的力量和智慧畢竟是有限的。實際上，參加「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各界人士中，絕大多數的人都在默默無聞地埋頭苦幹，這些無名戰士，是最值得我們尊敬的。

更何況中國民運的一些先鋒戰士如魏京生、王希哲、傅申奇、何求、劉青等一大批人現在還在專制制度的監獄裡遭受折磨。他們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真正的英雄。中國民主運動的成功，不能指望一、二個「救世主」（實際上也沒有什麼救世主），而只能靠全體中國人民自己的努力。

至于某些別有用心者妄圖以攻擊個人來抵毀、搞垮整個運動，也是絕對辦不到的。

二、加強我們自身的民主觀念。前一期間，無論是在刊物，還是在某些聲明和談話中，出現了一些不夠確切的提法。這些，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之所以未能避免乃由于工作倉促

而缺乏充分的討論。所以，加強我們編輯部內部的民主作風，是使我們少走彎路的重要保證。

三、努力提高刊物質量。我們第一期（即創刊號）是比較粗糙的，印刷錯誤很多，有些文章水準也不夠。我們虛心接受大家對刊物工作的批評。但我們也希望讀者諒解，我們的編輯們大都是學業繁重的留學生，利用業餘時間作雜誌編輯工作。而且，我們都是初學者，無編輯工作經驗。我們堅信，有大家的關懷和幫助，我們會逐步提高雜誌的水平。

注 1：見「美洲華僑日報」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二版文章。



注 2：同上報，第三版。

注 3：同上報，第三版。

注 4：同上報，第二版。

注 5：見「北美日報」八三年一月一日第八版。

注 6：見路透社八三年一月六日新聞稿（R 183，RI 0549 1ZQTRYZR）。

(附件二)		(附件三)			
<p>Rents be paid in advance at the office the day they are due.</p> <p>Notice of leaving must be given at the office 5 days before.</p> <p>Check Out Time 2 P.M.</p> <p>N Y. Tax <u>7.00</u></p> <p>Occ. Tax <u>19.30</u></p> <p>RECEIVED From <u>Wang</u></p> <p>\$ <u>240</u> Rent from <u>10-22-82</u> To <u>11-5-82</u></p> <p>Balance Due \$ _____ Room No. <u>723</u></p> <p>Date of Payment <u>10/24/82</u> Received by _____</p> <p><small>Please hold these receipts for future reference. Tenants will be held strictly responsible for any damages to rooms or furnishings. It is agreed that as a condition of the letting of this or these rooms, the tenant hereby releases the landlord from any and all liability by reason of loss or damage to any wearing apparel, goods, or merchandise, even though caused by the negligence of the landlord or its employees.</small></p> <p><small>Under Sanitary Code — No Animals Allowed.</small></p>	<p>FURNISHED APARTMENTS 1 and 2 Rooms</p> <p><b>RENT RECEIPT</b></p> <p><b>L 1022</b></p>	 <p><b>Mark Jordan</b> Account Executive</p> <p>THE NEW YORK HILTON at Rockefeller Center 1335 Avenue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New York 10019 212/484-3728 Telex NYHUR 238492</p>			
<p>FROM: <u>MARK JORDAN</u></p> <p><u>ACCOUNT EXECUTIVE</u></p> <p>1335 AVENUE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N.Y. 10019 (212) 586-7000</p>		<p></p> <p><b>THE NEW YORK HILTON</b> At Rockefeller Center</p> <p>Today's Date <u>11/17/82</u></p> <p>File Number <u>NF</u></p> <p>Definite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Tentative <input type="checkbox"/></p>			
CONFERENCE CENTER RESERVATION FORM					
<p>ORGANIZATION NAME <u>MR. WANG PIN-CHANG</u></p> <p>POST AS _____</p> <p>CONTACT _____</p> <p>ADDRESS _____ CITY <u>NEW YORK</u></p> <p>STATE <u>NEW YORK</u> ZIP _____ TELEPHONE _____</p> <p>PERSON IN CHARGE _____</p>					
SCHEDULE AND FACILITIES					
DAY/DATE	FUNCTION	ROOM	TIME	ATTENDANCE	RENTAL
<u>WEDNESDAY, NOVEMBER 17, 1982</u>					
	PRESS CONFERENCE	SUITE 524	3PM-5PM	25PP	\$150
				OCCUPANCY TAX	\$ 2
					\$152



# 社會主義各國計劃經濟體制的比較

## —關微宏—

本文的意圖旨在運用比較分析法，通盤考察幾個主要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系，及其各自的利弊得失，以便從中獲得某些啓迪，作為分析我國經濟制度的參考。在所涉及的幾種經濟模式中，作者無意肯定其中任何一種，以為可以照搬適用於中國。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或許中國需要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特殊模式。但認識別國，汲取它們的經驗或教訓，也會是有益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特別考慮到中國政治制度上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共性」這一點，就更是如此了。

許多經濟學家如美國的伯恩斯坦（M Bornstein）和波蘭的維克辛斯基（J Wilczyński）將「社會主義」各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劃歸為四類模式：(1)斯大林模式，(2)蘇聯模式（指一九六五年柯西金改革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3)匈牙利模式（指一九六八年匈牙利經濟改革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4)南斯拉夫模式。但是，另一位著名的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W Brus）却提出其不同的劃分。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布魯斯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只有兩種模式，即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模式。前者以蘇聯模式為代表，後者則以南斯拉夫模式為代表。自一九七九年起，布魯斯開始將「社會主義」各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劃為三類：蘇聯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匈牙利模式。在布魯斯看來，舊的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即斯大林模式）與一九六五年柯西金改革以來的蘇聯計劃體制的區別不大。此外，布魯斯還認為除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兩國，所有「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改革都是不成功的。其基本原因是這些改革既沒有觸動價格體系也沒有創立一個以市場供求關係為基礎的制度以擴大企業的自主權。

就目前而言，多數東歐國家的計劃經濟體系屬於蘇聯模式。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措施是一種介於匈牙利模式與南斯拉夫模式之間的「過渡模式」。北朝鮮，越南和老撾的經濟計劃體制是接近於斯大林模式，而古巴的經濟計劃體制却類似於蘇聯模式。

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是一個例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期間，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的翻版，雖然兩國的農村經濟體制有所不同。但是，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的「大躍進」期間和十年「文化革命」期間，中國却「獨創」了一個特殊的經濟模式——毛澤東模式。毛澤東死後，特別自一九七八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開始進行一系列經濟改革。然而，經濟改革只維持了一年左右並且沒有全面展開。從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起，中國政府開始以「經濟調整」為其基本的國民經濟戰略來取代經濟改革。「經濟調整」戰略的基本意圖是重新強調中央集權和指令性計劃對地方和企業的約束，因而其發展方向是趨向於蘇聯模式的。但是，在農業和外貿兩個領域，中國政府走得比斯大林死後的蘇聯政府遠得多。然而，因為中國政府在農業和外貿兩個領域的政策是與其「經濟調整」戰略和政治政策相悖的。其政策的穩定性和長期性是令人懷疑的。因此，在許多方面，這些政策是與蘇聯政府二十年代的「新經濟政策」頗為相似，並且也孕育着類似的矛盾：農業政策與工業政策相左，農業管理體制與工業管理體制相悖，農村自由市場與城市國營市場相衝突，相對「自由」的農業經濟與高度集中和計劃的工業經濟相抵觸，以及農業和外貿政策與整個政治形勢的發展相矛盾。因此，與「新經濟政策」相似，「經濟調整」戰略連同其農業和外貿政策還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經濟模式而帶有很大的過渡性和暫時性。其將來的進一步發展方向取決於其他經濟、政治以至某些國際因素的綜合。

最後，在越南軍隊入侵之前，「民主柬埔寨」的經濟計劃體制可以看作毛澤東式的一個絕妙的腳注，雖然前者在幾乎所有方面都表現得更為極端。

### （一）

「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計劃體制大致可劃分為下述各個層次：(1)中央計劃委員會（通常置於部長會議或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之下），(2)中央各部的計劃部門，(3)各加盟共和國或省

的計劃部門，(4)省或加盟共和國以下的地方政府的計劃部門，以及(5)企業。

中央的國民經濟計劃原則上由中央計劃委員會根據部長會議或國務院的有關經濟發展的戰略意圖制定。但是，不同的經濟計劃體制所制定的國民經濟計劃對地方或企業的經濟活動的制約和影響是不同的。例如，在斯大林模式或毛澤東模式之下，個別中央領導人的意圖直接決定國民經濟戰略和計劃制定的大方向。在這種情況下，計劃體制的決策權被高度集中在中央這一層次，其餘各層次必須無保留地執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計劃。因此，這種自上而下並高度集中的計劃直接控制着整個國民經濟的各個環節及其運轉。與此相反，在南斯拉夫模式之下，聯邦及加盟共和國二級計劃部門並不為地方及企業制定具體的計劃指標。各工業部和加盟共和國的經濟計劃對地方和企業沒有指令性的制約而只是提出某些客觀上的發展方向和建議。地方和企業的具體經濟決策制定並不受中央計劃體制的直接影響。

在一九六五年蘇聯柯西金改革前後，蘇聯經濟學界也有不少人撰文討論高度中央集權的指令性經濟計劃的弊病以及建立分權的經濟模式的必要性。但是，這些討論很少涉及真正的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企業自主權而只是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上兜圈子。柯西金改革的重點仍然是怎樣以物質刺激為手段來促使企業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的指令性經濟計劃指標。中央經濟計劃體制仍然是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核心。基層企業仍然無權根據市場的供求關係來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生產多少。

在匈牙利模式下，中央的經濟計劃體制仍然直接影響基層企業的決策。但是，中央計劃體制的這種影響與其說是指令性的，倒不如說是指導性和調節性的。國家更多地通過對財政、金融和物資分配政策而不是行政手段來引導企業作出符合國家的某些客觀經濟發展目標的決策。在匈牙利模式下，基層企業都將國家計劃體制下達的利潤指標視為最重要的決策因素。在匈牙利模式下，上下兩端（中央計劃委員會和基層企業）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扮演最積極的角色，而中間（中央各部和地方計劃部門）的權限和影響則被相對削弱。

#### (1) 信息匯集

不言而喻，世界上任何一種計劃經濟體制都有其統計和匯報制度以匯集有關社會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信息。在斯大林模式、毛澤東模式和蘇聯模式中，短期國民經濟計劃是年度計劃。中央計劃委員會一般在當年第一季

度通過國家統計局或類似機構匯集去年下半年的經濟統計數字並以此來具體制定當年的經濟計劃。其結果，每年第一季度的工業生產（特別是重工業生產）狀況總是不振作。許多企業通常消極地等待新的計劃的下達以及根據新計劃而分配的原料、燃料、材料、設備的到來。其二，因為在過渡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下并不存在市場機制，所以價格體制基本上是固定僵化的。它既不能直接反映市場的供求關係，也不能正確反映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或效率。因此，中央的經濟計劃的制定者們無法利用市場變動所提供的信息來制定和及時修正國民經濟計劃。第三，由於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計劃指標不僅是強制性的，而是幾乎是包羅萬象的，基層企業無法主動地根據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和自己生產情況的發展來制定和調整自己的決策。這樣，企業這一經濟單位在國民經濟活動中始終是被動的，甚至是消極的。第四，由於缺乏市場機制來制約企業的經濟活動，企業通常可以以各種手段向上虛報統計數字。其結果，中央計劃委員會甚至無法獲得正確的信息。這也是為什麼在這些模式下國民經濟計劃總是與現實的經濟生活相脫節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南斯拉夫模式下，大多數商品的價格是根據市場供求關係而自由浮動的。因此，國家統計局可以直接從市場獲得大致正確的反映社會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信息。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國家（聯邦或加盟共和國）計劃委員會可以制定出較為合理的指導性計劃並隨時以客觀經濟政策調節之。另一方面，企業也根據市場提供的直接信息並參考國家客觀計劃來制定自己的決策。

在匈牙利模式下，經濟信息是通過兩條渠道向中央匯集的。一是統計部門直接通過市場（價格彈性的市場）獲得信息。二是各基層企業和地方計劃部門仍然必須向中央匯報其活動情況。

#### (2) 計劃制定

自六十年代開初，蘇聯和多數東歐國家開始改進舊的斯大林模式的計劃制定方法。發展到今天，蘇聯模式的計劃制定方法在下述三點上是不同於舊的斯大林模式和毛澤東模式的。第一，新模式更注重數學方法的分析和運用電腦處理信息。第二，在新模式下，政治對經濟計劃制定的影響減小了。第三，在新模式下，經濟學家們對經濟計劃制定的發言權增強了。因此，新模式的計劃制定的發展方向是技術化、專門化和科學化。另一方面，與南斯拉夫模式和匈牙利模式相比較，蘇聯模式的一些基本

的弱點仍然沒有被克服。例如，計劃與市場相脫節；計劃制定體制仍然是高度集中的；計劃制定的基本方針仍然是實物平衡（因為沒有合理的價格體制為標準）；以及生產與消費之間沒有直接的，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聯繫。

### (3) 計劃年限的長度

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民經濟計劃分三類：短期式年度計劃，中期式年度計劃（一般為五、六、七年）和長期計劃（十年以至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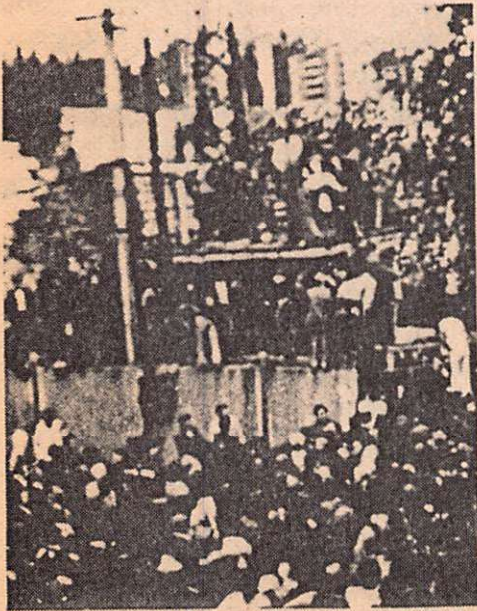
在斯大林模式和毛澤東模式下，年度計劃的實際作用要比中期計劃和長期計劃重要的多。中期計劃，特別是長期計劃從來也沒有被全部完成過。一般在執行計劃一年之後，國家就必須對中期計劃作很大修改。到第三年，整個中期計劃通常被改得面貌全非。造成這種計劃脫離現實的主要原因是：計劃制定不受市場機制制約；計劃本身過於龐雜，包羅萬象；制定計劃的基本出發點不是客觀現實而是個別領導人的主觀願望；以及靜態的經濟計劃因過度中央集權和缺乏市場機制而無法適應動態的經濟



A group of 10,000 Cubans demand political asylum elsewhere in the Americas after invading the Peruvian embassy compound in Havana in April 1980.



Soviet consumers crowd around a meat counter in Irkutsk. State subsidies keep the retail price of meat low in the Soviet Union.



Striking miners at Lupeni in Romania's Jiu Valley on August 1, 1977.



Part of a group of 3,000 Polish farmers that assembled in Warsaw on May 12, 1981, for the official registration of Rural Solidarity (Solidarność Wiejska).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r-Apr 1978



The invasion of Prague in August 1968 by Soviet and other Warsaw Pact forces—an event denounced by Austrian Communist Ernst Fischer as a case of Panzerkommunismus.

發展。

在蘇聯模式之下，雖然計劃制定的方法有所改進，上述情況沒有根本改變。

但是，匈牙利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却有所不同。在南斯拉夫模式下，因為企業享有較充分的自主權以決定自己的生產和銷售，國民經濟的年度計劃對企業的決策制定的影響則被相對削弱。另一方面，國家根據中期計劃和長期計劃對國民經濟發展所作的宏觀調節却更多地影響企業的決策制定。在匈牙利模式下，國家通過其年度經濟計劃對企業下達的最重要指標是利潤指標。大多數企業是根據市場供求關係而不是國家的指令性計劃來制定自己的具體決策。然而，與南斯拉夫模式不同，國家的年度計劃中包括更多的調節政策和措施以具體地引導企業的決策制定。

#### (4) 中期計劃

從表面上看，所有這些國家的中期國民經濟計劃都包括下述具體內容：社會積累與消費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各個經濟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比例；各個地區（省或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比例；大型的基本建設項目；一些重要產品的生產量；國家財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勞動力（技術和非技術）的分配；對外貿易和外匯使用的計劃；國家職工的工資增長水平和一般居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國家對社會文化、教育、科技和國防等非生產性項目的預算；等等。

但是，在南斯拉夫模式下，除了由國家興建一些大的項目之外，各企業有權自己決定其生產性投資的數額和方向並向銀行貸款。因此，國家對社會消費和積累的比例的控制是不嚴密的。其次，雖然中期國民經濟計劃中包括國家對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進行調整的政策，但因整個計劃體制對各地區企業並沒有很大的約束力，上述政策的實際效果並不顯著。第三，因為實際上真正在國民經濟中起決定性調節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各個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能經常處於協調狀態。

在匈牙利模式下，企業有權根據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生產多少。但是，除了留成利潤（一般用於增加職工福利和企業的技術改造），企業並不掌握財權。國家通過制定和執行中期經濟計劃來控制社會消費和積累的比例和社會擴大再生產的方向。在匈牙利模式下，中期計劃具體地規定了某些重要產品的增長率。但是國家並不直接給企業下達具體的指令性指標，而只是以某些經濟手段，如稅收、貸款和補貼等等，來引導企業實現中

期計劃的某些特定目標。

在斯大林模式、毛澤東模式和蘇聯模式下，中期經濟計劃通常是包羅萬象的。國家通過中期經濟計劃和年度經濟計劃對企業下達許多十分具體的指令性指標。尤其重要的是，雖然處於這些模式下的中期計劃通常為年度計劃的具體執行而打亂，但中期計劃仍然決定國家對大型基本建設的投資。與南斯拉夫模式和匈牙利模式不同，在此，中期經濟計劃還直接決定國家職工的工資水平和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

#### (5) 年度計劃

布魯斯指出，在匈牙利模式下，除了極少數重要產品（如關係到國防軍工的產品等），其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都不由國家的年度計劃作具體規定。國家對企業下達的最重要的指標只有一個：利潤指標。這一利潤指標是被置於一個靈活的價格體制和市場機制之上的。因而，年度計劃對企業並沒有很大的直接制約性而只是引導企業去達到國家所希望的某些特定目標。

在南斯拉夫模式下，中央聯邦計劃部門不對企業下達任何具體的生產指標，甚至不干涉企業所作的關於擴大再生產和投資的決定。各加盟共和國的計劃部門雖然比聯邦計劃部門更直接地影響企業決策（通過稅收和補貼），但也無權具體干涉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因而，無論在生產還是投資方面，聯邦和加盟共和國的年度計劃都對企業決策沒有制約性。

在斯大林模式、毛澤東模式和蘇聯模式下，中央計劃部門至少下達八項指令性指標給企業：產量、質量、品種、上交利潤、工資和獎金、能源原材料的消耗、技術革新和改造、勞動力和投資等。

如果把匈牙利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劃歸一類，而把斯大林模式、毛澤東模式和蘇聯模式劃為另一類，它們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對下述六個問題的回答：

(1) 企業有沒有自主權根據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來制定自己關於生產和投資的決策？

(2) 什麼是企業管理的核心或動力？是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下達的指令性計劃，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

(3) 有沒有靈活的價格波動來反映市場的供求關係（商品的量、質和品種）並推動企業之間的競爭？

(4) 企業能否自己作出有關擴大再生產和投資的決定？銀行系統是否獨立於計劃部門的控制之外？

(5) 生產資料是否為商品，或者還是由中央

計劃部門直接進行分配？什麼是分配資金、勞動力和其他資源的機制？

(6)怎樣決定分配？怎樣決定工資水平和獎金的多寡？是取決於中央計劃部門的政策（工資）和企業完成指令性計劃的狀況，還是取決於企業的盈利水平以及它自己關於消費和積累的決策？

這裏的關鍵問題在於計劃體系本身的性質，即究竟計劃體制是一個過度中央集權的，自上而下的並且與市場相脫節的體制；還是一個分權的、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以及自下而上的體制？計劃與企業的關係，是命令與服從命令的關係，還是引導與被引導但獨立的關係？

## (二)

(1)斯大林模式。現在，人們可以比較容易地發現斯大林模式的許多弱點。但是，這一模式有沒有其一定的歷史的「合理性」？換言之，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模式的建立有沒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並實際上在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是否完成了一定的歷史任務（當然，其代價是極高的），或者只是一個簡單的歷史誤會或歷史錯誤？

斯大林模式產生和建立於蘇聯的工業化過程之中。這一模式實際上採用下述六個主要措施完成了蘇聯的工業化：

(1)這一模式以國家強制手段來達到和保持一個很高的積累率。

(2)這一模式能最大限度地動員其人力資源來實現工業化。

(3)這一模式能有效地控制整個國家的自然資源。

(4)這一模式能以「集體化」和國家對市場的壟斷從農業中榨取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來加速其工業化進程。

(5)這一模式能壟斷整個對外貿易以保護脆弱的民族工業和國內市場免受國際資本的競爭。

(6)這一模式能將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壓到最低限度來加速其「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

在這一模式下，雖然沒有外援，但蘇聯還是迅速地完成了它的工業化。

另一方面，這一模式也有其根深蒂固的弊病。

(1)因為制定決策的權力和過程是高度集中的，也因為計劃制定和執行沒有受市場機制的限制，在這個模式下，計劃和決策的制定帶有極大的主觀隨意性。這種主觀隨意性常常導致

嚴重的經濟比例失調以至經濟危機。

(2)雖然這一模式能夠保持很高的積累率，但其投資效率却是很低的。計劃脫離現實，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粗放式的投資方式導致了嚴重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的浪費。

(3)在這個模式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發展很快。但是，輕工業和農工業却一直處於萎縮狀態。

(4)在這個模式下，由於指令性計劃指標對企業具有很大的強制性，企業的首創精神被壓抑到窒息的程度。全部企業活動被限制在完成指令性計劃指標，特別是完成產量指標這一點上。

(5)在這個模式下，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被控制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但是，官僚們，特別是一小撮高級官僚們，却享受着幾乎是無限制的特權。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三：第一，這一模式以追求「可能的」最高積累率為自己的目標。第二，在這一模式下，官僚們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壟斷是以其對社會政治權力的壟斷為基礎的。因而，官僚們可以憑藉國家機器強制地控制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在這個模式下，既不存在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即官僚們以「買主」身份壟斷了勞動力市場），也沒有類似西方國家的獨立的工會組織來保護就業者的利益。因此，這個模式所實行的工業化實際上是以犧牲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為前提的。

(6)在這一模式下，伴隨着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一個過度中央集權的，由國家官僚所壟斷和控制的經濟制度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

### (2)蘇聯模式

自從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開始，蘇聯和多數東歐國家都進行了不同形式和不同深度的經濟改革。不言而喻，某些政治條件的變遷（如斯大林去世，「非斯大林化」運動，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一九六八年的波蘭事件等）是導致上述經濟改革的重要原因。但是，從經濟上看，下述四個原因尤為重要：第一，五十年代末，上述各國基本上完成其工業化進程，並且開始其由粗放式經濟發展向約集化經濟發展的過渡。然而，舊的斯大林模式却不能適應這種變遷。第二，隨着「冷戰」的結束，上述各國於五十年代後期開始都逐步擺脫斯大林的「兩個平行市場」（即社會主義市場和資本主義市場）理論的束縛，擴大其與世界市場，特別是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往來。這種趨勢也要求它們改革其原有的僵化的經濟體制。第三，「非斯大林運動」和匈、波

事件的結果之一是上述各國的統治者意識到他們必須對人民作出某些經濟上的讓步。為此，他們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經濟改革。第四，五十年代末，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一場經濟衰退以至危機。這也是當局者們企圖進行經濟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進行什麼樣的改革或什麼程度上的改革，則要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內部和外部的經濟、政治條件。以蘇聯為例，至少有下列幾個原因使它不可能實行南斯拉夫式或匈牙利式的經濟改革：蘇聯政府內的保守力量遠較南、捷、匈三國為強。南、捷、匈三國與西方的經濟關係更為密切，所受影響也更深。蘇聯政府擔心自己的改革會促使東歐各國政府也加速它們的改革進程，從而加劇其對蘇聯的離心傾向。

與舊的斯大林模式相比較，改革後的蘇聯模式有下述一些改進：

①由於強調了統計系統的獨立性和運用電腦及其他科學方法來處理分析信息，其計劃制定方法有所改進。經濟比例長期失調的狀況有所改進。

②與以前相比，經濟政策和經濟增長要穩定得多。

③物價上漲指數不高並且其發展趨勢是可控制的。

④政府開始增加其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

⑤國民經濟增長較為穩定。

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發展迅速。

⑦新體制開始重視以物質刺激取代行政命令和政治控制來促使企業完成計劃指標。

⑧技術人員在企業中的地位得到加強。

另一方面，改革後的蘇聯模式仍然帶有許多致命的弱點：

①計劃制定仍然不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因此，計劃仍然帶有很大的「任意性」。

②價格體制仍然沒有彈性化，即仍然由中央計劃部門制定。商品價格仍然既不能反映市場供求關係又不能反映企業的效率。

③在改革後的蘇聯模式下，地方（特別是加盟共和國一級）獲得一些自主權。但是，這種分權措施的基礎既不是企業自主權也不是市場競爭。

④在這種模式下，工資制度和獎金政策仍然牢牢地控制在中央計劃部門手中。對企業管理人員和一般職工進行物質刺激的效果仍然非常有限。

⑤在這種模式下，因為既不存在企業自治也不存在企業職工的自我管理，企業內部的「

異化」現象仍然十分嚴重。

⑥因為計劃本身不受市場機制限制，也因為企業活動不是基於市場競爭之上，投資效率仍然很低，技術改造和運用進展不快，以及勞動生產率提高得不快。

⑦商品的國內價格仍然脫離世界市場價格。因此，新體制無法積極有效地擴大與西方國家的貿易來促進國內企業的技術改革和提高效率。

⑧經濟上的官僚特權體制並沒有被削弱，而只是被「技術化」了。

### (3)南斯拉夫模式

南斯拉夫模式誕生的過程說明了兩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第一，一定的國際條件可以決定性地影響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進程，深度和性質（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都可以視作反面例子）。第二，沒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改革為先導，任何經濟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決定性的突破。

總的說來，與蘇聯模式相比較，南斯拉夫模式具有下述優點：

①中央制定的國民經濟計劃對企業的決策只有參考意義而不是下達一系列指令性計劃指標去限制企業的活動。因此，企業能獨立地根據市場供求關係來決定它們應該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企業也具有很大的能動性去提高勞動生產率，改進技術和管理方法，以及降低成本和消耗。其結果，南斯拉夫模式下的企業的普遍效率要比蘇聯模式下的企業的普遍效率高。

②因為南斯拉夫模式的國民經濟計劃只是指導性的，所以它的貫徹和執行並不需要一整套龐大的和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此外，南斯拉夫模式下的企業自治制度和職工自我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官僚體制的發展。因此，與其他所有「社會主義」各國相比，南斯拉夫的官僚體制不那麼龐大。

③由於南斯拉夫的計劃部門基本上不控制市場價格，整個價格體制是彈性化的，即隨市場供求關係而上下波動。因此，企業之間可以進行相當程度的競爭，並以此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消耗，以及改進技術與管理。

④因為企業掌握了很大的自主權，因為國家計劃部門不制定具體的工資和獎金政策，並且因為市場機制能靈活地調節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的比例，所以與其他「社會主義」各國相比，南斯拉夫的平均生活水平是最高的。並且因為有了職工自我管理制度，官僚特權也受到相當限制。其結果，社會兩極分化（即

官僚特權相對於人民群眾的貧困)在南斯拉夫要比其他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緩和。

⑤南斯拉夫模式是完全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因此，企業能很容易地與外國公司發生貿易、金融和技術往來。因而，企業能更多地享受國際分工和國際間技術轉移的益處，並且更好地開展對外貿易。

另一方面，與蘇聯模式相比較，南斯拉夫模式也有其一些弱點：

①因為中央計劃部門的作用太弱，國家無力有效地解決區域間（或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

②因為南斯拉夫模式是完全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其受西方經濟的影響也大得多。所以，當西方經濟處於衰退之中時，南斯拉夫經濟也受到更大的衝擊。

③因為受西方經濟衰退和世界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也因為南斯拉夫計劃部門基本上不控制價格制定和調節，南斯拉夫的物價上漲率幾乎是蘇聯、東歐各國中最高的。

④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競爭型經濟模式不可避免地要帶來較高的失業率。例如，南斯拉夫近幾年來的失業率一直接近於百分之十（不包括她還有近百萬勞動力在西歐工作）。

⑤在原則上，南斯拉夫模式的中央計劃部門不控制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除了向國家付稅之外，各企業自己決定其積累與分配（工資、獎金和福利）。其結果，南斯拉夫的積累率是所有「社會主義」各國中最低的。這種過低的積累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技術結構的升級。

#### (4) 匈牙利模式

與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相比，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在抵抗蘇軍入侵時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共有二萬多人被殺害）。但是，慘重的犧牲也換來了克里姆林宮的某種不得已的讓步，並且給了後來的當權者一場深刻的教訓。與其他東歐各國（南斯拉夫除外）相比，匈牙利從克里姆林宮獲得大得多的自由以推行其經濟改革（雖然莫斯科從未放鬆其對匈牙利的政治控制）。對「匈牙利革命」之後的當權者來說，推行經濟改革以緩和官僚特權階級與人民之間的矛盾恐怕是唯一可行的「治國安邦」之道。但是，大部份研究匈牙利經濟改革的人們從未注意到產生這一改革的政治條件竟是二萬多人的生命與鮮血。

與蘇聯模式相比，匈牙利模式具有下述長處：

①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也就是說，不僅中央計劃部門依靠市場獲得基本的經濟信息，而且制定和執行國民經濟計劃的目的之一是促進和調節企業之間的競爭。尤其重要的是，因為市場與計劃之間的有機聯繫能自動地調整和修正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匈牙利模式下的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要比蘇聯模式下的農業和輕工業好得多。

②雖然中央計劃部門繼續控制着一些最重要產品的生產，但它下達給大多數企業的最重要指標是利潤指標。其結果，企業獲得了遠較在斯大林模式和蘇聯模式下為多的自由和權利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從本質上看，匈牙利模式不是一個指令性計劃體制，而是一個指導性的計劃體制。在這個體制下，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決策一分為二，中央計劃部門和企業。

③雖然中央計劃部門仍然控制着一小部份重要商品的價格，但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是彈性的。因此，市場機制有效地制約計劃的制定和企業的決策。

④雖然匈牙利模式包括了對外貿易計劃，但它仍然授權給企業直接與外商談判及簽約。因此，中央計劃部門並不壟斷地控制對外貿易，而是僅僅以金融、財政、關稅和國內稅收政策來引導和調節對外貿易。其結果，不僅企業獲得更大的能動性去發展對外貿易，而且它們在較蘇聯模式下更為靈活的外貿體制下具有更強的競爭能力。

另一方面，與南斯拉夫模式相比較，匈牙利模式也具有其一定的長處：

①在匈牙利模式下，企業可以直接從銀行貸款而無須上級管理部門的肯首（特別當貸款的目的是擴展企業的生產能力和改進技術時，更是如此）。但是，銀行系統是被中央計劃部門所控制的。特別重要的是，中央計劃部門和地方計劃部門掌握着對新企業和新項目進行投資的決策權。因此，它們可以有效地控制和調節社會積累和消費的比較以及平衡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

②中央計劃部門並沒有完全放棄其對價格的調節。此外，對外貿易仍然受中央計劃部門的指導和調節（通過經濟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因而，國內經濟發展和國內市場價格受世界市場的影響和衝擊相對弱一些；並且物價上漲也較為容易被控制。

③因為中央計劃部門仍然以其金融、財政和貿易政策來有效地影響和調節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因為中央計劃部門有能力採取一些經濟

措施來減緩世界市場對本國經濟的某些消極影響，所以匈牙利經濟發展要比南斯拉夫經濟發展穩定得多。

④在匈牙利模式下，企業之間的競爭並不是無限制的。恰恰相反，這種競爭是由中央計劃部門通過其各種經濟政策而加以引導和調節的。此外，中央和地方的計劃部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調節、訓練和安置因企業提高效率而產生的剩餘勞動力。因而，與南斯拉夫相比，匈牙利的失業率是很低的（僅為1%—2%）

不言而喻，匈牙利模式也有其許多弱點。假如，在匈牙利模式下，既沒有較為徹底的企業自治也沒有企業的職工自我管理制。企業中也存在着相當嚴重的「異化」現象。其經濟管理體制仍然是官僚主義化的。計劃體系本身也帶有很大的官僚主義弊病，等等。

#### (5)毛澤東模式

今天，甚至對大多數我國「官方的」經濟學家們來說，在中國大陸的毛澤東模式也是斯大林模式的一種「退化」或反動。毛澤東模式帶有斯大林模式所有的弊病和缺點，但却不具備斯大林模式的任何長處。除了空喊一些諸如「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資產階級法權」、「造就社會主義新人」等漂亮口號之外，毛澤東模式自己沒有任何能加速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長處。

①與斯大林模式相比較，毛澤東模式更爲中央集權化，也帶有更大的「主觀隨意性」。在毛澤東模式下，政治因素強烈地影響和干擾經濟計劃的制定和執行。計劃制定的基本方向取決於幾個甚至一個政治領袖，如毛澤東本人（他們幾乎都是經濟工作的外行）的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想法。經濟計劃的執行不僅依靠龐大的官僚制度的行政命令，而且實際是通過一系列強制性的政治運動來完成的。全部經濟學僅僅變成解釋政治領導人的經濟浪漫主義的小辭典。

②因爲政治對經濟政策強烈干擾，因爲經濟制度不僅過度中央集權化和官僚主義化，而且與過度中央集權化和官僚主義化政治制度渾然一體，也因爲既無市場機制又無獨立於政治官僚的統計體系，中央政治領導人及受之控制的中央計劃部門甚至無法獲得正確的經濟信息。恰恰相反，大小各級官僚都報喜不報憂，甚至「無中生有」，以浮夸虛報爲向上爬的手段之一。其結果，計劃制定不僅違背經濟科學而且嚴重脫離客觀現實。

③在毛澤東模式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物質刺激。經濟管理體制的唯一原則是「階級鬥爭」。其結果，在企業中的官僚主義現象和非人性的「異化」現象被極端化了，而且廣大職工的物質生活水平被壓到一個低得可憐的水平。

④在毛澤東模式下，企業只能執行中央計劃部門的指令性計劃而沒有任何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生產多少的自主權。企業的經濟活動實際上變成了完全按照「中央文件」行事的政治運動。其結果，企業的首創精神被完全窒息了。

⑤在毛澤東模式下，雖然「以農業爲基礎」總是在口頭上被強調，但經濟發展和國家投資的重點總是重工業（「大躍進」期間）和軍事工業（十年「文革」期間）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發展的比例總是處於一種不協調和不平衡的狀態中。其制度上的原因有二：第一，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和執行不僅不受市場機制的制約而且被高度地極權化和政治化了。第二，經濟制度中缺乏一種與官僚階級追求最大限度特權和最高積累率而犧牲廣大人民羣衆生活水平的趨勢相對抗的機制（如獨立於官僚控制的工會）。正相反，人民羣衆改善物質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愿望被專制制度用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所窒息和粉碎。

⑥因爲經濟計劃的制定和執行被高度地中央集權化並與現實相脫離，因爲經濟管理體制的基本原則是非人性的政治控制和「階級鬥爭」，也因爲廣大職工因其被剝削和被壓迫地位而沒有真正的首創精神和生產積極性，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很低，浪費嚴重。

⑦在毛澤東模式下，政治官僚與技術人員（包括經濟學家）處於尖銳的矛盾和對立中。政治官僚（即黨官僚）壟斷了一切大小問題的決策權而技術人員始終處於被壓制和被打擊迫害的地位。其結果，不僅企業的技術改造和創新無法積極進行，而且企業的生產活動却因爲「外行領導內行」而混亂不堪。

⑧毛澤東模式幾乎是一個「全封閉」的模式，即它與世界市場的聯繫被人爲地減少到最低程度。因此，處於與世隔絕狀態中的企業無法及時地引進國外先進設備、技術和管理方法。

⑨在毛澤東模式下，一小撮國家官僚（或黨官僚）——以毛本人爲代表——的經濟特權迅速膨脹到一個可怕的程度。加上國民經濟發展危機不斷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這個國家壟斷的官僚特權階級與廣大人民羣衆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幾乎發展到一觸及發的程度。■

（未完待續）



# 布拉格之春說明了什麼？

—魯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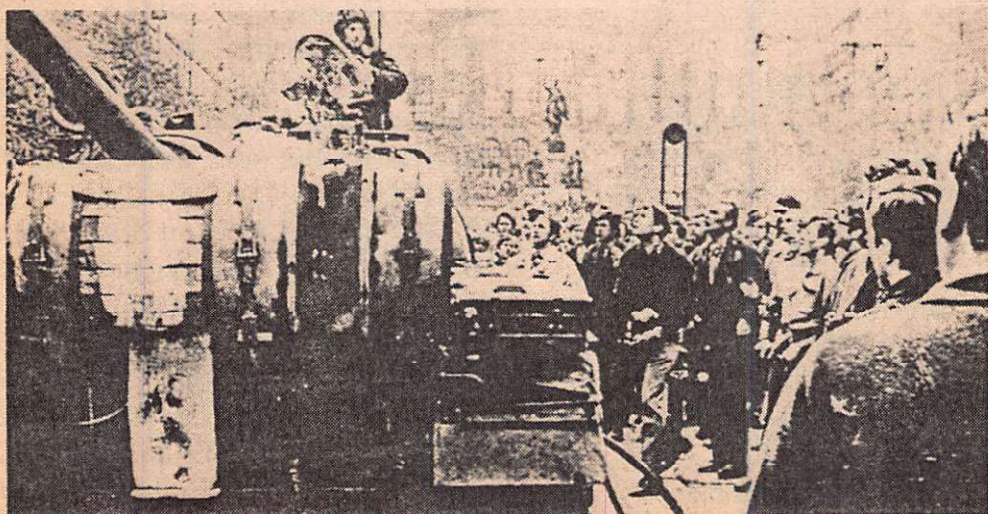
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起步較晚。以諾沃提尼為代表的黨內保守派在國內外形勢的壓迫下，不得已於一九六二年捷共「十二大」上才開始這一過程。但是，他們同時還繼續用壓制手段阻撓這一過程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他們反復強調：(1)修正過去的錯誤純粹是黨內事務，不應由非黨員來評論或干涉。(2)「個人崇拜」的產生和蔓延是由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殘餘和帝國主義外部侵略威脅的存在。(3)新聞界公開批判「個人崇拜」的言論幫助了帝國主義者。(4)從某種意義上說，斯大林時代的錯誤是大家都有一份的，追究責任會追到自己頭上，更何況他（諾沃提尼）自己也是五十年代政策的「受害者」。

但是，保守派阻擋不住人民要求民主的洶湧潮流。作家、知識分子和學生們的運動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反對諾沃提尼的。他們所關心的是從現存的斯大林主義體制變到民主和人道的社會主義去。他們不僅要求「非斯大林化」和解決民族問題，而且要求恢復思想、言論、出版等各方面的自由權利。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中的變化在這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先驅作用。在文史界，作家們提出下列一些要求：(1)文藝作品應該描寫和反映斯大林時代的陰暗面。(2)反對政治介入文學。(3)重視社會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問題。(4)要求給予卡夫卡和哈賽克的作品以更高的評價，並為此與蘇聯及其他東歐

國家的作家們進行了尖銳的論戰。(5)反對書報檢查制度。(6)加強與西方的文藝和學術交流等等。

對捷克斯洛伐克來說，雖然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是經濟上慘敗的一年，但它却給民主改革帶來一定的轉機。因為政治形勢發生了有利於「自由派」即改革派的轉變。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先後被提出來討論。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對斯大林時代「民主集中制」和「黨的領導作用」這兩個概念的討論。

關於「民主集中制」問題，人們主要提出這樣一些論點：應該更多地注意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內容。由於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被歪曲了，所以才能建立獨裁式的中央集權，產生不信任群眾，把群眾當作灌輸黨的既定目標或路線的消極對象的傾向。為了實現更民主的政治，廢除日前的幹部制度和給人民以批評自由是重要的。要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現存的社會體制。因此，現存的社會主義體制並非是最終的、永恆的體制，甚至也許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體制。人道主義要求回到馬克思的以人本身為中心的觀點上去，即承認人類參與歷史變革時的自由與尊嚴的存在。要強調批評自由、特別是強調保障批評以至反對體制的自由的必要性。因為目前的「人民政府」的概念中不包含人民群眾是否真正參加管理的內容，所以沒有群眾管理的狀況就被永久化了。



The military repression of the Czechoslovak reform movement, symbolized by Soviet tanks in Prague's Wenceslas Square in August 1968.

應該廢除由「上面」確定候選人的辦法，使選舉成爲真正自下而上的選舉。社會組織不應該成爲自上而下傳達政策的「渠道」，而應該成爲人民的自治機構和人民調整其利益衝突的組織。

關於「黨的領導作用」問題，改革派理論家們的主要論點如下：以往對「黨的領導作用」的曲解，往往建立在下述五個「虛假的、非歷史的」錯誤前提下：(1)黨乃至黨的多數總是正確的。(2)黨的利益永遠與工人階級的利益一致，這種利益總是由壟斷一切的黨自動代表着的。(3)伴隨着壟斷權力的行使而產生的黨的領導人物的物質特權絲毫不影響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發展。(4)黨的領導人物完全獻身於維護工人權利，而不維護自己集團的權力或特權（完全不存在特權利益）。(5)懷疑黨的領導集團是否有特權，會自發地危害社會主義事業並加強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此，改革派理論家着重批判了上述「虛假的」前提。他們指出：之所以產生「黨獨裁地決定一切事務」的狀態，是因爲混淆了「領導作用與統治作用」。黨和國家應該分離，黨應成爲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組織，而不應成爲國家機構合一的行政組織。國家要有獨立性，要站在自由的立場上。

戰後二十多年來，捷共黨員的成份、年齡、教育、職業等發生了重大變化。黨內新陳代謝，知識分子化、學歷高度化的趨勢是以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爲中心的改革派力量逐漸增強的背景。這種發展趨勢迅速反映到一九六四年以後的黨內鬥爭和人事變動上。一些改革派的重要人物取代了保守派人物的某些重要職位。黨在選拔幹部時優先考慮非黨專家而不是非專家黨員。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初，黨內進行了尖銳的鬥爭，其結局是諾沃提尼下台，改革派獲得了初步勝利。

從改革派的構成來看，大體有這樣三股力量：(1)黨內的當權者。他們看到了當時的危機，要求改變政策，但他們只要求改革經濟制度，其重點是管理體制的合理化與現代化。這種要求與工人們的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場不同，是群眾壓力的產物，反映了從斯大林主義的舊官僚轉變到比較合理的經濟技術官僚的權力交替。(2)知識分子。他們要求經濟改革加上政治改革，首先要求確保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即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3)青年。他們是三者中最徹底的。他們要求激進的民主主義，即自發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徹底改革整個體制的結構。當時改革派們的主導思想，是認爲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具備了向新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必

要因素和條件，因而，社會主義要從革命的專政階段過渡到人們從一切壓迫因素下解放出來的階段。

經濟改革的理論探討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漸進過程。最初，改革的思想 and 理論的產生主要是因爲經濟停滯的形勢所迫。這與蘇聯的「利別爾曼原則」的產生原因是一樣的。當時的出發點僅僅在於限制「命令經濟」的範圍，削減對企業下達的義務指標額，使企業有一定的獨立性和利潤意識，再輔以獎金的刺激，以期達到一定的效率。這種有限度的改革（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九年）最後以失敗告終。保守派以一九六一年度計劃未完成爲借口，把責任歸咎於改革派，攻擊分權化措施，要求再度強化集權化管理體制。這次經濟改革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在無所不包的指令性經濟體制中，經濟改革的各項原則和觀點都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另外，改革計劃本身的不徹底，即雖然有分權的投資資金，但利潤的作用不大，特別是沒有市場機制和價格彈性化。此外相對強大的保守派的反對也是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次改革的失敗，促使以奧塔·希克爲首的改革派經濟學家們進一步深入探索今後的方向和道路。他們認真分析了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歷次改革的經驗教訓之後提出：(1)列寧主義是適用於落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沒有更多地注意馬克思主義的另外一些重要著作，如「德意志意識形態」、「經濟學哲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等。(2)斯大林主義是錯誤地「解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結果。(3)要求着重探討和解決「計劃與市場」這一命題，像批判「個人崇拜」一樣地批判「計劃崇拜」。(4)要重新評價西方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賽魯茨基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發表的題爲「人民與計劃」的文章中提出：計劃並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目的；把目前的指令性計劃制度改爲較靈活的制度並不意味着放棄社會主義原則；供求規律不僅制約第二部類，而且要制約整個經濟領域，因此價格和匯率要以需求規律爲基礎；斯大林的「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等理論是「人爲的、無實際意義的規律」，是爲體制本身進行自我辯護的理論而不是「科學的分析」。

對於「國有化等於社會主義」這一傳統理論，改革派提出了更爲深刻的批判。他們指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所有（集體和國有）程度，並不等於社會主義發展的程度。應該反對抽象的，空洞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所謂社會主義所有制應該而且必須保證直接生產者參加

經濟決策並實際地行使所有權（包括分配權和自主管理權）。斯大林的「所有制」概念只包含人與自然（生產資料）的關係，而正確的概念還必須包含人們之間的經濟關係。不能用法律形態所確認的「所有制」來代替現實經濟生活中社會再生產各個環節所實際反映的「所有制」內容。不能以「國有化」這樣的抽象的「所有制」來決定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種關係，而應該反過來，即從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種關係來看「國有化」的實質。在所有制與關係的分配上，不能認為國有化問題的解決就等於分配問題的解決，恰恰相反，分配形式本身是要發展的，分配的形式和內容從一個重要方面來反映了所有制的性質。

關於社會主義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改革派認為：商品、貨幣關係的產生、發展和滅亡取決於生產力發展水平，這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利用市場關係的理論根據。以往被當作斯大林主義的偉大成就——廢除市場，克服貨幣商品關係的「拜物教」，消除競爭，實際上正是斯大林主義的大缺陷。這不僅是烏托邦，而且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歷史殘餘。斯大林主義模式的前提是計劃排除商品和市場，一切商品的價格都應該反映主觀決定的社會政策，這實際上是價格偏離價值，結果只能導致政策更加混亂。改革派們主張：應該支持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競爭和某種類型的健全的商業競爭，只保留大的方面的計劃統制——如基礎結構，技術政策，人才培養，國民收入分配，價格總水平等等。這樣即可將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形成一種所謂誘導市場模式。這種模式的好處有：(1)由於消費者市場的發展，能使生產符合消費者的需要，並能根據消費者的偏好來評價企業的活動。(2)保障等價交換。由於採用市場價格，價格水平的基礎，就從行政的、主觀的標準過渡到客觀的標準，由此可形成導致生產和分配最優化的合理的價格結構，即資源的有效分配。(3)經濟競爭促進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4)促進企業努力降低成本，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有效利用。(5)由於經濟集權化的削弱，能鏟除指令性經濟模式下的官僚機構無限膨脹的經濟根源。

改革派的理論是與其具體的計劃結合在一起的。計劃的核心是因為考慮到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停滯的直接原因是比例失調，而主張改革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重視非生產領域的投資，把生產領域中優先發展的項目限制在效率最高的先進工業上。其計劃的具體原則是：第一、根本改變中央集權的管理和生產組織。

如，廢除大多數的工業部；給企業更多自主權；允許國內企業和國外企業建立聯繫；在小工業及服務部門內允許私人經營等等。第二、改革國家經濟計劃和一般經濟政策。例如，廢除指令性計劃，只規定企業經營的基本原則；計劃不再由一小部份官僚制定，而由新設立的中央經濟會議（不是官僚化機構，而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民主地設立在各專門委員會調整機關的集合體）來制定；停止無償使用國家資金等等。第三、把原來固定價格制度下的主觀的、行政主義的固定價格改變為較客觀的浮動價格。逐步實行稅收均一化。第四、改變外貿的國家壟斷制，國家收購價格要與國際市場價格聯繫起來，並且讓國內生產者能選擇最有利的出口渠道，以此克服企業在產品質量、結構和技術上的弱點等等。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經濟改革需要一定的政治環境。沒有一定的政治前提，經濟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改革要廢除原來的經濟從屬於黨的領導和官僚體制的制度；使黨的領導和官僚體制不能對經濟行使國家壟斷所有權；生產和工資政策也要在管理者、工人和國家三者的利害關係的妥協中產生；幹部提升要根據工作成績而不根據黨籍。這些正是保守派和官僚們所最擔心的。因此，改革派必然會遭到他們公開和暗中的反對。

第一次改革的失敗使保守派暫時佔了上風。到一九六三年，經濟形勢又趨惡化，於是改革派又開始了自己的鬥爭。一九六四年一月末，發表了奧塔·希克為首的委員會制定的「關於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新制度的各項原則草案」，經過了廣泛討論以後，黨中央和政府先後通過了這一文件。從一九六六年開始，該草案被結合進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五年計劃而開始全面實行。因此這次改革被稱為第二次經濟改革。

第二次改革比第一次更為徹底。在計劃制定和管理方法上，調整了計劃體系。在基本建設，對外貿易和一系列指標方面減少了對企業的束縛。例如廢除總產量、工資獎金總額等指標，廢除由中央分配機械設備的方式等等。

在經濟組織的改革方面，採取了下述措施：(1)進一步下放權力，特別是企業幹部的選拔、教育和配備，均下放給V H J（生產經濟單位）或企業。(2)成立和發展托拉斯和康采恩。(3)改組政府機關，加強各機關的獨立性和責任。國家計委由部長、專家、科研人員和教授組成，研究國家基本經濟政策。改組各工業部，使之分權化，使各部的作用由行政管理過渡到經濟管理。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中實現

的企業自主權主要包括：企業有在合法條件下轉產的權利；有在合法條件下設立新企業或加入較大企業集團的權利；有與國內外企業合作的權利；國家機關的工作只限於一般計劃、調整和向企業提供情報。工人工資除了由中央規定的工種最低工資外，亦由各企業自行決定。

由於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的變化，對企業管理人員的要求也不同了，企業管理人員的教育問題自然被提上議事日程。當時（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七年）45%的企業長是不合格的，其中大學畢業者只占23%，各種非黨員管理人員只占22%。在新體制下，選拔管理幹部必須注意三點：社會主義覺悟、專門知識和能力以及盡可能採用客觀的評價方法，例如有複數候補者的競爭制。對幹部的教育，採用兩種方法，一是各部設立教育機關，舉辦不定期的訓練班，二是利用大學教育，培養新一代的管理幹部。

勞動、工資政策的改革主要強調勞動力市場的作用，要求勞動力移動自由化以及保護勞動者的權利。批判工資制度上的平均主義，把企業個人的經濟成果與工資結合起來。其具體措施有：廢除強制勞動條例，尊重僱傭雙方自願，職工可以自由辭職、自由移動。保護、支持私人勞動（如業餘勞動）。設立失業補助金，擴大工資可變部份占全部工資的比重等等。當然，這種勞動工資制度造成差別擴大，失業、工作性質變化、勞動強度增加以及通貨膨脹加劇等後果，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不少工人的反對。

波蘭經濟學家 J·烏依魯揚斯基把社會主義經濟劃分為四種模式：

1 官僚集權模式。計劃管理由特權階層統治。中央計劃當局處於體系頂端，體系的末端（生產單位）沒有決定意見的自由。經濟核算單位以實物量（噸、公斤等）計算，由實物平衡而不是價格來決定分配比例。此模式具有僵化、無效率、資源浪費等缺點。蘇聯、東歐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都屬於這種模式。

2 最優集權模式。使用數學和電子計算機實現計劃的最優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實物平衡。但各種決定仍統一於中央，生產單位只決定執行計劃的具體方法。此模式因計算機和技術幹部不足，仍不具備實現條件，而最優價格之推行，仍缺乏企業本身的內在動力。蘇聯現在的改革模式就屬於這一類。

3 分權化模式。雖保留中央計劃管理機構，但把一些權利下放給基層。削減中央下達的指令性指標，以利潤指標作為衡量企業成績的

主要指標。價格雖仍由中央制定，但力求更忠實地反映生產成本。該模式雖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企業的獨立性和消費者權利的重要，但仍殘留着制定價格的任意性。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改革大體屬於這一模式。

4 市場模式。由市場機制代替指令性指標和計劃，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國家對之做長期和客觀的修正。中央計劃沒有指令性質，計劃當局只通過市場，以財政金融手段來誘導企業。南斯拉夫則屬於這一模式。

對經濟改革的不同評價，往往是社會各階層不同利益的產物。

改革的障礙之一是黨的傳統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反映了以諾沃提尼為首的保守派、黨和國家機構中的官僚、保守的理論家和老黨員的利益。他們認為，原來的集團經濟體制本身沒有缺點，一切都是完美的，問題在於個別領導人的無能；而加強市場作用的措施會阻礙社會主義，擴大收入差別，從而產生新階級。而實際上，經濟改革需要的是削弱他們對經濟生活的控制能力，使他們失去對企業的影響力，使黨的機關和中央管理機構的權力轉到新的管理階層手裏。特別是重要的經濟改革還會由經濟領域衝擊政治、社會、文化領域，從而危及他們的特權利益，因此他們反對改革。

工人，特別是非熟練工人，擔心改革所導致的某些後果，如通貨膨脹、失業和收入差別擴大、勞動強度增加等會損害他們的利益。

農民對改革的態度中立。因為農民一般保守，不大關心政治；而發展個人企業和生產者自我管理等等，在農村中已不同程度地存在了。因此經濟改革對農民本身並無很大魅力。

真正歡迎和支持改革的是技術階層，能幹的經營管理人員，工人中自覺的積極分子、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等。

由於各階層的反響不一，特別是保守派的抵抗，所以經濟改革的進展緩慢，並且大部份措施都有所折衷和妥協。比如：各工業部沒有被取消。企業獲得的權利沒有法律保證。行政措施的力量仍然十分強大。國家與企業的關係不平等。在價格體系上，固定價格仍占很大比重。由於擔心彈性價格會導致通貨膨脹傾向，所以政府仍然強調強化控制價格。另外，改革措施未能形成體系，人們應該幹什麼，不應該幹什麼的問題並不明確，企業管理人不適應這種劇變。因此在一九六八年之前改革並未積極地推行。

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中央全會通過「捷共行動綱領」，並於四月十日向全國公佈，從

而掀起了民主改革的最高潮。

「綱領」的主要內容包括：(1)指明改革整個政治體系的必要性，提出科學與民主相結合進行管理，防止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之手。(2)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和制定新的新聞、出版法。(3)保障人權（出國旅行自由、政治信仰自由）。(4)為過去政治鬥爭中的犧牲者恢復名譽。(5)通過新憲法使國家聯邦化，以提高斯洛伐克的地位。(6)除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友好外，與一切國家保持友好關係。(7)產業部門實行分權化。(8)保障國民戰線（統一戰線）中少數派的地位，制定新的選舉法。(9)國內經濟向世界市場開放。

「行動綱領」的意義在於批判了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制，黨自己向部份地回到馬克思主義原來觀點上去的方向邁開了一步。其實質是從斯大林主義的粗野的「社會主義」模式轉變為有發達的民主主義和人民自由的人道社會主義。為此，它需要超越蘇聯的現實，創造新的社會主義模式。一九六八年五月，非黨理論家斯維塔克發表了他的著名的演說。他指出，馬克思不是社會主義統治的發明家或理論家，他是深知人民權力和民主主義的。要理解馬克思必須理解他的時代，不能把馬克思的貢獻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解釋混為一談。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在自身解放中的作用的理論與列寧在俄國歷史條件下提出的黨的作用的理論是不同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的形象在以後的運動中被歪曲了。馬克思關於為了解放工人、為了人道、人性而必須變革生產關係的理論被狹隘地解釋為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而忽略了經濟繁榮也是人類生產的目的。馬克思是工人運動的保護者，但在「社會主義」國家却存在支配工人運動的權力機關。馬克思重視人的全面發展，而現在的「社會主義」却使人民變成被控制對象，把要求人的自由說成是「反動的」。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上述看法已經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理論界的共同看法。於是，人們普遍要求批判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

「行動綱領」發表前後，捷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其中之一是廢除書報檢查制，以及恢復已中止廿多年的民意調查。另一個重要措施是黨要求保安機關停止一切非法活動。為此，改組了保安機關，縮小其機構，砍掉不屬於其職能範圍的活動內容，以保證政府對它的直接領導。

改革派認為，「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工具」這一命題是錯誤的。黨壟斷地直接行使權力，造成濫用權威，干涉管理，不負責任等弊病。因此，改革派強調，黨應該通過樹立榜樣，

說明，提出奮鬥目標等方法間接地領導和影響國家的各方面制度，而一切壟斷或強制手段都是錯誤的。黨應該放棄其對公共生活的決定權的壟斷和意識形態上的壟斷。

為此，改革派提出一系列使黨內生活民主化的方案。(1)強調讓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充分了解一切有關黨的事務的信息。(2)承認黨內有派。保護辯論中的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給黨員以公開發表不同意見和爭取支持者的機會。黨報應該刊登黨員的不同意見。(3)保證和平的有聲譽的權力交替。(4)黨內選舉民主化（秘密投票）。(5)保證退黨自由。(6)抵制由黨來管理政府和其他公共機關的理論，等等。

另外，理論界特別是一些黨內理論家提出恢復多黨制。他們的觀點引起一定波動。但杜布切克為首的改革派反對多黨制，並且禁止恢復社會民主黨。

一九六八年開始的建立工人委員會的運動是引人注目的。工人委員會有幾個基本目的：增加企業生產、改善職工生活，以及創造企業與工人、企業與國家關係的新形態。工人委員會的成立意味着承認工人要參予決定企業的最重要事項，並與有能力管理者從專家立場進行領導結合起來。委員會一般有十~卅人，多數由企業職工擔任，十~卅%由企業外專家擔任。蘇聯入侵後，工人委員會由於其本身是工人抵抗運動的一種形式而得到迅速發展。

一九六八年三月，工會中央委員會領導人改組，改革派進行了關於工會作用的討論。四月份「行動綱領」指出，工會不應是單純的管理機構和行政機構，而應首先和主要是維護工人利益的組織，引導和教育工人的作用是第二位的。工會的另一個變化是，它不再作為統一的、由國家或黨壟斷的組織，而成為本單位的獨立組織。

從一九六八年一月開始，「布拉格之春」引起蘇聯及其盟國的不安。它們先後發表聲明，譴責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特別是「二千字聲明」發表之後，攻擊的浪潮達到頂點。蘇聯及其盟國還運用外交和軍事手段對改革派施加壓力，甚至在雙方首腦會談時直接指責改革派。最後，八月廿日，五國聯軍入侵並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用武力毀了「布拉格之春」。

蘇聯及其盟國的擔心之處在於：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不僅會衝擊蘇聯在東歐的統治，而且會危及蘇聯東歐各國的國內體制，因為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不同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是包括政治體制的綜合改革，特別是涉及到「黨的領導作用」問題。這是蘇聯東歐各國當權派最害

怕的。

入侵之後，蘇聯一方面鎮壓各階層人民的抵抗活動，一方面用刺刀迫使捷黨和政府進行人事更動，採取一系列所謂「正常化」措施，加強言論控制，驅逐改革派，扶植保守派上台。爲了消除「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成果，他們針鋒相對地加強黨在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領導作用；加強中央管理的計劃經濟；加強企業內的黨組織，以政治可靠性爲標準選拔管理人員；迫害政治上的反對派；驅逐改革的工會幹部；恢復外貿的國家壟斷制；加強同蘇聯的關係；加強國家的作用；確立有效的黨內教育體制；解散工人委員會；批判改革派的「行動綱領」，以及在組織、人事、公安等各方面採取相應的措施。

從一九七二年以後，胡薩克體制把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基本納入蘇聯型體制的軌道。

「布拉格之春」向我們提供了什麼歷史經驗與教訓？與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比較，今天的中國是否也具備了進行一場成功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各種條件？

總的說來，「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在下列幾點上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第一、改革運動作了相當徹底的理論準備。換言之，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改革派的理論家們都有很大的突破（就當時的歷史環境而言）。在整個改革運動中，改革派的理論家們始終處於爲運動指引方向的地位。尤爲重要的是，他們從未因保守勢力的反對而退縮。恰恰相反，在中央佔優勢的改革派自始自終地支持和鼓勵理論家們的突破。第二、改革派們懂得，人民群眾對官僚制度的不滿被壓抑得太久了。另一方面，沒有人民群眾的覺悟和支持，改革派的路線是不可能得到全面貫徹的，保守派也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因此，改革派在保障言論自由的前提下充分發動了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其結果，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成爲改革派所倚重的最重要的社會支持力量。這是改革派能夠成功地驅逐保守勢力並較爲順利地實現其改革方案的基本條件之一。第三、改革派本身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也是改革能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主觀條件。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改革派也幾度面臨政治危機：或者是保守勢力（其後台自然是克里姆林宮）攻擊改革派的政治路線「破壞安定團結」和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或者是群眾運動有失去方向的危險。但改革派沒有因這些危機而動搖自己的立場或更改自己的路線。恰恰相反，改革派懂得只有繼續和深化改革進程，才能贏得民心的支持，才能

徹底擊敗保守勢力，才能迎來一個真正安定的政治局面和較好的政治形勢。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政治上搖擺不定，朝令夕改，甚至背叛自己原來的政治立場，回過頭去維護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則會迅速喪失民心，並且自己宣判自己的政治死刑。第四、整個改革是經過週密策劃的。特別重要的是，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間的關係處理得很好即一定的政治改革爲經濟改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特別是組織條件；而經濟改革的成功又鞏固和進一步發展了政治改革。此外，經濟改革的措施既抓住了舊體制的核心（如價格體制的改革），又迎合了一般職工的要求（如成立工人委員會和建立企業自治制度）。

「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也有許多不足之處。其中最重要的有二點：其一，改革派沒有很好地發動工人群眾。雖然在改革的後期創立了企業自治制度和工人委員會制度，但工人群眾的多數在改革運動中並不十分積極。其結果，當蘇聯及其僕從國聯軍入侵時，工人群眾——他們佔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的多數——並沒有積極進行抵抗。這是「布拉格之春」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一個很重要的不同點。其二，改革派對蘇聯及其僕從國進行軍事入侵的估計不足。特別錯誤的是，當蘇軍入侵已成爲事實時，改革派的反應是消極的，甚至可以說是投降。與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相比（匈牙利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並犧牲了二萬多人），捷克斯洛伐克沒有人民生命和國家財產的損失。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喪失了全部改革的成果。與此相反，一九五六年之後的匈牙利從莫斯科獲得了某種相對的「自由」。其結果，匈牙利是東歐各國中除南斯拉夫之外的唯一進行了比較成功的經濟改革的國家。

與目前的中國相比，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有下述一些共同點。其一，雖然中、捷兩國的歷史傳統不一樣，雖然毛澤東自一九五七年開始在中國搞了許多比斯大林主義更爲落後和反動的東西，中、捷兩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許多基本特點上是相同的。例如，兩國的經濟制度都是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兩國的政治制度都是一黨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兩國的官方意識形態都是掛着「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官僚特權階級的意識形態，等等。其二，經過長期的斯大林主義統治（在中國是毛澤東思想的統治），兩國人民都迫切要求變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兩個國家的執政黨內也出現了一些願意改革的「開明人士」——所謂的改革派。其三，兩個國家都經歷了相當程度的經濟危機。兩國的改革派都希望

從經濟改革中尋找出路。

然而，兩國的不同點則遠遠大於它們的共同點。第一、捷克斯洛伐克黨內的改革派的核心是黨內的經濟理論家和政治理論家，如奧塔·希克，賽魯茨基等人。他們不僅受過高等教育，而且長期以來為在捷克斯洛伐克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作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和理論研究。他們自己既是理論家也是改革運動中掌握實權的「鐵腕人物」。例如，奧塔·希克身踞政府第一副總理和經濟部長要職，直接負責經濟改革。從他們已經發表的著作和公開演講來看，這些人都具有相當高的理論水平，並且完全不受舊的斯大林主義的框框的限制。他們的改革立場是堅定的，他們的改革政策是首尾一致的。但是，中國的改革派則不是這樣。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無論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是政治家。中國的改革派理論家們從來也沒有扮演過決策者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改革派的首要領導人並沒有真正在政治理論與經濟理論的研究上花功夫。尤為重要的是，改革派的主要領導人求改革的立場並不是十分堅定的，其思想上的「毛澤東思想」的框框並沒有徹底打破（如鄧小平的「不當赫魯曉夫」的誓言則是一例）。其結果，與捷克斯洛伐克相比，中國的改革派的素質要差得多，理論水平低得多，其政治立場也是搖擺不定的。

第二，在捷克斯洛伐克，黨的中、下層幹部早已經被逐步「技術化」了。因而，改革派的政治路線受到中、下層幹部，特別是管理幹部的多數的支持。這也是改革派的措施能被順利執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中國却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的幾千萬中、下層幹部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既沒有「知識化」也沒有「技術化」，而只是「政治化」（雖然其中的絕大多數人連馬克思的書也沒有讀過一、二本）和官僚化。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對他們來說意味着喪失部份特權和養尊處優而無所事事的官僚生活。所以，他們中的大部份人是抵制和反對改革的。這也是中國改革派最感棘手的問題之一。

第三，在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基本上不干預政治，特別是不干預黨內鬥爭的。在整個改革與反改革的鬥爭中，軍隊嚴守中立。但是在中國，情況則大不一樣。中國的軍人歷來是參政的。十年「文革」期間甚至以後則更是如此。而且與捷克斯洛伐克的軍隊不同，中國的軍隊幹部也沒有「技術化」和「專業化」，其政治立場大都較黨和政府中的官僚們更為保守些。因而，保守的軍方也成了改革派推行其路線的重大障礙之一。

第四，就整個幹部階層而言，在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無論在中央和地方都佔據優勢。在中國，情況則恰恰相反，改革派至少在數量上始終處於劣勢。

第五，中、捷兩國的歷史差距甚大。早在二次大戰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就完成了其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的過程。與其他東歐國家不同，捷克斯洛伐克實行過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它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也是東歐各國中最高的。捷克斯洛伐克受西方的影響也很深。所有這些，都是有利於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在中國，情況則完全相反。中國根本沒有經歷過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與歐洲不同，中國的封建社會的政治結構是非常中央集權的。封建的國家機器不僅以一個龐大的官僚階層為其政治基礎，而且直接組織和控制部份社會生產。中國從未建立過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所有這些，都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上留下了極為深刻的烙印。加上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其實質也是將農業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以及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活的嚴密控制（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為起點），使得整個社會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變成高度的中央集權化，官僚化和專制化。因而，在中國推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要比在捷克斯洛伐克難得多，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小得多。

當然，與捷克斯洛伐克相比，中國也有一些利於改革的條件。例如，蘇聯的政治壓力和軍事入侵是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失敗的基本原因。換言之，如果沒有蘇聯的政治壓力和軍事入侵，改革會成功。但是，中國的改革派則不用擔心這一點。其次，中國有過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十年中，中國的各項社會矛盾都得以充分激化；官僚特權制度的腐敗、無能、殘酷都暴露無遺；國家壟斷官僚特權階級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早已成為我國社會中的主要矛盾並處於非常尖銳化的情形之中。下層群眾對民主、自由、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和全面變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強烈要求已成為對整個官僚制度的強大的政治壓力。在這種條件下，如果黨內改革派有決心和有魄力真正依靠和發動人民群眾進行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與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中國，由於官僚特權階級中的保守勢力的強大，這種改革就更需要要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來催化和促進。這裏的關鍵問題是，中國的改革派有沒有勇氣真正與那個官僚特權制度決裂，把自己的政治立場徹底移到人民一邊來。■

# “李一哲”給後來人的幾點啟示

——汪岷

研究歷史的一個最樸素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較。人們往往能從比較中掌握歷史長河的流向和規律，懂得如何在它的漲潮時做到進有方矩，在退潮時退有陣法。

縱觀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近年來的歷史，在理論發展路程上有着兩個重大的標誌：一九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報和一九七九、八〇年的民間民主刊物。拿這兩個標誌來比較現在誕生的「中國之春」，人們可以發現它們的異同以及一脈相承的關係，人們應該吸取它們的經驗和教訓，去做一個新的浪潮中更清醒的弄潮兒。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李一哲三個人同屬一個廣州地區的派別組織「紅司」。我和王希哲、陳一陽又同屬「紅司」領導下的一個組織「廣州兵團」。我和王希哲更同是「廣州兵團」的常務委員。在李一哲大字報期間，我參加了他們要求平反和釋放「文革政治犯」的運動。在民間民主刊物時期，我又是民刊「未來」的主編。由於職務工作的本身和理論上的互相探討，使得我有機會從近距離去觀察廣州地區以至全國的民運思想流派的成型過程。但願這種觀察能對「中國之春」有所幫助。

(一)

毛澤東是人類共產主義運動迄今以來最大膽地利用民主來達到專制的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基於一點思想：「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按：實際上是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怎麼辦？」他試用上了的辦法就是：「自下而上地（按：他忘了他剛好是自上而下地）發動一場群眾運動（按：他不敢提民主運動）來揭露我們社會的陰暗面（按：他不承認這個陰暗面恰恰包括了他自己和思想制度的本身）。」他的這一套「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當然沒有騙得過三十年代上過當的老自由民主主義者們和吃盡苦頭的那些五十年代的右派份子，（儘管他們都脫逃不了「池魚之殃」），却鼓動了六十年代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娃娃們。李一哲可以說是他們的思想代表。「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幹，誰幹？我們不說，誰說？」毛澤東青年時代野心勃

勃的話成了他們的信條。「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是他們的口號。

如此簡單和直線條的民主思想和政治上的無知導致了千千萬萬的李一哲們一踏入文化革命的思想戰綫上，就走進毛澤東自己還把握不住的「陽謀」中去。我和王希哲、陳一陽的認識早在「文革」初期的「搶黑材料」活動時期，我帶領了我們學校的造反派組織參加了王、陳的學校衝擊黨支部的行動。在謾罵和拳頭平息下來之後，王希哲和我談到了他的思想和動機，他說：「學校黨支部不讓人說話就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就是反對毛主席，就要打倒。」在一加一等於二的思想支持下的李一哲們，從學校的活動走到社會活動，衝進了跟隨而來的反對廣州市委、省委的活動，封掉「羊城晚報」和「南方日報」，奪了趙紫陽為首的廣東省委的權，反對黃永勝為首的廣州軍區。兩大群眾組織的流血武鬥，軍隊的重新介入，把人們投入監獄。一連串令人喘不過氣的動亂使李一哲們無暇清理自己的思想。然而權力鬭爭越接近中國共產黨的高層，人民越來越多的災難和痛苦，却不斷地向李一哲們敲響了警鐘。記得在一次開會討論要不要繼續反對黃永勝為首的廣州軍區時，（當時周恩來已明確指出黃是毛一邊的人，不准反對）李正天在會上就大膽提出：「是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等於毛主席？」當場就被不少他的戰友的上司視為危險份子，思想反動。在另一次我和王希哲都參加的討論會，他提出了一個更具思想意義的問題：「爲什麼那麼多的高官連解放軍都壓制民主，這難道光光是執行錯誤路綫的問題嗎？」會後紅司的頭頭就對我說：「他的思想就要走向反面。要趕快開除他。」直到他們被毛澤東們趕出了權力的角逐場并到了監獄或農村，李一哲才有機會來思辨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派的思想。而一直到林彪事件的出現，才使李一哲最後成型，才使他們認識到中國的問題絕不單是一個人事上的更替問題，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根本性問題。從而堂堂正正地打響了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第一炮。



李一哲的民主思想從萌芽到成型，足足渡過了八年，中間多少掙脫思想枷鎖的折磨和痛苦，多少自稱思想成熟的行動派拋離了他們使他們一次又一次陷入了孤軍奮戰。而當他們一旦在民主戰線上站立起來後，就在客觀上不以毛澤東的意志為轉移（雖然主觀上他們還虔信毛澤東），把中國的封建共產主義衛道士們打得落花流水了。李正天在廣東省市組織的萬人鬪爭大會上自豪地宣佈：「你們批不倒我，你們回去再準備一下吧，因為我們已準備好幾年了。」事實上，這時，連毛澤東本人也無法批倒這些生氣勃勃的毛澤東思想改革派了，他問政治局委員們：「你們批得倒李一哲嗎？」這句話其實也是問他自己的。

李一哲的經驗告訴後來人，誰也不是先知先覺，不要害怕幼稚，不要害怕錯誤，一個正確的東西總是從錯誤中產生的。這大概是一條規律。

李一哲的經驗也告訴了後來人，在實際的運動中，不要被行動派們（像文化革命中絕大部份的群眾組織頭頭們）迷惑了思想方向，要隨時清理思想和更新理論，才能走對路子。

## （二）

廣東省、市委的御用文人們無法批倒的李一哲，其實是可以批倒的。當他們的理論最輝煌的時候，也正是他們暴露出思想敗跡的時候。最集中的焦點是對毛澤東的看法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想法。李一哲不批毛。他們只是用毛澤東的民主的句子來反對他們認為是不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實際上這些東西很多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在他們意氣風發地書寫李一哲大字報的時候，我同一個朋友和李一哲展開過很激烈的爭論。李正天最後總結了一句話：「你們不相信毛澤東，你們不相信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我們的根本分歧。」我問王希哲：「你真的認為毛澤東不會犯錯誤嗎？」他還天真地說：「我現在還沒有看出他的錯誤，要是將來他有錯，我也相信他會由他自己來改正。」這是典型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改良派思想。當然他們從他們的思想軌道上是不可能認識到，另外一些新的思想流派已經在醞釀，雖然還沒有政治氣候讓它們一展身手。

思想一過了自己頂點，跟着下來的就是下坡路了。無情的歷史是沒有憐憫心的，對英雄也不例外。

李一哲第二次進獄後，這個堅強的思想集體分裂了。這種分裂的最根本原因不是鐵窗和拳頭。這種思想分裂無可避免地帶來了組織上的分裂。入獄前的個人英雄主義和爭名奪利也早種下了禍根了。因而，王希哲離開了他的兩個生死戰友，在獄中又一次更新了自己的思想

，拋棄了毛澤東思想改良派的立場，以共產主義革新派的戰鬥姿態，加入了民主陣營，為民主事業又一次作出了貢獻。

李一哲剛剛踏出監獄，我帶着民刊「人民之聲」和「未來」去找他們時，李正天已經淪落到只會吟他的所謂「獄中詩」。據說他一出獄就準備申請加入共產黨的地步了。只有王希哲，接過民刊後堅定地說：「讓我考慮考慮，我會參加這場運動的。」

「李一哲」的教訓告訴了我們，中國思想戰線上的夜正長，路也正長。真理是相對的真理，要謹防佔據了一個相對真理陣地之後，却又失去下一個。

李一哲的教訓也為我們指出了改良派們致命弱點：他們可以反黨支部、反黨委、反中央文革，他們不能反毛澤東；他們可以反毛澤東了，他們又不能反毛澤東思想。為什麼不從根本上想一想呢？

李一哲的教訓還警戒了後來者。歷來思想理論家大都會由於鑽入思辨而帶來的各種各樣的人格上的弱點；不正視自身的弱點，不正確地對待自己和思想陣營的關係，將為組織上的分裂埋下伏線。

## （三）

以四·五運動為契機，以西單民主牆為導火索的民主運動，是用民主刊物這個形式來向舊思想陣營挑戰的。它們一出現，就令全國人民人心振奮，世界各國人士耳目一新。這絕不是偶然的。民主思想陣綫的各種思潮經過文革、批劉、批林、批周、批鄧各種的痛苦思考，又有了李一哲的經驗和教訓，已經在人們的頭腦中有了立足之地。各種流派在沉沉黑夜中破門而出是勢所必然的，只不過凡是派為他們提供了靶子而已。有了思想，就必須有隊伍、有陣地，刊物是集三者於一身的最好形式，難怪古今中外的專制者們，向反對者們打下去的第一棍，大都向着報章雜誌了。

廣州地區的民刊陣地是繼北京之後最重要的一個，共產黨的宣傳機構說的「面臨港、澳，資本主義西方影響最深。」這句話實在說得不錯。最先起來的有以政論為主的「人民之聲」，跟着是以文藝為主的「未來」，接着是派生出來的和新生的「生活」、「浪花」、「紅豆」、「詩刊」、「人民之路」、「責任」等等五花八門，各顯神通。再加上後來參加的一個聲名顯赫的王希哲和他的「學友通訊」，實力空前地強大，令最堅強的擁護派廣東省委也手忙腳亂起來。

其實從思想流派上去分，亦無非兩大支。一是以王希哲為旗手的激進的共產主義民主改革派，一是還未選出旗手的非共產主義民主派。

這種情況和北京差不多，只不過是北京的理論隊伍較強，廣州的王希哲號召力較大而已。

所幸的是，廣州各個流派之間思想雖然有分歧卻沒有明顯的分裂。除了李正天大罵「人民之聲」（人們早已在思想上把他開除出民主隊伍，因而無傷大雅），何求從「人民之聲」分出去（並無論戰）之外，大家還能聯合起來。第一次顯示聯合力量是在廣州師院召開的四大型座談會，第二次是全國民刊的集會。

廣州地區民刊和北京以致全國的民刊的弱點基本是共通的：首先是理論戰綫太弱，馬克思主義改革派的力量仍然占主流地位。這一次再不是以毛澤東思想批評毛澤東了，而是以馬克思主義批評毛澤東思想了（雖然他們中間還有人不承認）。魏京生的被捕，使非馬克思主義流派小心翼翼，更無法公開地探討。

其次是聯合得太遲，壓力一開始就很大（在這點上共產黨吸取了文革歷次運動的教訓，比以前聰明多了）。外在的原因不是不重要，但內在的原因却是很大的因素。中國人實在是一個謹謹慎慎的民族。

第三個是目的不夠明確，無論長遠的目的或者最近階段的目的都不明確；於是乎五彩繽

紛，各行其是。甚至有以為有話說話，有屁放屁，才是民主。實不知民主尚且弱小，不集中火力，無以傷專制。

最後是組織力量不強。民主思想戰綫不單需要一大批思想家、理論家，還需要一大批行動家、組織家。在運動中遴選出一些既有思想，又有組織能力的人才，這是後來者們應該重視的。

當然這幾個問題中最主要的還是第一個，沒有在民主思想上爭深鳴透，不在政治、經濟、歷史、文藝等各個方面有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的一整套新思想作為理論依據，其他都是空的。中國之春的這個弱點也很大。但願這個刊物比它的前輩們強，因為時代又向前進了，環境也不同了，它的歷史責任應該更重。

#### 結語

從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開始，到現在，足足十六個年頭了。毛澤東就像「水滸傳」裡的宿太尉，揭開了那塊貼着「社會主義大民主」標籤的大石碑，放出來的那一百零八道金光，就永遠不會回到那暗無天日的地洞中去，至於這些好漢們要想些什麼，要幹些什麼，那就再也由不得毛澤東和毛澤東的徒子徒孫們了。

## 《中國之春》訂閱單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地址： \_\_\_\_\_  
ADDRESS \_\_\_\_\_

零售：每本 \$2.0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12.00

學生訂戶：\$9.00

贊助訂戶：\$30.00 以上

學校機構：\$30.00

海外訂戶：每期另加郵費

航空：\$2.00

平郵：\$0.80

支票請寄： CHINA SPRING

（美國）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加拿大） P. O. 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 來信摘編

〔編者按：自《中國之春》創刊以來，編輯部收到數千封各方來信。其中，有數量不一的捐款，有滿含熱望的聲援，有周密審慎的建議，亦有對我們尖銳而中肯的批評。由于人手缺乏，未能對信件做及時的處理與回覆，這是我們工作的一大缺點，特向諸位致歉。除了陸續對來信一一作答之外，我們選擇了其中十五封信，刊登於此，以期引起海內外人士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更大關注和熱烈爭鳴。信件選編的原則是：

1. 凡有一定代表性的信件，盡量刊用。
2. 僅有的四封持反對意見的信件全部發表，不加刪節。
3. 盡可能顧及不同身分與不同社會層面的人物，如有大陸訪問學者，公費與自費留學生，有來自大陸的移民，僑居世界各地的華僑，有台灣和香港的青年學生，亦有知名的華人學者和經常批評國民黨政府的台灣立法委員費希平先生等等。
4. 對信件一般不作文字處理，只刪除抬頭部分對《中國之春》和王炳章個人贊語，以節省篇幅。應發信人本人的要求，有些信件不用真實姓名。
5. 每封信的前面，摘信中某一代表性的語句作起首，易于讀者對來信觀點一目了然。〕

“海外華人，不能忘却自己的本來……”

首先我自我介紹，我是於十歲時（一九三三年）離開中國的，在海外飄零了四十年，當然除了在學識的基礎上，獲得了某方面的成就外，在事業和生活上，亦可以說差強人意的滿足了。我常自詡誇口，亦自引以為榮的，是在短短的幾十年中，曾經創造過別人沒有創造的事業，出過別人沒有出過的風頭，更享受過了別人沒嚐試過的享受，也吃過了別人沒有吃過的苦頭。因此，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酸酸苦

辣的回憶。一切事物，對我來說，應該是何等的平淡了。

但是，每每思及在海外飄零的四十年，雖然事業和生活，已經被西方所融滙了，西方也公平地給予了我學識的領域、財富、事業，以及一切的自由和平等待遇，但身為炎黃子孫的後裔，始終不能成為西方人，這一執着，我想不僅是我個人，海外所有的華人，都有相同的感受，這充份表達了海外華人不但不能忘却自己的本來，反而對自己的祖國，更加深了一層熱愛。尤其近四十年來，海峽兩岸的執政者，都剝奪了人民的一切自由和平等權利，仍然將政權視為私有專利，家傳帝業，讓官僚奴役天下（雖然台灣較大陸好上許多，但其本質仍然無多大的分別）。此種倒行逆施行為，凡我崇尚自由和有良知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之故，我數十年來，都抱有呼籲改革中國政治的理想，亦有所行動。然個人力微量薄，且四十年來，與大陸隔絕聯絡，在國內無一熟識的朋友可資響應，因此只有將此理想和行動埋藏心底幾十年。

今諸位毅然發起為國內同胞爭民主自由的運動，正吻合了我幾十年來的盼望和理想。今後除將全力支持你們獲致此一崇高的理想和目標成功而外，還將向你們提出建議。以我以往從事政治、經濟、法律以及在國際事務上的各種經驗，深知從事民主運動的艱巨，必須有精密的組織，廣泛的財源，核心的領導人材，正確的綱領和廣大的群眾支持力量，以及進行運動的詳確執行計劃。如能具備這些條件和力量，成功將是事半功倍的。因此我熱切的盼望與你們作一長談，除了相互了解而外，並可交換意見，探討今後發展運動的可能和具體計劃。專此函達。並祝 籌安

一位老華僑 匆上  
八二年十一月廿二日

## 「……對民主改革進程的打擊」

王炳章先生：

剛才吃飯時，聽到王紹光同學談到你決定留在美國，“以爭取中國的民主”，我感到震驚。

幾天前，當我在《華僑日報》上讀到您在博士論文上的獻詞，我曾經為你感到驕傲，我甚至也曾暗自打算：將來我的論文出來時，應該寫些什麼樣的獻詞？

然而，現在……

也許我不應懷疑您的決定的動機確是“爲着中國的民主化”，然而我覺得應向您指出，您的決定客觀上將是對中國民主改革進程的打擊。您之所以能夠出國學習，只是在七六年以後才有可能；然而至今能有機會出來學習的人與中國衆多的人口相比較仍是少得可憐的。中國進一步的民主化，需要有更多的留學人員，吸收西方最先進的科學觀念和合理的民主觀念，也就是說，需要中、外交流之門開得再大一些。然而您也知道，由於最近一系列叛逃事件，中美交換計劃已經受到了限制；我不知道由於您的決定，又將會有多少優秀的中國青年喪失掉出國深造的機會。我希望，當您以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來美化您的行爲時（像某些人曾經做過的那樣），不要忘記了，您的“自由”是以多少人的前途的犧牲爲代價的。當您宣稱，您所致力的是“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繼續時，請不要沾污了這些熱血青年的真摯理想。

我與您素不相識，因而我也不期望我的這封信會對您發生什麼影響。作爲個人，您有權利決定您的前途；然而您沒有權利隨意用中國民主運動，“北京之春”這樣一些莊嚴的名字爲您個人的行爲辯護。

最後，真摯地希望您不要像那些沒有責任感的人做那些使“親者痛，仇者快”，使人民和祖國蒙受恥辱和損失的事情。

李振勳八二，十一，廿三

中國科技大學七七級學生

又及：此信寫的倉促措辭也許激烈了一些，如果是這樣的話，請不要介意。在某些人眼中，您被認爲是中國大陸留學人員的代言人；而我

，作爲中國留學生的一員，有必要向您表明我自己的觀點。也許我們的動機都是爲着中國的民主，但我不能不對您的決定所可能產生的後果感到震動，我認爲您的這種道路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不可能有較大的推動，反而是害多利少。也許我不應當過份責備您，因爲由於這個決定，您已經犧牲了很多東西。我祝願您保重。也祝願您所選擇的能成爲爲國爲民有益的事業，而不是相反。

“一槍打死你！”

王炳章、吳榮根：你這兩個反骨仔，認賊作父，賣國求榮，一如汪精衛之流，你們還有面目見北美華僑，終有一天一槍打死你，有骨氣者來溫哥華一行，美國總統還要親身去北京，國民黨嗚呼！大世去矣。

無名氏

“小平同志是個改革家”

王炳章先生：

看了你的政治綱領，有很多擔心，特向你提出：

第一，中國很窮，是個脆弱的，再也經不起折騰的國家。因而，改革的途徑不可循暴力或動亂的方式，而應循改良的方式。魏京生是過於激動了一點。

第二，台灣不是民主的，這裡的許多報紙報導了這一點。事實上，它有許多比大陸更腐朽的東西，有些人只看到台灣的經濟發達，但經濟發達並不等於政治進步。因此，在批評時，不要使親者痛，仇者快。

第三，不要作出鼓勵別人不回去的架勢，祖國之所以送出這麼多學生，是爲了讓他們回去服務。人民在艱辛中抽出血汗錢來，不回去是對不起人民的。

第四，中國的毛病是封建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對中國現在來說，毋寧說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中國現狀可想而知，因此，不要多批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

第五，蔣經國是蔣介石的兒子，是中國到目前為止的象徵性的封建家王朝，他高喊“三民主義”是一個騙人的幌子。大陸的許多領導人是很好的，總理和彭德懷等，望多宣傳點他們的美德，人民懷念他們。小平同志是一個改革家，這在歷史上是不可磨滅的，（如果循這條路走下去，既使你們現在很困難，將來回去的中國留學生們是會給你們在中國澄清的。）希望你們最終是屬於祖國的。

一個中國留學生

八二年十一月廿三日

“沒有政治的民主化，就沒有四個現代化！”

國家是人民的，社會由人民組成，並不是黨的天下。中共是執政黨，理該把中國的事情搞好，有了錯誤，就該讓人民起來說話，不僅要有這個風度，還應有這個制度，現在是連“四大”都取消了，無論憑藉什麼借口，都不容許剝奪掉人民的基本權利。積三十年痛苦經驗，這一點還不能清楚嗎？

我想無論如何，目前一定要爭取到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罷工的自由，要有民辦的刊物、報紙，決不應容許“一黨專政”，他們犯了錯誤百姓跟着倒霉，這合理嗎？像現在這樣，只有在國外才有發表討論，批評中國問題的機會，實在是時代的悲劇。

我不喜歡資本主義制度，窮的窮，富的富，財富的浪費集中於少數人，資本主義是不人道的社會。但是我也不喜歡共產主義，我從大陸來，親身經歷種種不平，尤其是中共的各階層領導，與官僚無異，他們已與人民處於對立的地位，暮氣沉沉，拖拖沓沓，目的不在於國家和人民，一心一意謀私利。“沒有政治的民主化，就不可能有四個現代化”這句話我非常的贊成。

希望通過您們的努力，連絡起在海外的華人，造成聲勢，爭取到起碼的權利。希望不久再能收到從大陸寄出來的民主刊物，結束從海外辦刊物不幸局面。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愛我們的祖國，希望祖國一天天好起來，正因為感覺自己是民族的一份子，所以有責任關心，有責任承擔應担的義務。

多米尼加：鄒曉民

八二年十一月廿九日

「國家沒有真正的民主自由，科學家也無法施展他們的才能。」……

《中國之春》編輯部：

讀了《告海內外同胞書》後，我不禁熱淚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你們說出了我們平時同樣想，同樣思索而不敢說出的話。我也是一位和王炳章一樣的公費生，不久，也可望獲學位。多年來（或可說幾十年來）埋頭於業務書堆和研究中，未擺脫精神上的苦悶。雖深感我民族長期之痛苦，缺乏民主，但身不由己，只能任人擺佈。國內民主運動興起之時，曾使我激動過，興奮過。我喜歡擁到街上；閱讀大字報。但後來看到民主運動一一遭鎮壓，不禁暗然嘆息。

多年來，我追求的是一條科學救國的道路，雖然明知國家沒有真正的民主自由，科學家也無法真正施展他們的才能，但畢竟是條安全現實的道路。我們已成家，有家庭和孩子在國內，情況和處境不同，但相信可以像你們宣言中所講的，回國以後，也許我們會走上重要的崗位。我們帶回國的不僅限于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且有先進的自由民主思想和管理體制，積極向民衆宣傳民主與法治的觀念，在盡可能的條件下，實行局部的民主改革，以造福於國家和人民。

從你們身上，我看到了年青的，有希望的，思索的一代在成長，我們國家將來還是有希望的。希望你們在「不斷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成為為民請命，為百姓謀福利的真正辯護士。同時，希望你們注意策略。注意在國外的安全，也要保護國內人士的安全。望保重，盼順利。今滙上美金二十元作為聲援。但願某日在祖國的大地上重逢。

大陸留學生 春草

八二·十一·廿九日深夜

「人生在世，短短數十寒暑，所為何來？自當為自己心中所肯定的目標，全力以赴。」……

從報上讀到有關你們的報導後，曾使我激動得數度落淚，久久無法自己。隱藏在我內心深處的希望火種，再度被點燃起來。誠如我所盼望的，北京之春並沒有沉寂，更沒有強權扼殺。

我是一個生長在台灣的女孩。從孩提時代起，就從父親口中得知我的故鄉在遙遠的大西北，那個被稱為塞外的地方。那兒有成群的牛羊和一望無垠的草原，更有濃厚親切的鄉音。這些對生長在海峽另一邊的我而言無疑是陌生的，但又好像是熟悉的。每逢過年過節，父親思鄉又懼鄉的矛盾心情，都在觸動我的心靈。中國啊！我偉大的母親，為何妳是如此的不幸，如此的多災多難！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不平等條約、日寇侵華……，這一切的苦難難道還不夠嗎？人民是何等的無辜，到了今天還要忍受日夜思鄉恨不歸的痛苦。一道海峽，一隔卅年，究竟是誰的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一個說是「解放」，另一個說是「淪陷」，到底誰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呢？海峽兩岸的今天，一邊是「萬馬齊瘡」，另一邊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卅年的歷史，似乎誰也不會「漂亮」過。而「黨即是國」的封建觀念，又要何時才能真正從中國的土地上連根拔除呢？唉！民主在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啊。

我是一個廿幾歲的女孩，不曾經歷過上一代流離戰亂的痛苦，也未親逢這一代文革幻滅的教訓，更不是什麼政治家或經濟家，祇不過和其他台灣同胞一樣，屬於廣大芸芸眾生的一份子。祇因生于今日的中國，有感於自己國家坎坷的命運，愈覺得無法卸下肩上這無形的担子。那種無奈又驕傲的情感，使我雖知自己渺小如滄海一粟，但仍願在有生之年，為她流血流汗。

人生在世，短短數十寒暑，所為何來？自當為自己心中所肯定的目標，全力以赴。

我們雖然生不逢辰，未能享有黃河水清的盛唐之世，却有幸得此可以表現熱血節操、民族尊嚴的最佳時刻。讓世人看我中華兒女的不屈不撓，大義大烈，是何等的神聖、何等的偉大。我們曾有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八年抗戰，而今又有李一哲、天安門事件、北京之春……，這些都是血淚滙成的，任哪一個獨裁政黨都無法改變的光榮歷史。每當思及至此，往往激動得徹夜不眠。一九七九年，自己曾為北京之春興奮過、憧憬過；也曾為隨之而來的鎮壓事件對鄧小平痛心過、失望過；更為台灣對此事反應淡漠而汗顏過。然而，真理是永不孤獨的。王希哲的十四年徒刑曾帶給我長夜的痛哭和短暫的絕望，但隨即而來的，是海外知識分子聲援的正義之聲。也許這是一條極漫長艱辛

的路，但我對中國的民主運動充滿了信心。現在貴刊的誕生更堅定了我的信念。對於貴刊能否在台發行我尚抱懷疑態度，但我將永遠是你們的支持者。我將盡一己綿薄之力，聊表此心。

昔日杜工部有云：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襟。但今日的民主鬥士，王希哲、魏京生、劉青、徐文立、何求……，他們永遠都不寂寞，成千上萬的中華兒女都是他們的戰友。此請編安！！

台灣 袁小姐

一九八二、十一、廿

「渴望民主的強烈要求有如地火在運行。」

歷史的車輪只能向前進，一切企圖停滯不前和倒退的人都終將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中國需要民主政治，中國能夠走上民主政治的康莊大道，這是歷史的必然！閉關鎖國、愚弄群眾的故伎再不可能在中國重演，人民再不能作為一小撮政客玩弄權術的犧牲品。中國的知識份子階層和各界有識之士，在十年動亂中汲取了教訓，增長了見識，提高了分辨能力，都有相當清楚的是非觀與政治要求。他們對「四人幫」垮台後的新政權寄予厚望，他們並不僅僅滿足於物質生活的改善，他們更需要的是呼吸民主自由的空氣。僅為溫飽而奔忙是動物的本能，而他們是人，是比那些當權者並不低能的人，他們或多或少地了解中國千百年來的歷史；他們或多或少地能夠分析比較現政權與千百年封建專治統治的異同與相同。盡管他們對「共產主義是天堂」的鼓吹者們的一套理論似乎是麻木了；對新當權派的施政鐵腕似乎已經就範，但那只是因為民主運動剛剛被扼殺在搖籃裡，使他們暫時處於黑暗中的徬徨。事實上，渴望民主政治、掃除封建專治統治的強烈要求，有如地火在運行，隨時有爆發的可能。你們的《中國之春》正是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強大「地火」，終有一天會像火山噴發一樣，把中國的封建專治統治的餘孽連根燒光！

為了那一天的早日到來，我願意成為你們戰鬥隊伍中的一員，為中國民主運動貢獻力量。

大陸留美一教員

『人民的命運，再不能受一小撮「孤家寡人」特權階層的擺佈。』……

我在中國大陸生活四十餘年。自幼年入學到大學畢業，可以說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回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時代，也曾對中共有過信任和崇拜，對所謂「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有過美好的嚮往，並曾狂熱地表示過願為它的實現而奮鬥終生。然而，嚴酷的現實使我純真的信念一個個破滅。我深感自己的半生是在一個妄圖使人變得蒙昧無知的騙局中生存，在一個沒有絲毫民主和人權的環境中苟活，真是使人窒息到再也無法忍受的地步。我從被蒙蔽無知，到迷惘徬徨，而終至覺醒。正如「中國之春」發刊詞中所說『我們終於覺醒到「共產主義是天堂」的鼓吹者，正是自毀那通往「天堂」的道路的破壞者。』我從實踐中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美好的未來，決不能靠現有的中共政權和制度來開拓，十億同胞的命運再不能受一小撮「孤家寡人」特權階層的擺佈。因此，我當年也曾在中國北方的家鄉，響應過天安門廣場的「四五」運動，投入過爭取民權、法制的民主運動風潮；同時，也目睹了民主運動的被摧殘、被扼殺……

經過那「忍看舊朋成新鬼，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艱辛歲月，我輾轉籌措，終於投親來到日本東京。我離開祖國，絕非想做苟且偷安的流亡客，而立志要獻身中國社會的改革。您們在美州創辦「中國之春」的義舉，給我以莫大的啟迪。這一行動，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民主運動方興未艾，接棒有人，無論中共如何地殘酷迫害，民主運動堅韌不拔的根枝總將吐芽、開花、結果。「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向世人頑強地顯示了她巨大的生命力與必勝的前景。

我今自薦願做「中國之春」駐日本東京的義務記者及發行人。日本有很多華僑，他們都渴望看到大陸民主、自由春天的早日到來。倘若「中國之春」能在日本發行，一定會有廣大的讀者，也一定會給您們以極大的支援。如果同意我的上述意見，請來函聯系。

日本 東京 陳明照

「眼見海外華人的各種現狀，更有一股強烈的民族屈辱感和因之而起的自尊心，使我無法平靜。」……

前數日在報上見到關於《中國之春》的報導，大為振奮。我是來自北京的自費留學生，赴美已近一年。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上學校，親眼見到從那年底到七九年期間西單民主牆運動以及前後發生的中國民主運動的種種影響和遭遇。我也讀過「北京之春」，後來知道，我所在學校的二位師生還是該刊物的作者。在民運遭到鎮壓的時候，我同所有熱血青年一樣，由希望轉為沉默。

來到美國，在萬分孤獨之中，對苦難祖國人民的關注和感情更為深沉。一年來，許多大陸青年投奔西方或台灣，對此我的看法是複雜的。我知道他們的行動是消極的。我絕不譴責他們，但也不贊許。中國怎麼辦？我們怎麼辦？現在，我終於見到了海外中國留學生中真正的愛國者，真正的仁人志士，真正的好種。我的感奮和敬佩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如同魯迅所說的：你們是「地底下的」「中國的脊梁」！我們如同見到活着的秋瑾、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魯迅、聞一多、張志新、馮羅克那樣的人物。

你們會遇到許多困難、危險、我甚至為你們的安全擔心。但我相信，你們走出這一步，是已經將生死利害置之度外了，我深切地希望你們堅持下去。從目前你們發表的文章和言論看，你們沒有嘩眾取寵，虛張聲勢，天真幻想，不切實際的毛病，是踏實而成熟的一群。「中國之春」是應運而生，是歷史和時代的必然。我確信海內外正直的中國人都站在你們一邊。

我個人，可悲的是仍然無法擺脫怯懦和顧慮，從現在起就為您們做一些事情。即使投寄此信，也不能留下我的真實姓名和地址。因為我的眷屬還在國內，我們必須團聚。而在某一專業，國內的同行都知道我。鑒於由來已久的原因和經驗，使我不敢輕易露面。經濟上，你們了解自費生普遍的窘迫境況，但仍願意隨信寄上目前我能拿出的一點點錢。

我不會永遠緘默，也不甘緘默，今後一旦可能，我一定會像你們那樣，做一個真正的人，說心裡想說的話，見諸文字，參加你們的事業。

向你們致敬！ 緊緊握手。

大陸留學生 姣洛

一九八二、十一、廿六

「只要中國一日不自由，我們就一日不能回去。」……

我曾與幾位朋友談論中國的分裂、落後、政治狀況及許許多多問題，大家一致認為中國一定要統一，但是決不能使用武力自相殘殺。我在台灣出生成長，十四歲時和父母移居美國，我不願看到這塊土地受到任何損傷，更不願她變成生離死別的悲慘世界。我的父母來自中國大陸，他們日日夜夜盼望着能重返家園。這塊廣柔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我所熱愛的，神往的。我期待有朝一日能站在那裡吸吸祖先們曾呼吸過的空氣——中國的芬芳。這是我的夢想，也是千千萬萬海外華人的夢想。

然而，只要中國一日不自由，我們就一日不能回去。許多朋友告訴我，他們想去中國貢獻所學的知識，我也有同樣的願望。如果共產黨能改革掉腐敗的官僚制度，知人善用，勇于採納各種建議，以建設國家，為人民謀福利為唯一宗旨，那麼，在如今百廢待舉的時候，必定有無數學有專長而浪落異鄉的華人會收拾行囊，競相歸國。可是在目前專制政府統治下，這根本不可能實現。

要使中國人不再痛苦，唯有在中國徹底實行民主制度。我一直在等待着能有一股強大的民主革命勢力在中國出現。現在，這個運動已由海外發起，並將擴展為強大的勢力，為國內民主運動相呼應，造成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迫使任何專制勢力為之低頭。

我是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很希望為「中國之春」貢獻我微薄的力量，請進一步來信聯系。 敬請保重！！

洛杉磯 唐炫華

「精神俱樂部」

你們勇敢地發起這一運動，倡導實行民主，使我內心的掙扎，產生了一個歸向。希望你們「中國之春」成為我的精神俱樂部，更盼望有更多的中國留學生，都來支持，把「中國之春」運動，發展成為救國事業。

「中國之春」在這個嚴冬裡開始播種，希望明年春天能看到它的萌芽茁壯。「中國之春」永遠需要陽光、水份和肥料。以我這個留學生的立場和觀點，我希望「中國之春」應該廣結海內外力量，不但支持大陸上的民主運動，還應該在將來財力允許的情況下，設立中國留學生獎學金，或是成立會員服務社之類。

最後，我希望「中國之春」能很快來到西部。請接受我對你們的熱忱，我願意在課餘之時，有力出力，有文章出文章。從今天開始，我已屬於中國之春的一份子。希望能得到你們更進一步的聯系。

敬祝中國之春的光輝普照

大陸留學生 陳偉實

于一九八二、十一

「大陸的民主運動，必須與台灣的民主運動聯合起來」……

自從在報上看到「中國之春」的消息之後，我忽然覺得被烏雲掩蓋的中國大陸，出現一線曙光。大陸同胞在中共暴政統治之下，沒有思想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沒有行動自由，甚至於沒有結婚的自由，這還是「人」的生活嗎？你們這些具有道德勇氣的青年人，現在挺身而出，反抗中共的暴政，我是由衷的敬佩。我是原大陸選出來的立法委員，也是一個民主運動的推動者，對當前的政治曾毫無保留地批評，有時也會觸怒當道，但是，他們並沒有把我送進牢裡，由這一點看來，我比魏京生、王希哲等人幸運多了，這也許是我肯定這個政權的原因。

你們應該了解，大陸的民主運動必須與台灣的民主運動聯合起來，共同奮鬥，中國才能踏上民主之路，也惟有走這條路，才能達到統一中國之目標。今後我們應該時常取得聯系，交換意見與經驗，使中國的民主政治早日開花結果。隨信寄上質詢文三篇，以供你們了解我對國事的關懷。

敬 祝

你們成功

費希平啟

十一月廿七日



我算不得民主運動的戰士，如果我是的話，我就會留在國內做馮羅克、魏京生、劉青，而不是怯懦地跑到國外來了，充其量我不過是這場運動的一個同情者而已。然而我願以自己的一點微薄的經濟積蓄和一支笨拙不靈的筆給「中國之春」以支持，向「中國之春」匯聚進點滴的力量，如蒙不棄的話。隨信附上滙票一張（\$一百），如果可能，盼寄「中國之春」書三本！

願

中國之春長駐！

大陸訪問學者 魯平

### 王紹光同學的來信

王炳章： 你好！（稱“同志”，不知你是否選與我們“同志”，稱先生，又怕你不舒服，故略去稱謂）

我先自我介紹，我叫王紹光，原在北京大學念法律，現在康奈爾大學修政治學。

我也曾是西單民主牆的熱心支持者，在本來已是民主味很濃的北大校園裡，我也算個激進者，北大的幾個著名民刊領導人，我都熟悉他們的觀點和他們本人。與王軍濤還有不少交情。我出國前，曾參與組織北大的一個“政治研究會”（專討論現實問題），王軍濤及北大幾個最激進的同學也是其成員，我們曾開過很多次討論會。我之所以說這些，意思只是我覺得我知道國內民主運動的主要方向，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我不知道王軍濤和他的朋友們知道你的決定後具體會說些什麼，但我相信他們也會像我一樣認為你走錯了路。

從報紙上看到你十一月十七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後，覺得你想報國的精神可嘉，但你選擇的道路，恕我直言，很難使人相信可以報國。

你說，你的主要目的是要爭取中國的民主，要沿魏京生、王希哲的道路走下去，但我不清楚，你是要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要資本主義民主。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你沒有表明態度。如果你要的是資本主義民主，那麼最重要的首先不是民主，而是要在中國來個“推倒重來”，先建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然後再談“資本主義民主”。我不認為魏京生、王希哲

要的是資本主義民主，至少他們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你如要資本主義民主，又稱“循”魏京生、王希哲的道路，我想魏、王會不肖與你為伍。你如果要社會主義民主，那麼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爭取另一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的民主，不免有點滑稽。這也很難使中國老百姓和中國領導人相信你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如果你的誠意受到懷疑，你的建議和批評只會受到社會主義中國的敵對份子的青睞，而遭到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唾棄，不客氣的說，你的聲明給我在康奈爾認識的中國人的印象是又出了一個敗類。我希望你不是一個敗類，而是一個真正報國的正直中國人。

在中國要不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方面，是不存在問題的，中國的老百姓和中國領導人都懂得有擴大民主的必要性。重要的不是“過河”這個目的，而是如何“過河”。我不知道你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了解多少，也不清楚你對西方的民主發展過程了解多少。我在美國學習的課題是中西政治傳統的比較。恐怕你也會承認，中國的政治傳統是一元化的，也就是專制的。二千多年的政治傳統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不是靠吶喊幾聲就能解決的。鄧小平、胡耀邦幹得如何，不是這幾個領導人主觀意圖能解決的。中國十多億人，各種人背景不同，政治、經濟上的要求也不同，三十年來黨的錯誤又造成了堆積成山的問題，而諸多問題中，吃飯問題又佔首位，所以三中全會以來，經濟和政治制度改革情況的材料，目的是分析黨中央意圖發展的方向，結果證明，短短三年中，已有很大成就，而且發展方向正是朝逐步擴大民主的方向走。我們可以不滿足已有的成就，我們可以批評發展時有逆流，我們可以提出還有一些似能辦到的事還沒有辦，但我們不能否認已經取得的成就。我們曾設身處地地想，如果我們處在決策地位，我們是否能幹得更好，結論却不敢樂觀。一旦深入了解中國面臨的各種問題，很多以前滿足於“一天一個新主意”的民運份子，也更深沉了。是否你的錦囊中就有最好的妙計，我們從你公佈的材料中還未見端倪，根據我以往的經驗，我趨向於不相信你有很成熟的想法。你在擴大民主的必要性方面可能可以拿出一套又一套理論，但我相信這些東西沒有你在國外辦一個雜誌，國內的人也知道。我們不再需要機智的表達，我們需要深刻的，切合中國實際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在國外很難提

供。如果你真想救中國，我希望你當麥德維杰夫，不要當索爾仁尼琴。是強者，就站到第一綫去。第一綫在中國，而不是在美國或其他什麼地方。從另一個角度講，就算你說的東西百分之百對中國發展民主有利，你在美國辦的雜誌，對中國又會有什麼影響。除非你心甘情願以當什麼人的工具為代價，你的雜誌根本不可能為中國老百姓所知。而且辦雜誌談何容易，留在國外談何容易，你的講話公佈後，多少股勢力注視着你，那些訓練有素的特別工作人員，一定可以找到一條途徑，使你成為反對社會主義中國大合唱中的一個小伙計，你不願也由不得你。你如還自稱愛國，要救國，應恥於扮演這種角色。

既然你已決定留在國外，我倒有一言相勸，把“中國之春”辦成一個客觀的中國報導刊物，不要成為“七十年代”第二，“爭鳴”第二，“世界日報”第二，“美州華僑日報”第二。總之要另闢新徑，不製造聳人聽聞的消息和理論，實事求是介紹和評價中國各項事態的發展，切切避免成為對中國心懷敵意的人的工具，切切避免不自覺地成為歷史的罪人。

你是七九年出國的，我是今年八月出國的，我對國內民運近年來的發展比你更了解，如果你只是通過港、台刊物對民運的發展有所了解，又只與國內幾個相投的朋友有情況交流，那麼，你自詡“北京之春”的繼續有些不妥。王軍濤是“北京之春”主編，我八月份出國前，還與他聊過幾次，他的思想狀況與你的不一樣。他今年大學畢業，沒考研究生，雖然志在搞政治，但他也愛他的專業，他打算到一個基

層單位去工作。很多像他一樣的民運積極份子處在“反思”階段，最先行的，已超越反思階段，立志從實處着手，進行有利於社會主義民主的工作。在反思階段，大多數人的理論修養提高了，看問題時更注意擺脫“直覺”，對“熱情”的運用也更為謹慎。當然，國內民運有很多派別，從共產主義者到“基督徒”都自稱民運份子，我所知道的大多數民運份子是共產主義者，他們與其各種民運份子有原則性分歧。你稱你代表國內的民運，似應先“正名”，你是那類的“民運”。

我對國內很多事也看不慣，覺得亟待解決。我認為，我們的社會制度要遵循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進行改革。但我對中國的前途很有信心。我學完後，要回國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甚至不想在這裡拿博士學位，只打算待兩年就回去，因為，我的事業在中國。國內存在的問題就是一種挑戰，應戰是人生的一大樂趣，我希望越早投入這個事業越好。

我希望你能回信。康奈爾有不少對中國問題很有興趣的中國人，我們常常討論。你的回信，可能會成為一次討論的話題。

第一次寫信就有些不客氣的話請原諒。不過，如果你要去台灣或打算從台灣尋求支持，不必回信了。因為，從台灣那種特務政權立場搞“民主”，這種“民主”和它的提倡者皆可休矣。我也羞於與之聯繫。

祝

編安！

王紹光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一日晚

## 答王紹光同學來信

— 李浩然（中國留學生）

〔編者按〕：本刊編輯王煥鑿收到原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現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系就讀的中國公費留學生王紹光的來信。因王紹光同學的來信是批評性的，本刊決定全文照登。此外，王紹光同學在來信中談及一些重要的涉及中國民運和『中國之春』的問題，并希望

得到回答。故本刊編輯部請了本刊特約通訊員，中國公費留學生李浩然同學撰文作答。現將來信和回信一并發表。我們希望讀者能就這兩封信及其涉及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把有關中國民主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這也是本刊創辦的宗旨之一。

王紹光同學：你好！

“中國之春”編輯部將你給王炳章同學的來信轉給了我，并建議我，（一個與你一樣的公費留學生）談談自己的看法。

你在來信中提出了一些問題，也表示了一點願意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的願望。但是，坦率地說，在整個來信中，說話缺乏邏輯和批評沒有根據的成分居多。（看來十年“文革”中流行的“批判”方式在我國青年一代身上留下的痕迹太深了）。我無意“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就你在來信中涉及的一些理論問題和具體問題作一些質疑。不妥之處，請來信再作討論——只要是據理力爭的，我們歡迎。

## 一、關於民主的性質與中國目前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

你在來信中提及你不清楚王炳章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民主”。并且認為如果是“資本主義民主”，則意味着要在中國“推倒重來”，“先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然後再談資本主義民主”。問題本身提得不錯，但也給你自已製造了許多新的難題。

首先，什麼是“你定義的”社會主義民主”？換言之，這種“民主”的具體內涵是什麼？這種“民主”與你所不齒的“資本主義民主”之間有什麼歷史的和現實的聯繫？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有沒有實行過這種“社會主義民主”？如果實行過的話，是在哪一個歷史時期（如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或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等等）實行的？在這些歷史時期內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民主”有沒有制度化？在多大程度上被制度化了？這種“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行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九五九年的“反左傾”、十年“文化革命”和目前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有什麼聯繫？如果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並沒有或者基本上沒有實行過“社會主義民主”的話，那又是實行的什麼“民主”或“專政”？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自成立以來，沒有實行過幾天“社會主義民主”而只是以無窮無盡的政治鬥爭、政治運動和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專政來充斥它的政治生活的話，它配稱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嗎（僅從政治角度而言）？你在來信的中間部份提到，你現在在美國學習“中西政治傳統的比較”，并且發現“中國的政治傳統是一元化的，也就是專制的。這裏的問題在於你是否認為這種“一元化的”、“專制”的政治傳統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政治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如果它沒有佔據主導地位，你怎樣解釋三十年來的一系列以控制、鎮壓和摧殘人民甚至共產黨內的不同意見為目的的政治運動？你怎樣解釋在過去三十年的一黨專政和黨內的一人專政？你怎樣解釋整整卅年沒有真正的反映人民意願的自由選舉和言論自由？如果這種“一元化的”“專制的”政治傳統在過去三十年中佔據了主導地位的話

，你又怎樣對這個政治制度下定義？一用一個含混不清的“詞”：“不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退一步講，即使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這兩個歷史時期（有人稱之為三十年中的兩個“黃金時期”）中，是否實行了“社會主義民主”了呢？換言之，在這兩個歷史時期中，我國大多數人民享受了多少出版、言論、結社、集會、選舉等自由？獲得過多少民主權利來監督、批評、制約以至反對執政黨呢？這兩個歷史時期的我國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的發展與五七年的“反右”和六六年開始的“文革”之間有什麼內在聯繫？毛澤東的個人法西斯專政和“四人幫”的“全面專政”是否就是個人的“錯誤”和“歷史傳統”的影響，還是有其深刻的制度上的原因？！為什麼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有類似的現象（如蘇聯的三十年代大清洗和東歐各國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大清洗，等等）？

其次，什麼是“推倒重來”？是多年來官方一直用來吓唬人民的“資本主義復辟”嗎？遺憾的是，中國的過去既沒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沒有“資本主義民主”（即所謂的“資本主義發展不足之苦”）。因而，僅就邏輯上講，即使有人要求實現“資本主義民主”，也不是什麼“推倒重來”（因無“重”字可言）。問題在這裏可以一分為二。第一、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資本主義民主”？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我想你應該有能力回答這些問題，因為你在國內是學習法律的，在這裏是學習東西方政治比較的，而更為重要的是，你有在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生活的經驗）。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民主”從何而來？它與“資本主義民主”之間的關係如何？“民主”，當然有其一定的質的規定性，但也有其量的規定性和可比性。僅僅空談“民主”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不具體地分析它所包含的內容，這樣的“社會主義民主”不過是一塊騙人的招牌而已。離開了一定的量的分析，質的定義就成了空洞洞的名詞。這正是三十年來我

國官方“理論”關於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民主與專政之類的範疇的“辯證法”的要害。問題的實質在於，當人們談論民主的時候，人們不應該僅僅停留在抽象的名詞爭論上，而必須具體地涉及一些量的範疇：如人民以什麼方式來選舉、任命、監督和撤換官僚；人民有多大的權利來批評執政黨；人民有多大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和罷工自由；以及把不同政見的個人或社會集團（他們可以是社會中的少數派）享有什麼樣的社會地位和權利，等等。抽象地宣佈自己搞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并不說明任何問題。問題的要害是，你以什麼具體的制度上的措施來向人民表明，你的“民主”是在量上和質上都高于“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中國當權者的三段論是這樣的“社會主義民主”是高于“資本主義民主”的民主（大前提）；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小前提），所以中國的“民主”高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結論）。然而，

無論這個大前提還是這個小前提都是大有疑問的。人們需要知道的是爲什麼“社會主義民主”實際上是高于資本主義民主？爲什麼中國實行的是這一高于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中國當權者有什麼事實根據標榜自己已經實行了這個“社會主義民主”？

第三、什麼是“社會主義”？三十年來，中國是否建立過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是否是“社會主義”的？如果是的話，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制度”？它的“高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何在？如果不是，它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你和你的朋友們又準備以什麼方式去實現你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民主”？（即你在來信中提及的“如何過河”的問題）。

據趙紫陽所言，中國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的”。其論據有三：(1)公有制；(2)按勞分配；(3)計劃經濟。

這裡我們暫且不去討論他的定義是如何與古典的馬克思們的理論相左，只是具體地對他的三個論據作一點小小的質疑。

(1)什麼是公有制？國家所有制和由國家官僚直接地和嚴密地控制的“集體所有制”是否簡單地和直接地等于“公有制”（即全體或至少部分人民所有）？這裡，問題的實質在于究竟怎樣去判斷一個所有制的性質？是僅僅根據它的“招牌”或者它的最大受益者集團的自我標榜，還是根據對這個所有制制約下的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各個因素的活動狀況及其綜合的具體分析？所有制形式不是一塊抽象的“招牌”。恰恰相反，它的性質要取決于不同社會集團在整個社會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分配過程和消費過程中對生產資料和社會產品的關係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以馬克思爲例，他在『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和論述方法的起點不是先簡單地給他的研究對象套上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然後才展開其論述的。恰恰相反，他的起點是“商品→資本”。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分配過程和消費過程的具體分析說明資本爲什麼是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物，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此，馬克思才得已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矛盾和性質。你如果還自命爲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的話，爲什麼不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只語片斷）來剖析一下中國目前的經濟制度呢？

同樣，當人們談論“公有制”（不論是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時，人們也必須回答爲什麼這是“公有制”而不是一個特殊形式的“私有制”或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或階級（如吉拉斯所言）的所有制。人們必須在分析了這個所有制下的社會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分配過程和消費過程之後，才能判斷這一經濟制度的實質或階級屬性，即誰真正擁有和控制生產資料，以及什麼是這個經濟制度下社會再生產的真正目的。例如，我們必須具體地研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以及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關係（可以先假定不是階級關係），工人和一般技術人員在企業中的地位、權利、對企業決策制定

的參與和監督的方式和程度，他們與企業管理者們（首先是那個“領導一切”的黨）的關係，他們對國家經濟計劃和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發言權和批評權，以及在這種現實的經濟關係中他們的主觀意識即有沒有和有什麼樣的“異化”等等。我不清楚你的個人經歷。如果你曾在我國的任何一個企業（不論工、農或商）工作過一個較長時間（不是幹部“參加勞動”式的“鍛煉”），是不難實事求是、心平氣和地回答上述問題的。如果你沒有這樣的經歷，我倒有一個建議，即利用一、二個假期去你學校附近的工廠裡與美國工人們談一談（最好與他們一起工作一段時期），了解一下他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作爲社會調查。俟你回國後老老實實地到幾個工廠中去與我國的工人農民作廣泛的接觸并將他們的各種情況與你在美國所作的調查結果進行比較分析，看看他們的社會地位，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權利，他們的意識形態以及他們的“異化”狀況究竟有什麼共同點與不同點？

再看流通過程、分配過程和消費過程。我國的工人（包括商業職工）、技術人員和農民在上述之過程中的地位、權利和作用如何？我國的國家官僚們的地位、權力和作用又是如何？我國的工人、技術人員和農民（成份小一些）是否在出賣勞動力（當然是在強制的“實方”壟斷價格之下）？他們是否生產剩餘價值？如果他們沒有生產價值，我國的龐大的國家官僚機器靠什麼來維持？國家（或黨）官僚們的經濟特權怎樣行使？幾十億以至幾百億的被形形色色的“土躍進”或“洋躍進”所浪費掉的投資又從何而來？如果他們生產了剩餘價值，這些剩餘價值去向如何？它們的瓜分、使用和消費是否符合我國工人、技術人員和農民的利益和志願？再進一步，什麼是國家官僚們的經濟特權的階級性質？這種性質與整個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質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國廣大人民和一小撮國家官僚之間的“收入差距”（income gap）到底有多大？這種差距（gap）是否爲合理的“按勞分配”？這裡討論的是人與人的關係而不是物與物的關係。換言之，如果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藉它對國家機器的壟斷和控制，排他地決定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及其產品的分配與消費，并且實際上享有幾乎是無限制的特權，而其對立面——廣大工人、技術人員和農民則處于一種無權參與和監督各級經濟決策和企業管理而被迫在國家強制的壟斷價格下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註），并且僅獲得勉強溫飽的收入，人們憑什麼說社會生產資料是屬於人民而不是由那個特殊的社會集團——國家官僚所壟斷地佔有呢？！這實際上仍然是一種私有制，一種特殊形式的私有制，即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以國家、社會或全體人民的名義來壟斷地佔有和“使用”全部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它與其他形式的私有制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在這個特殊的私有制形式下，這個特殊的社會集團不是以個人，而是以整個集團——國家一黨官僚集團的形式來壟斷地佔有全部生產資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吉拉斯，希克等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才稱這個特殊的社會集團為“新階級”或“國家壟斷官僚特權階級”。

此外，甚至在歷史上，國家所有制也多次出現過。例如，幾千年前，我國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說。以後，封建的中央集權政府直接掌握大片土地并直接組織和控制農業，工業（包括手工業）和商業的例子也屢見不鮮。至少在明末和整個清代，官商和官辦工業還是我國民族私人資本主義不能順利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過去的封建帝王官僚自然沒有聰明到給他們的國家所有制貼上「社會主義」標籤的地步，但他們也常常自榜為「人民父母」。

至于計劃經濟體制能否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基本特點之一，我在此只提出幾個可以作為反證的例子。1. 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經濟體制也是高度計劃性的。2. 戰後，至少在西歐和日本，國家以各種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生活，國家制定和執行不同內容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有化是十分普遍并日益發展的。3. 與此相反，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經濟改革過程中都提出要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儘管迄今為止鮮有成功者）。

「按勞分配」也許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點之一。然而，問題在于我國有沒有實行過「按勞分配」的原則？如果實行過的話，你怎樣解釋社會的一極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水平卅年來增長甚微，而社會的另一極則是一小撮國家（黨）官僚在「合法地」或「非法地」享受種種特權？難道他們的「勞動力價值」真是幾百倍甚至上千百倍地高于一個普通工人，普通知識分子或普通農民的「勞動力價值」嗎？如果「按勞分配」只是在下層勞動者中間實現，而在上層中間仍然是「按權分配」的話，這樣的「按勞分配」對下層人民來說不過意味着「按勞受剝削」而已。但是在上層國家（黨）官僚中間却是不折不扣的「按地位享受特權」。這也是一種剝削（如果我們借用馬克思的術語的話），即國家壟斷官僚特權階級對人民大眾的剝削！

二、關於「北京之春」與「中國之春」以及中國民運的分類。

第一、王炳章用的「北京之春」一詞是指一九七八年秋至一九八一年的中國大陸的所有的民主運動，而不是指「北京之春」一家雜誌。作為曾經介入過國內民運的我們，自然記得「北京之春」雜誌是在中共中央向他們的編輯「打招呼」之後，立即自動停刊的，雖然我們也沒有忘記「北京之春」在中國民運史上起過一些積極的作用。在此，我們不認為哪一位「歷史人物」（不管他曾經在中國民運史上扮演過何種積極角色）有權利憑藉自己的「過去」或自己的「通天的」社會關係來壟斷中國民運——特別當他改變甚至放棄自己原來的觀點和立場時，更是如此。

第二、與你在來信中所說的相反，魏京生（與王希哲不同）在他的文章中明確表示他不

信仰「馬列主義」。

第三、很高興看到你在來信中對魏京生和王希哲作了非直接的肯定評價（這大概是你畢竟還沒有完全忘卻自己曾經是北大校園中的一名「激進者」的原因吧）。但是，你怎樣解釋他們的入獄判刑？你是否認為他們「罪」有應得？你是否認為為了「安定團結」將來的「進一步改革」之類的畫餅以及中國人民的「吃飯（或麪包）問題」，他們不應該說出他們想說而且許多中國人民想聽的話來？他們的理論觀點究竟是否正確？退一步講，他們的觀點正確與否應該由誰來評判？某個或某幾個大人物，還是中國人民？權力和地位是否與真理成正比？即使他們的觀點不對，為什麼不允許他們自己辯護？為什麼不允許「錯誤的」觀點存在？為什麼沒有勇氣展開論戰？難道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就是執政黨一言堂的「民主」，所謂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僅僅是唱贊美詩和官方壟斷所有出版物的「自由」？！你有没有想過，作為一名曾經「激進過」的「西單民主牆的熱心支持者」的你，應該為這兩件冤案（當然還有更多）做些什麼，還是心安理得地勸告他們與其他被捕的民運分子一起，在那暗無天日的現代巴士底獄中耐心地等待那個官僚特權階級中的「改革派」與某些「曾經激進過」的「民運分子」的「聯合改革」？僅僅就王希哲而言，你是否承認他是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鼓吹者？你是否承認他所追求的「社會主義民主」是當權者的「社會主義民主」相沖突？如果你的「社會主義民主」竟然容不得王希哲那樣的「馬克思主義者」，難道人們還需要用更多的筆墨去揭露這種「社會主義民主」的虛偽性和「社會主義法制」的殘忍性嗎？！你斷定魏京生和王希哲不肯與王炳章為伍，理由何在？進一步問，你自己是否願或是否敢與魏、王為伍？看來真正「有點滑稽」的不是王炳章，而是某些曾經「激進過」幾天并以自己的「激進歷史」自耀，而目前已徹底拋棄自己原來的立場的人。

第四、當你談及民運中有不同思想派別時，你當然是對的。你和你的朋友們自譽為「共產主義者」。這在「三信危機」盛行的今天固然令人可敬。但是，你們所信仰的「共產主義」與官方的「共產主義」或「四項原則」是否一樣？與「古典的」馬克思主義有什麼共同之處和不同之處？與蘇聯的官方的「發達的社會主義」有什麼共同之處？與王希哲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又有什麼不同之處？從你的來信中發現，你多少有一些對國內「堆積如山的問題」的感性認識以及對你來美國後所見所聞的「反思」，你是否認為那套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歷史上是行之有效的呢？

在此，我不想給你開一張論及民主和自由的書單子——你的教授們大概已經做了。我只是建議你花一個星期六時間讀一位「古典的」馬克思主義大師——羅莎·盧森堡的一本書，「論俄國革命」。盧森堡有她的歷史局限性（

特別是她并不真正理解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性質和歷史局限性)。但是，在論述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時，她無疑有她的正確之處「自由」，并不是指那些支持當權者的人們的自由。不，那不是自由。自由是指具有與當權者不同的觀點的人們的權利。同樣，如果因為民運中的一些人不同意或反對某一種頗為可疑的「社會主義民主」就取消他們的發言權并送他們進監獄，這樣的「社會主義民主」決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赤裸裸的專政，以鎮壓廣大人民群眾和保護官僚特權階級為宗旨的專政！

作為「北京之春」民運的參加者之一的我，曾經看到一種饒有趣味但却不難理解的現象：某些與最高層當權者有某種瓜葛的人們也是民運的參加者。甚至在運動初期批判「凡是派」的時候，他們還扮演過先鋒的角色——因為他們「通天」而帶來某些「小道消息」。他們是當時的黨內改革派的傳聲筒，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他們沒有，也不想越「雷池」半步。他們是跪着造反的，而且只造某些早已開始失勢的人物的反（這似乎又是十年「文革」的「豐富遺產」之一：造反先找靠山，「批判」先傳「小道」，以及行動先請「恩准」）。當「風向」一變（非常可惜，我國的政治風向一向多變），他們也隨之而變并「實際」起來。尤其令人結舌的是，他們還會立即翻臉反目，一本正經地教訓其他尚未「識時務」的民運「同志」不要破壞「黨中央意圖的發展方向」和連聲附和當局對民運的譴責。按照他們的「邏輯」（？），民運中的派系大概要一分之二：欽定的即御用的和「野路子」。對於後者，除了用「不許造反」四個字嚇唬一番之外，還要捕送官府并繩之以法。他們必未想過民主運動獨立于任何「上層」的控制之外。唯此，民主運動才有其真正的生命力，才談得上「民主」二字。

第五、你自認因你出國較晚，所以對國內的民運狀況較為了解。我不清楚你所了解的民運是屬哪一類？也許都屬於「共產主義者」？（官方的「共產主義者」，還是王希哲式的「共產主義者」？）我也不清楚你所謂的「反思」階段究竟是什麼樣的「反思」？是坐下來讀點書，回顧，總結自己在前一階段民運中的經驗與教訓，更深刻地鑽研理論，調查研究并對那個官僚特權制度作更深刻更尖銳的揭露和批判（雖然不是公開的），以及認未來不可避免的風暴積蓄力量，還是「學習和領會中央精神」，對自己過去的「激進」作無情的批判與決裂，并反過來向尚未「覺悟」的民運分子進攻？我個人的民運朋友們大都為前者，并且他們視魏、王等獄中民運先鋒的命運為自己的命運。他們「反思」的結果是更堅決的鬭爭，他們的「深沉」在于更冷靜地學習和調查，也在于更踏實的工作。我無意去猜測你和你的朋友們的「深沉」，但我希望這種「深沉」不要失掉而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勇氣——那怕是一點點也好。

### 三、關於在海外辦「中國之春」及愛國主義

你在來信提及，「如要社會主義民主，那麼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爭取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不免有點滑稽。」但真正滑稽的是這句話的「邏輯」（？）。我不清楚你在北大就讀時是否上過「國際共運史」這門課？或許因為你自己也來到「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你就忘記了你所學過的常識？至少在國際共運史上，被迫背井離鄉在其他國家裏爭取自己祖國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此外，你大概還不會不意識到，你本人也正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西方政治學而不是自然科學。你的學習目的大概是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吧？更為重要的是（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你在理論上是蒼白無力的。你甚至無法根據你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來邏輯地證明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論以生產力、生產關係，還是從政治制度）。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前面問你，你和你的朋友們究竟是什麼樣的「共產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因之一了。

你以一個「愛國主義者」的身份來斥責別人為「民族敗類」，其勇氣固然令人可佩。但是，你是否真正懂得什麼是愛國？！是誰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以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摧殘我們民族的精華，迫害我們祖國的廣大人民，并且至今仍將魏京生、王希哲等民運先鋒們囚于黑牢？是誰二十多年來幾度將我國國民經濟引導到「崩潰的邊緣」？是一九五七年被整的幾十萬「右派分子」？是十年「文革」中被迫害的幾百萬知識分子和幾千萬人民？是至今還在監獄裏的魏京生、王希哲們？還是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執政黨及其賴以生存的官僚特權制度？什麼是民族敗類？摧殘我中華民族精華斷送祖國前途，置我們祖國人民于貧窮與專制的煎熬之中的官僚特權階級才是我們祖國的真正的民族敗類！我不知道，當你看到河西走廊、陝北高原、淮北平原和貴州山地區的貧苦農民和要飯者們，你會想什麼？當你聽到寶鋼工地上的上百億外匯流入東洋大海的時候，你會想什麼？當你在紐約街頭或金山橋邊遇見那些要求十億中國人民「愛國」的中國領導人的某些不那麼成器的「公子」、「小姐」們時，你又會想什麼？你有没有想過，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我國建國三十年來的政治動亂不斷，經濟發展起伏甚大？是僅僅歸罪于毛澤東和「四人幫」，或僅僅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還是有其深刻的制度上的原因？不，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先應該愛自己祖國的廣大人民，而絕不應該愛自己國家的官僚、特權、專制制度！不，愛祖國不等于必須愛某一個社會制度，愛人民不等于必須愛那個政府。恰恰相反，人民之所以需要一個政府，是因為希望這個政府能為人民而不是為它自己謀利益。在我看來，正因為愛國，才需要與官僚制度和特權階級作不妥協鬥爭，才需要堅韌不拔地將中國的民主運動進行下去。不，不割去官僚特權制度這一毒瘤，中國——我們可愛的祖國就不可能真正強大起來！

是的，「中國之春」現在是在大洋此岸出

版和發行。其原因我想你也明白：國內所有的民刊都被禁止（當然，也有一些是「自動停刊」的），所以民刊的主要負責人（除了一些「識時務者」之外）都被捕入獄。一句話，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現在並沒有中國民運公開活動，生存的地方。正如我們一再聲明了的，我們在海外辦「中國之春」的目的是繼續和發展國內被鎮壓而沒有停止的民運，是爲了讓這個世界知道中國民主運動仍然存在着和發展着，也是爲了磨練我們自己。我們一再申明，而且願意再次申明，一旦中國當權者無條件釋放所有在押的民運戰士和一切其他政治犯或「思想犯」，一旦中國當權者敢于真正實施憲法有關言論、出版、集社、集會、示威自由的規定，「中國之春」將立即遷回大陸公開出版、發行。「中國之春」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爲實現上述目標而努力。

至于「中國之春」對國內民運和廣大人民的影響，我想你大可不必操心。我們既然有能力在海外辦雜誌，也當然有能力將雜誌的影響傳回祖國。（例如，你和你在康乃爾大學的中國同學們就會帶回一定的信息）。

來信中提及的“工具”，“小伙計”或“特工人員”之類，我實在不屑一答。我實在佩服你，一個自詡在北大學過法律的人“合理理想”能力，而且也懂得這種“小伙計”的手法來自何處。君不見，五七年的幾十萬“右派”五九年的一批“右傾機會主義者”，六六年的幾百萬“反動學術權威”，“特務”，“賣國賊”（包括“法制”的最高象征——共和國主席在內），以及三年前被誣“出賣情報”的魏京生和前不久被控“反革命”的王希哲們，無數冤魂冤案不正是斷送在這種以“莫須有”三字殺人，囚人的手法下的嗎？所不同的是，大掌櫃有時還曉得在羅織罪名的時需要炮制或偽造一些所謂“罪證”（如魏京生一案），而“小伙計”們竟然全憑漫罵式的“大膽假設”來定“罪”，不能不謂之低劣。對你個人，我不抱惡意，因爲我知道你這種“可恨”是三十多年內國內既沒有民主也沒有法制和法治的必然結果。但是，我仍然希望你改一改這個壞習慣。不然的話，一旦你回國“應戰”不知又會有多少名無辜將屈作冤鬼呢？

此外，你對「七十年代」，「爭鳴」，「美洲華僑日報」和「世界日報」的評論，我也實在不敢苟同。我不知道這些報刊的編輯們、作者們和讀者們讀了你的宏論——當然是非常“馬克思主義”的判決——之後，會作何感想？但下述三點我倒是深信不疑的：第一，前三者是不會視后者爲自己的同類的，正如后者也不肖與前三者爲伍一樣。第二，甚至「七十年代」與「爭鳴」也不見得會樂意它們被人們看作與「北美華僑日報」同屬一類。第三，你的宏論除了說明你的無知之外，還會使上述各報刊的編者、作者和讀者們感到一股冷氣——一股從某個“紀念堂”里溢出來的，曾經橫行中

國二、三十年的，視港、澳、台和海外的一切爲敵人的冷氣——如果不是霸氣和殺氣的話。

四、等待上層恩賜“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自己起來爭取民主？

來信說，在中國要不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方面，是不存在問題的。中國的老百姓和中國領導人都懂得有擴大民主的必要性。重要的不是「過河」這個目的，而是如何「過河」。并且，“三十年來黨的錯誤又造成了堆積成山的問題，而諸多問題中，吃飯問題又佔首位。所以三中全會以來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是正確的”。

對於這些說法，我個人有些疑問。現在提出來向你請教。

第一，“過河”這個目的似乎仍然很重要，因爲無論中國官方還是你都沒有明確地告訴人們，究竟什麼是你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指人民“擁護”和支持“黨中央意圖”的“權利”，還是指人民批評、監督、限制以至必要時更換執行黨的權利？同樣，什麼是你定義下的“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是由“中國領導人”來恩賜給十億中國人民某些隨時可以收回的“民主”“權利”，還是人民群眾通過自己堅韌不拔的努力去爭取本來是屬於人民的或人民本來應該享有的民主權利？你說你曾經是“西單民主牆的熱心支持者”，并且“在本來已經是民主味很濃的北大校園里”參與組織過一個“政治研究會”。所有這些，自然可算作“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一些努力罷。但是，今天怎麼樣？民主牆早已被禁止。民運的主要領袖們身心牢獄，所有民刊都被查禁。所有的“民主選舉”的努力都被“冷處理”（如北大的胡平）或“熱處理”（如湖南的陶森和上海的何申奇）。所有的民間團體均不復存在（我不知道你們的“政治研究會”命運如何？也許因改變宗旨或“通天”而“幸”存？）。所有這些，你這位過去的“激進者”又作何感想呢？你是否認爲當年的那些努力都“不成熟”的青年們的胡鬧，或者只是爲了配合鄧小平胡耀邦們擊敗“凡是派”？你是否認爲唯有鎮壓民主運動，中國才能解決吃飯問題？說實話，當我讀到你在來信中大大段段的自我懺悔式的表白（令人奇怪的是，你竟然認爲這種懺悔是“很受民運份子的“深沉”的“反思”），我是憤慨的。我不知道，王希哲、魏京生、何申奇等其他失去自由的民運戰士如果有幸讀到你這封信時會作何感想？我的主觀猜測是“他們會不屑與你爲伍”——這未免太危險了，更何況你還要爲了“應付挑戰”去“分析”，領會和緊跟“黨中央意圖”呢！

第二，你的立論是中國老百姓和中國領導人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上看待民主問題的。我不知道你的這一論點的論據何在？你有沒有真正“走下去”過，去傾聽人民群眾對官僚特權階級和特權制度的不滿和憤慨？你有沒有作過一

些最基本的社會調查，看一看廣大人民群眾與這個官僚特權制度的矛盾已經尖銳到何種程度？你有沒有老到那些夙餐露宿的“上訪”的人群中去傾聽一下他們對特權官僚的橫行霸道的控訴呢？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目中，王希哲、魏京生等被捕的民運戰士是否還屬於“中國老百姓”的範疇？如果是的話，他們的自由何在？他們所應享有的民主權利何在？你是否認為，他們的言論和文章是屬於“一天一個新主意”，“不說中國老百姓也知道”？是的，“二千多年的政治傳統是一幅沉重的擔子，不是靠吶喊幾聲就能解決的”。但是，如果十億人民都不吶喊，問題將永遠不得解決——民主和自由只能通過人民的鬥爭而不是官僚的恩賜而獲得！

第三，你在來信中提及，王軍濤和他的朋友們作了一個調查，整理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的情況。“結果說明，短短的三年，已有很大成就”。十分遺憾，我們沒有看到這份材料，不敢隨便“相信”或“不相信”。但是，我倒願意向你請教一些與此相關的問題。例如，你有沒有認真地研究過這四、五年來的政策變遷及其反映的矛盾呢？你怎樣看待由三中全會的“思想解放”轉變為以後的“四個堅持”和最近的“強化政治思想教育”呢？你怎樣看待某些最高層人物由鼓勵以至支持民主轉為鎮壓民主運動呢？你怎樣看待由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國內學術界大談“經濟改革”和自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起重新強調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你怎樣看待目前黨內仍然頗為尖銳的權力鬥爭呢？你難道真的認為目前中國大陸的形勢是“建國以來最好的”，而不是潛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嗎？你也許是鄧小平、胡耀邦的一名堅定的或不堅定的支持者，但你有沒有想過“鄧以後”的中國政治呢？你有沒有真正走下去，走出你那個“共產主義者”的小圈子，到青、中年之人和知識分子中間去傾聽和比較一下他們現在對鄧小平的評價與四年前的評價有什麼不同？你有沒有到那些在黨內和軍內佔多數的保守派干部中了解一下他們對鄧小平和胡耀邦的不滿以至反對情緒，以及設想一下這種不滿和反對情緒在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下會導致什麼樣的行動呢？你有沒有具體地研究一下目前國內的經濟戰略和政治政策所包含的深刻的內在矛盾呢？我之所以問你提出這一大堆問題，是希望你在分析國內形勢時多問自己幾個“為什麼”，而不是簡單地照搬“人民日報”。記憶和背誦只是人的大腦功能的一部份，更重要的是要學全獨立地思考。

第四，你有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願望，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怎樣實現這種願望呢？等待上層的恩賜，還是與人民站在一起去爭取？這種“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願望和努力將怎樣解決官僚特權制度這一中國當

代政治生活中的最關鍵問題？這一“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願望和努力有沒有勇氣從一些最基本的“實處着手”，即有沒有勇氣向當局要求釋放王希哲、魏京生等被捕的民運戰士？有沒有勇氣要求當局真正付諸實行剛剛通過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出版、集社、集會和選舉自由？有沒有勇氣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向官僚特權階級爭取民主？羅莎·盧森堡曾經說過，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聖誕禮物。與其他形式的民主一樣，“社會主義民主”也不能靠某幾個上層人物的恩賜而要靠人民群眾自己的長期的堅韌不拔的鬥爭才能實現。民主，這一人民覺醒時的要求，是無法與官僚特權階級的專制長期“和平共處”的——至少波蘭團結工會的鬥爭經驗與教訓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第五，在貧困的陝北高原生活過九年的我，與你一樣深深地懂得什麼是“十億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即某些人所謂的面包問題。至少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政治發展史已經表明，把民主與面包分割開來和對立起來的說法和做法既扼殺了民主又毀掉了面包。試問，如果沒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一九五九年的“反左傾”，如果人民群眾能夠監督、批評和限制執政黨，那個天方夜譚式的“土躍進”得以全面推行并導致幾百萬中國農民死于飢荒嗎？如果八億中國農民有自己的自主權——請注意，這種自主權不只是經濟上的民主，而且也是一定意義上的政治民主，——而不是受控制受盤剝于各級官僚，“農業學大寨”“割資本主義尾巴”之類的鬧劇會那樣可怕地破壞我國農業生產和摧毀我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嗎？如果我們有相當的民主制度，讓我們的科學家們和經濟學家們有權利監督、審查、質詢、批評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和執行，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的“洋躍進”會造成那樣大的損失嗎（據“人民日報”載，這次“洋躍進”浪費了數百億的投資）？正因為我國目前的經濟計劃體制是高度中央特權的，所以就更需要有一個民主的制度來限制其決策的盲目性。不然的話，某幾個“英明的”中央決策人物一旦異想天開，又要“折騰”起來，中國人民將不光得不到面包，而且，恐怕連紅薯也難以果腹呢！

最后，你在來信中表示要盡早回國并無意問津博士學位。這種希望回國創業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我仍然勸你不妨老老實實唸完四年書——學位事小而學問則重要。不然的話，腹內空空，腦中混亂，如何回去“應戰”？

很抱歉，寫完信后才覺得寫得太多太雜，提的問題也太尖銳、太逆耳。其用心，無非是你在來信中所說的內容：希望成爲在康乃爾的關心中國問題的中國人的“一次討論的話題”。致禮！

李浩然



(國內來稿)

周正欣·李文通

幾經曲折輾轉，終於從朋友手中得到了《中國之春》(創刊號)和登載有關消息的幾份海外報紙。首先祝賀你們取得的初步勝利，它極大地鼓舞了我們處境艱難的國內同志。

從創刊號和有關評論來看，有不少問題亟待澄清。我們討論的結果，覺得有必要寫信談談我們的意見。這些意見只是我們廣州地區部份同志的看法，未必能代表國內其他民運同志，更不能說對你們在海外的運動有多大指導意義。我們深信，中國民主運動的理論完善過程，將與它的組織壯大過程同時進行。或許我們的點滴體會，能有助於你們進一步加深對問題的探討。

第一、這場民主運動的宗旨究竟是革命還是改良(或稱改革)?

這不是用語問題，而是旗幟鮮明不鮮明的問題。

衆所周知，自上而下官辦的，不觸動原有社會結構的局部變革謂之改良；反之，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民辦的，根本改變原有社會結構的全面變革謂之革命。三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不斷革命”論的驅趕下吃盡了苦頭，因而，一般人畏言“革命”，甚至“運動”二字都談虎色變。這說明“革命”二字被庸俗和歪曲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當前民衆中普遍存在的三信危機和虛無主義，正是對“無窮鬥爭”哲學的一種反動，也是我們民族的一個悲劇性結果。目下當政的特權官僚們正在利用這種虛無主義情緒，有意識地引導人們漠視國家政治問題，以阻止民主運動的興起和任何可能危及特權利益的實質性變革。

因此，民主運動的責任之一，就是喚起民衆，向他們進行民主知識的宣傳。讓他們明瞭我們所要從事的民運，根本不同於三十年來的歷次所謂“革命”和“運動”。這場革命的進行，不是由別人來“解放”他們，而是靠他們自己解放自己；這場革命的結果，也不再由“大救星”來代替他們行使“領導權”，以至於最後變成對他們的獨裁式統治，而是要由他們

自己管理自己。由他們民主普選出來的代表將隨時隨地聽取他們的意見，執行他們的旨意，向他們負責，從而真正成爲他們的公僕。這場革命的目的，正是爲了永遠還政于民，永遠不再被那些名爲“公僕”實爲太上皇的統治者們驅趕着去幹“自相殘殺”的革命，所以，不論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安定，還是對於子孫後代的幸福，這場民主革命都是絕對必須的。它是中國歷史發展到今天的必然結果，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進程。

另外，這場民主革命并不一概反對改革。不論是鄧小平現在的改革，還是以後可能出現的其它改革，凡是真正利國利民的，那怕極其有限和暫時，我們也是歡迎的。歷史證明，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雖然由統治者中的開明派所倡導，但都是以人民大眾的某種革命要求爲其背景和前提。正像“四五”革命運動與“庚申變法”的關係一樣，從這種意義上說，革命推動改革。

但是，改革不能代替革命。其一，當改革遭到失敗，往往會直接觸發革命，例如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其二，改革雖然犧牲小，動蕩少，但不易割除社會毒瘤，因此往往遺害久遠。歷史上雖然有過明治維新那樣成效卓著的改良運動，那也是由於日本當時特殊的內外條件所促成。而且目前的中國，改良派們的所作所爲，與人民大眾的民主要求相距甚遠，他們不僅沒有向民主政治邁進的真誠願望，而且抱住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不放，拒不執行憲法業已載明的言論出版自由。前不久秘密審判王希哲等人就充份暴露了他們的“改革”的虛偽性。因此，對他們的改革決不可寄與厚望。其三，請不要忘記，中國源遠流長的專制統治的劣根性，從骨子裡天然仇恨那怕極其輕微的任何改革，所以迄今爲止，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任何一次成功的變法。這一歷史經驗值得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銘記於懷。

第二，中國民運希望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

由於包括華僑在內的人民群眾對共產黨感到失望，對台灣的國民黨也不滿意（部份原因是它以前喪失民心的那段不光彩歷史，部份原因是台灣本質上仍然實行着不民主的制度，雖然程度上比大陸好得多），因此寄望於第三勢力的出現。

但是我們認為，中國民運，從性質上說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應該成爲一個政黨，而應該是一個聯合陣綫，或稱統一戰綫。三十年代有過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其目的是爲了打日本。現在民主聯合陣綫的目的則是爲了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它不同於政黨的地方在於，政黨一般說來具有排它性，中國人稱爲“黨同伐異”，要求其成員有一致的政見，不容忍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存在其組織之內。民主運動恰恰相反，它不僅允許，而且歡迎持各種政見的個人和團體參加。只要大家有一個爭取民主的共同目標和基本準則，其餘的主義信仰，政治路綫可以一概不論。民主的特點，正在於它能容忍各派政黨的存在和自由發展，而不像專制制度那樣，只許執政黨爲所欲爲，其它政黨不是俯首稱臣，就是被解散和取締。

在民主政治下，由於實現了真正的結社和組黨自由，所以任何政黨的存在和發展都會受到憲法的保護。黨派無論大小，也無論執政或在野，地位一律平等。政權的交替，只由選民投票決定。因此，是人民支配黨，而不是黨支配人民。

既然如此，民運不企望設計一個政治和經濟的具體模式，那可留待未來的政黨競爭和公民投票去選擇，我們目前只想提出有關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幾項基本原則，以便引起更加廣泛的研究和探討。

### （一） 政治制度方面

1 改中央集權制爲民主聯邦制。除考慮到台灣、香港的特殊因素外，也考慮到中國人口衆多、民族衆多的因素。將來除了台灣、港澳、新疆、西藏、內蒙、廣西、寧夏等特別區域得設自治區以外，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各大區也可考慮改爲自治區。聯邦（中央）政府除保留國防、外交、郵電、鐵路等事業的統一管轄權之外，其餘各項權利均下放給各自治區自行管理，聯邦政府只負協調和指導之責。這有利於各自治區取長補短，各顯其能，盡快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和經濟上的現代化。

2 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約的體制。不允許任何一方擁有至高無上，不受約束的絕對領導權。更不允許執政黨最高當局任意包辦一切。

3 真正實行不摻假的民主普選制。競選活動合法化。一切競選經費由競選人自籌，不得變相動用國家財政經費。推行義務民主教育，以提高選民素質。必要時可由海外華僑代表負監督之責，以杜絕營私舞弊和強姦民意。

4 政黨和國家徹底分離。黨是部份人的黨，國家却是全民的國家。所以政黨不能和國家混爲一談。政黨不論大小朝野，均應財政獨立，不得動用來自全民的國家財政收入。

某一黨（或黨派聯合）在競選中獲勝，可由該黨領袖出面組閣，成爲國家行政首腦，在行使權力時應與國會、法院互相牽制，以國家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爲信念，而不得爲私黨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應把在野黨的監督作用和政敵的合法存在視爲必然並形成制度。

5 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等五大自由，由空洞的法律條文變爲切實的制度。堅決摒棄“無產階級專政”的信條，釋放一切政治犯，杜絕“以言治罪”和“以文治罪”的現象。任何個人和組織均有以任何形式批評政府和領導人的權利，有提出不同政治見解，闡述不同思想和信仰的權利。允許人民有遷徙自由，有離開祖國和返回祖國的自由。

6 軍人的職責只在保衛祖國，不應參政。國防部長應由文職人員擔任，武裝力量只受當選政府和國家元首指揮。所有軍人，都應樹立“干政恥辱”的信念。警察、監獄等鎮壓機器，只以保護人身安全、維護社會秩序爲職責，而不得服務於推行或壓制某種政治見解，法制不得把鎮壓職能亂用於人民頭上而留下任何可乘之機。

7 樹立憲法高於一切，全國尊憲行憲的傳統。爲此，首先要在各黨派和人民團體席位均等，充份民主協商的前提下，制定《中國民主人權大憲章》，經全民（包括台、港和海外華僑）討論，修改并投票表決後，鄭重公佈、廣泛宣傳，使之深入人心，一體尊從。非經全體公民投票，任何一屆政府和政黨均無權提出修改要求。憲法要穩定，並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必須結束“一朝天子一個法”，誰上台誰修憲，視憲法形同兒戲的可悲局面。

### （二） 經濟制度方面

我們認為，中國大陸已經建立了比較牢固的國有化工業體制。有人希望它再退回到小私有的自由資本主義去。這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國有制並不等於公有制，它實際上已經蛻變成了特權官僚所有制，因此，它已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了。只有與全民制度相結合的公有制，才是真正社會主義公有制。因此，我們的方向應該是一種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具體說來，我們希望它是一種能夠充份運用價值規律的，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 首先應該肯定，它是一種市場經濟，而非計劃經濟。何以如此？理由有三條：①當今世界生產力發展階段，仍未超越商品生產。無論現代化的西方，還是共產主義的蘇聯東歐，都看不到商品生產趨於過時的跡象，更何況商品生產向來不曾發達過的中國。而商品生產，只有在市場型經濟中才能充份得到發展。②迄今為止，所有計劃經濟國家，弊端百出，效率低下，浪費驚人，皆因市場機制不完備，但仍不得不搞商品生產這樣一種自我矛盾狀態所致。③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和民主制度水火不相容，它只能和官僚特權階層的存在互為因果。這已被無數實例所證明。因此，我們主張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

2 它是社會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區別何在？①重要經濟部門和工業產品都是國有的，而國有企業又是由工人民主管理的。雖然各企業互相競爭以提高利潤，但利潤的一部份歸於工人，另一部份以果進稅上繳民主政府，用於全社會。中間沒有據利潤為己有的資產階級。②參加市場競爭的，是代表工人集合體的社會商品，而非代表資本家的私人商品。在其內涵中，只有不同質與不同量的社會勞動的相互比較，而沒有資本對剩餘勞動的無償佔有。

3 它是在國家指導下的，而非無政府狀態的。請注意，這裡是指導，而不是指令。①國家計劃的產生，不再是特權官僚的隨意臆想，而是來自基層企業的，能反映價值規律客觀要求的精確統計和科學計算。②計劃不但不妨礙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作用，而且通過向企業提供準確的市場信息，更好地為價值規律的作用開闢道路，刺激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③計劃對企業沒有強制性，只是通過財政、信貸、稅收、情報咨詢等手段來指導企業參加市場競爭，而不是運用行政手段對企業瞎指揮。

4 國家計劃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但不排斥中小型合作企業，反而運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聯邦政府與地方自治政府）的經濟職能盡力給以扶植，以擴大社會就業，繁榮市場供給。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國家亦可協助它們向現代化托拉斯方向合併，以逐步過渡到大規模高效率生產。

5 對各體農戶和私人小企業，國家不限制其發展。在稅收和信貸方面不得有任何歧視。但國家將依法規定雇傭工人的最低工資額，不得低於，只可高於國有企業同類工資。另外，不論公私企業，工人均有權組織獨立工會以保護自己的權益。工人的罷工權應由憲法明確規定之。失業工人及其家屬有權得到政府和社會保險機構提供的起碼生活保障。

6 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由“利潤上繳”改為稅收。除了依法納稅以外，各企業有權自行處理自己的收入。企業內部，實行工人委員會民主管理。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實行自籌和銀行借貸相結合的辦法。

7 採取穩步措施，加強國內與世界經濟的聯繫，鼓勵企業參加國際競爭，以出口勞動資源密集產品向出口技術資本密集產品過渡，最終達到向世界市場的完全開放。

第三、中國民運希望通過什麼手段達到民主目標？

我們認為，應該通過和平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

所謂和平的，就是非暴力的，不流血的。我們中華民族已經在暴力動亂和流血犧牲中掙扎得太久了。民族災難的嚴重性喚醒了我們這一代人，使我們認識到非建立民主制度，不能根除暴力和流血。

有人會問，如果執政黨用武力鎮壓民運，你們也仍然堅持不用武力自衛嗎？從目前看，專制政權肯定會用暴力打擊民運，事實上他們已經在這麼做了。他們之所以敢這麼做，正是由於民運還沒有廣泛動員起民衆，沒有形成強大的時代潮流。在力量對比如此懸殊之下，民運是不可能有用武裝自衛力量的。而當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並集合到民主旗幟之下，有可能建立堅強組織的時候，如果執政黨仍然用暴力鎮壓民運，人民群眾當然有權利起而自衛。至少波蘭團結工會慘遭鎮壓的例子從反面向我們提供了教訓。但是，我們並不崇尚武力，尤其堅決反對用武力解決政見糾紛。這基於兩點理由：①時代已經變了。現在已經不是“強權即真

理”的時代。科技進步和民智開發使得任何專制頑固派也無法長久愚弄民衆。天安門“四、五”運動雖然被鎮壓下去，但隨之宣佈了毛澤東政治生命的完結與其親信們的可恥垮台。“以民意定天下”的規律是不可能抗拒的。②統治階層內部并非鐵板一塊。願意順應民意，能夠站在人民利益一邊的人還是有的。不僅中上層有，普通黨員和戰士中就更多了。他們會逐漸覺悟，并分化出來，站到民主運動方面來的。

總之，我們摒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落伍意識。我們呼籲從現在起，所有中國人都應樹立永遠不以武力解決政治歧見的民主意識。

所謂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絕不是文革浩劫那種運動群眾。而是通過宣傳和教育，使越來越多的群眾獲得民主政治的基本知識，通過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罷工等五大自由的正常方式，發動大家暢所欲言，批評時弊，揭發專制內幕，抨擊特權官僚的違法亂紀行爲，公開討論國家的一切政治事務，就國家民主改革提出各種方案，最終組成代表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的最廣泛的民主陣綫，共同擬定《中國民主人權大憲章》，并着手準備大選，以便產生民意政府。這樣的群眾運動，并非權宜之計，而應變成老百姓的日常習慣，認識到這是人民行使主權的最正常的秩序。

#### 第四、對台灣、香港問題的態度。

首先聲明，對這兩個問題，台灣人民和香港人民比我們更有發言權。而且，問題的最後解決，也要靠他們自己行動起來，不能再由少數政治寡頭壟斷人民的命運了。但是，既然我們發動了民運，人民大眾又希望了解我們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我們也就不能迴避。如果我們說的對，符合老百姓的願望，但是不合當政者的胃口，會因而招來某些攻擊。這并不可怕，我們說錯了，可以修正；了解的不多，可以加強學習，包括向台灣和香港的人民請教。如果我，這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可怕的倒是我們自己模稜兩可，使人民群眾對我們懷疑甚至失望。民主運動，對於患有專制頑症的中國，是一場極爲深刻的革命，因此，壁壘越分明越好，誰個真革命，誰個假革命，是真心實行民主，還是想混水摸魚，不久即可被世人看得清清楚楚。

台灣應與大陸統一，以早日結束骨肉離散，祖國分裂的可悲局面。但我們堅決反對武力統一，任何一方面首先動武，都將遭到全中國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唾棄。國共雙方的士兵，只不過是身穿不同軍服的中國老百姓，他們彼此之間不是敵人，而是骨肉同胞。我們主張和平統一。但在無法和平談判之前，應該盡快實現“三通”，離散的親人們已經等待得太久了。

和平統一的障礙何在？就在於兩邊的政府不可能找到一個共同點。一邊想用共產主義去統一，另一邊想用三民主義去統一。說到底，都不想放棄自己的政治統治權，即自己的“一黨專制”。在人民方面，他們沒有利害衝突與敵對情緒，雖然政治觀點各異，只要實行民主，就沒有解決不了的矛盾。事實上，海峽兩岸人民大眾的心，早就統一到一塊兒了。阻隔他們團聚到一起的，僅僅是執政黨的黨派私利而已。

因此，我們認爲，台灣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如果兩邊政府認清這一歷史趨勢，能在邁向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展開一個和平競賽。比如：爭相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報禁、允許人民有更多的自由等等。而不要像目前這樣，在扼殺民主勢力方面開展競賽。那麼，它們還有希望在和平統一問題上找到某些共同點或突破點。否則，只會被民運潮流拋開，由人民群眾自己去解決和平統一問題。

香港問題更爲緊迫，十五年的時限轉瞬即到。香港人民怕“共產”，既害怕降低生活水準，更害怕失去享受已久的自由，這大概是回歸的主要障礙。共產黨也知道，硬用共產政策去接管，不但會造成重大經濟損失，還會鬧出“越南難民”那樣的慘劇，因此在憲法中虛列了一條“一個政府，兩種制度”的新章程。但是，沒人相信這一條真能貫徹久遠。其一，五十年代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飽嘗過“欲擒故縱”的辛酸味道，至今記憶猶新，不願再次上當。其二，兩種制度的長期存在不但違反目前憲法序言和總則的指導精神，更違背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和長期奮鬥目標。因此，一旦主權收回，類似“三反五反”那樣的強迫改造只不過是時間問題。如果香港人民不願意歷史悲劇重演，那麼，除了爭取全中國實現民主制度而外，別無它途。假如民主運動勝利，中國實現民主聯邦制，一可不改香港經濟制度（只要公民投票同意）。二可使“只有自由，沒有民

主”的香港實行民主自治，真正做到“港人治港”，香港人民用不着再擔心什麼威脅。如此以來，還有什麼能成為回歸祖國的障礙呢？所以說，香港問題的解決也有賴於民主運動的發展。

台、港問題是中國歷史病態發展的結果和見證。然而在今天，壞事變成了好事。除了使中國人痛定思痛，從而激發愛國與救國熱忱之外，它還成為促進中國民主化的積極因素和有利條件。三十多年來，台灣和香港無形中成了大陸的一面鏡子，或者說，大陸、台灣、香港三者互為借鏡。對於專制政府來說，有鏡子照總比沒有鏡子照好。同為中國領土，都從戰後起步，為何生活水準竟相差如此之遙？老百姓的自由感和安全感又迥然各異？更可憐誕而走險的幾十萬絕望青年，他們今日能避居一隅，有的甚至做出了輝煌事業，不也多虧了有香港那一點彈丸之地可以出逃嗎？

鏡子的反照作用也教育了人民。當魏京生、王希哲等民運先鋒遭逮捕的時候，唯有港澳和海外同胞有可能為他們的冤獄大喊大叫，奔走呼號，從而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關注與聲援。因此，香港人民的力量，對於中國民主進程的重要性，是不可稍有忽視的。總之，中國民主運動的最後成功，有賴於大陸、台灣、香港、海外這四部份中國人團結一致的共同奮鬥。

第五、國內民運同志對海外華僑的希望。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成為有史以來中國第一個民主政治的偉大實驗。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結束了軍伐混戰和列強在華特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前兩次革命都未能在中國樹立民主人權的普遍信念和建立相應的制度。作為民主革命，共產黨甚至比孫中山有所後退。

當前，我們正面臨着第三次民主革命。這次革命的任務是：樹立民主觀念，完善民主學說，建立民主制度，即完成前兩次沒有完成的事業。如果說，孫中山時代的中國尚未完全具備民主政治的歷史條件，那麼，經過七十多年磨難以後，尤其經過十年文革浩劫之後，中國人民已經懂得了實行民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世界民主潮流的發展，國內人心思變的精神狀態，台灣、香港問題的特殊作用等等，這種種

因素加在一起，使民主革命的爆發已如水到渠成之勢。

民主運動的偉大事業，從根本上說，也是西方民主自由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結合過程。由於華僑自身所處的特殊地位，理應成為這一過程的先鋒。你們當中的大多數，尤其中年和老年，既念念不忘自己祖先的文化（這一點，據說剛從大陸到美國去的留學生們能很明顯地感覺出來），又長期吸取西方文化的寶貴營養，因此，對於中國大陸弊端的了解和認識，往往比我們大陸人自己還明白。對於中國未來如何走向自由民主，很多華僑人士也往往有他們獨到的見解。

另外，華僑們生活的環境是有言論自由的，你們可以道出自己之所想，不論對大陸和台灣批評怎樣激烈，也不致於招致殺身之禍。這也是你們能更好參加民運的有利條件，比如不久前對於王希哲、魏京生被捕的反映，國內群眾只能向隅而泣或者私下切齒，而無法組織起來去請願，或者撰文以抨擊。但香港青年學生和海外僑胞就大張旗鼓地幹了。我們希望以後類似的活動能搞的更加轟轟烈烈。

總的說來，海外僑胞對於這次民主運動的重要性遠遠不只在於捐款支援，而在於從思想、理論、組織、財物等方面的全面支持和親身參加。對於爭取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的民主革命來說，華僑更應該是當之無愧的母親了。

《中國之春》在海外的同志們，以上五點，是我們認為有必要提出的看法。希望你們在鬥爭中注意策略和鬥爭藝術，並多多與國內同志加強聯繫。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于廣州

※ ※ ※ ※ ※ ※ ※

### 八十翁媪聞春訊

——王吟男

八十翁媪聞春訊，	雖云有家歸不得，
疑似枝頭小鳥吟！	仍望兒孫能尋根，
祖國鐵幕厚如牆，	有朝花紅葉更綠，
如何暖入兒女心！？	開山始祖中國春！！

一九八二年 於洛城 寓次

# 中報不“中”

——盧衡·曉達

## （編者按）

「中國之春」宣佈誕生後，各華人報紙都對「中國之春」進行了報導和評論。其中，「中報」的態度極為特殊，使我們感到迷惑不解。該報總部設在紐約，香港、舊金山和洛杉磯亦有分社。「中報」標榜中立和不偏不倚，但在報導「中國之春」上，一會兒持中立立場，一會兒又投靠中共而圍剿「中國之春」，搞得我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中國之春」原不知「中報」立場搖擺的底細。最近，紐約一家獨立的華人報紙「華語快報」，以「中報發生大地震」為題，揭出了「中報」的一些內幕。近來，「中國之春」編輯部也收到一些專談「中報」問題的稿件。據這些稿件披露，「中報」老闆傅朝樞因在台灣的官場鬥爭中失利而來到海外，創辦「中報」以洩私仇。「中報」由於開業不久，銷量并不大。去年，因中共情報不準，以為「中報」是份海外華人大報，而錯誤地把傅朝樞與香港「明報」主編查良鏞等，安排與鄧小平見了面。傅因誤得福，受寵若驚，決定賣身投靠，一心左轉。傅最近又因財政問題更加堅定了他投靠中共的決心。傅的投共立場與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為代表的中立立場經常發生衝突，這就是「中報」在報導「中國之春」等問題上搖擺不定的原因。我們難以體會到，「中報」內兩條路線對「中國之春」的不同態度，竟導致了「中報」的分裂性「大地震」。一位熟悉中報的朋友告訴我們，「中國之春」導致「中報」的地震，其實只是果，它的「因」早就存在了。為使大家了解「中報」過去搖擺不定的原因和現在「左轉」的情況，我們特轉載「華語快報」的專文，并刊登盧衡、曉達的來稿。

紐約華語快報於元月廿五日刊出一篇以「中報大地震」為題的香港通訊。該通訊除了報導紐約「中報」投靠中共的經過及該報總編輯俞國基憤而辭職外，也提到「中國之春」在該報編輯部所引起的一些波瀾。「中報」對「中國之春」報導的轉折起伏，反映了「中報」內部「中立」與「投共」兩條路線的鬥爭，也明顯表示「中報」有一條直通北京新華社的熱線。筆者就所了解的點滴內幕情況，作如下報導。

「中國之春」是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紐約

宣佈成立的。頭一天，時代週刊的姜敬寬先生打電話給「中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告訴他「中國之春」將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消息。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中報」派了兩位記者參加了「中國之春」的記者招待會。中報在俞國基的主持下，對「中國之春」的報導採取了公正立場。十九日下午「中報」紐約版上市，二版頭條赫然有如下的標題：「民主運動海外春雷乍動，留學生關心中國的前途。中國之春將在美加地區發行，沿襲北京之春精神反對專制」。不論標題及內容，均肯定了「中國之春」的正面意義。二十日，該報繼續刊載了王炳章在記者會中的一張照片。二十二日，「中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超離黨派的赤子精神——有感於各界對王炳章的評價」。這是中報第一篇對「中國之春」的評論，不但肯定了「中國之春」的價值，也提出若干極具見地的建議。在文中，有這樣的警句：「無論我們同不同意他對海峽兩岸的評語，但我們至少得承認這超離黨派的赤子精神是值得珍惜的。對這赤子精神有所共鳴的人，又何忍將其染上黨派的色彩呢。」這篇社論不但是站在超越黨派、擁護民主自由的立場發言，而且也指出海外的華人若干對民主運動糾纏不清的觀念。

「中報」以俞國基為首的中立派的公正立場，觸怒了中報老闆傅朝樞，傅認為「中報」這麼做得罪了中共當權派，立即藉口香港事急，把俞匆匆調離了紐約。

俞國基先生走後，紐約「中報」轉由傅朝樞的密僚、親共的陳玉重主持。陳對傅的旨意心領神會，開始有意識的對「中國之春」的報導轉向。但「中報」內仍有不少堅持獨立立場的人員，抵制陳玉重的公開投共立場。這種分歧，反映在「中報」對某些新聞的處理上。比如，十一月廿一日晚，「中報」曾電話訪問王炳章，王提出六點澄清聲明，這六點聲明與「中報」標榜的「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場相一致，理應按「獨家新聞」從速刊登。但陳玉重對此「新聞」一拖再拖，在內部與外界輿論壓力下，「中報」才於二十七日二版報導了此六點聲明，但在標題的最後却帶了一條尾巴：「各界人士褒貶紛紛質疑又勸勉」。所謂「質疑又勸勉」者，其實是製造了一位「來自香港，長期為中國民主化出力的文化界人士」（無名無姓）對「本報」說：「……他希望王氏認真研究民主理論與實際，不要讓民主自由的概念流於簡單化和絕對化；要擬出一套具體可行的方案，向中共提出，促其漸進推行……『中國之春』還沒開始就把架勢擺得那麼高，現在人們期望它能腳踏實地做點有益中國的工作」。這種「話中有話」的論調完全是中共官方典型的面孔。

在傅朝樞的直接控制下，陳玉璽爲了進一步使「中報」轉向，迅速建立了一條直通中共的熱線，這就是陳玉璽——路揚（受中共大使館直接指揮的一名訪問學者）——中共大使館熱線。在此熱線的控制下，「中報」紐約版廿九日拋出以「本報訊」方式的報導，其大標題爲「中國之春爆出內幕」，開始對王炳章個人生活問題造謠生事，大做文章，妄圖給中國之春抹黑并轉移人們視線，討好中共當局。當然，這是中共官方最樂見的事，尤其「中報」披着其「中立」的迷人外衣來打擊王炳章，更是效果卓著。

在「中共大使館——路揚——陳玉璽」熱線編導下，「中報」投共鬧劇愈演愈烈，十一月卅日，「中報」二版刊出薛士諤（即陳玉璽的筆名）所撰的「本報特約專欄」文章「王炳章宜從速澄清疑點并做抉擇」（此文後來轉載於香港「中報」月刊一九八三年元月號）。該文暗示王炳章已與台灣國民黨掛鉤。以各種猜測之詞，把王炳章羅織歸入了國民黨陣營。此時，正值中共內部傳達「王炳章等人創辦中國之春係由台灣國民黨方面泡製」。薛士諤的文章與中共的論調尤出一轍，有力配合了中共的造謠宣傳。與此同時，「中報」還以中立者面目刊登了中共大使館提供的如下消息：「對哥倫比亞大學卅多名中國留學生做的抽樣調查表明，無一人支持王炳章」。此時，「中報」已墮爲中共的傳聲筒。

從十二月初開始，「中報」一連串的專欄、社論與新聞，一方面不斷環繞在王炳章的個人生活問題上作不堪的描寫，一方面又強烈暗示王炳章有訪問台灣與國民黨勾結的意向，并有接受台灣金錢的栽誣報導。當然，在此期間，「中報」內持中立立場者還沒有完全按着陳玉璽的指揮棒轉，抵制了陳的一些「指示」，發出了一些較客觀公正的報導。如「中報」洛杉磯分社發的王炳章在洛杉磯講演的消息及各界評論等。另外陳玉璽未能完全控制的生活版及論壇版上也出現了一些公正的文章。

傅朝樞、陳玉璽秉承中共旨意，利用「中報」圍攻「中國之春」，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達到高潮。該日，「中報」在二版發表了獨家報導「石家莊長安區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談話」，對王炳章進行人身攻擊。這個「談話」，連明顯受中共操縱的「美洲華僑日報」和「北美日報」都未撈到機會發表，爲什麼中共會如此厚愛「中報」呢？據筆者向各方查證結果，其奧妙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中報」刊出了一篇社論，題爲「中共的困局與新機」，該文爲紐約中報駐港特派員兼副總編輯李義仁先生所撰，主要內容是指出中共最近一連串面臨若干困窘的局面。如何突破困局，開拓新機，是中共領導人所必須面對的挑戰。文中有如下描述：「十七日中國之春宣告成立，一度激起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熱潮……」，「中國之春、梁恆、劉銑冰等一系列事件，無論其動機及背景如何，也無論人們予以何種評價，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他們的行動反映出許多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經歷文革動亂折磨後對中共做出的反應」。這篇社論，不論在立場上，在措辭上，都極盡溫柔諄厚之能事。但該社論被老闆傅朝樞看到後，竟然大驚失色，

認爲好不容易在中國之春問題上幫了中共一個大忙，在大功垂成，即將領賞之際，居然出現了肯定中國之春的社論，豈不前功盡棄。傅老闆氣急敗壞地大罵李義仁：「這一下把我種的人情全丟光了！」。一怒之下，把李義仁解了職。

傅朝樞爲了向中共「將功贖罪」，立即打熱線電話給新華社，要求供應一篇專門攻擊王炳章和中國之春的特稿。這下正中中共下懷，新華社說立即請示上級，提供材料。這就是「副院長公開談話」與「王玉蘭公開信」兩稿的來源。

新華社在發出該兩稿時，大概也作了一番考慮。「王玉蘭公開信」，除發給中報外，也發給了紐約的兩家左報——「美洲華僑日報」與「北美日報」，但是「副院長的談話」，便成了「中報」的「獨家」和傅老闆的「特別訂貨」。

「中報」在傅朝樞、陳玉璽主持下，對這篇「專訪」的處理也未做任何隱諱，乾脆加上一條編者按，說明該稿是中國新聞社（中共官方通訊社）記者的專訪，并將記者姓名楊昕也一并刊出。這倒不失爲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但是「中報」的編者却忘了交代兩件事：

(1) 爲何中報會拿到這份「獨家」的專訪，中新社爲何不供應其他的兩家左報？

(2) 按照一般國家（不一定是民主國家）的慣例，司法案件在審判前及審判中，任何人均不得對該案作任何評論。一位地方法院副院長，職司司法，居然在案件未經檢察官起訴前，就對該案的當事人口誅筆伐，大加定罪，充分顯示了中共司法官的不懂法律及藐視法律；也充分顯示了中共的司法仍然以政治超越法律的方式在辦案。這種文章在講求法治的國家刊出，編者并未對這種違法的談話有所交待。

該兩篇文章的刊出，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然而，「中報」傅朝樞本身却也徹底暴露了它的投共嘴臉。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由香港經日本回到紐約，試圖挽救「中報」投靠中共的結局，恢復其「中立」色彩。八三年元月四日，「中報」生活版的落筆集出現了一篇「門奧豈能掩飾真相」的文章，強調中共不應利用王玉蘭來做政治工具，并指出以私人感情問題來損害王炳章的形象，既不能掩飾中國人對民主自由的嚮往，也不能抹煞中國之春的理想與精神。元月五日，「中報」論壇版上又刊出了樂軒先生的「評論中國之春案與本末倒置」。該文持論極爲平實，樂軒先生說：「我們若確認王炳章乃欺世盜名之徒，宜仔細就此人的政見及做法引經據典逐點駁斥之」。這兩篇中立文章的刊出，與老闆傅朝樞的投共立場再次發生了正面衝突，矛盾表面化與尖銳化了。「中報」終於以「中國之春」問題爲導火索，發生了「大地震」。傅朝樞爲了使「中報」愈變愈左，爲了堅決地討好中共而在香港「九七大陷」後有個靠山，終於撕破臉皮，扯掉了「中報」中立的外衣，公然逼迫持中立立場的總編輯俞國基先生與論壇版主編陳冷辭職。

「中報」不中。「中報」左到哪裡去，人們正拭目以待。■

# 中報大地震

(本報駐香港記者一月十日專訊)在美國和香港同時發行之「中報」內部最近發生「大地震」。該報副社長兼總編輯俞國基和港版副總編輯李義仁等，均因不滿老闆傅朝樞之親共媚共政策，憤而脫離該報。惟俞及其夫人陳冷係與傅發生原則爭論後辭職，一月五日後即未再上班，李則因發表有關「中國之春」支持言論而被傅炒了魷魚。

李義仁原在美國留學，中英文均有造詣。經俞國基介紹與陳玉璽等四人由傅朝樞重金禮聘入「中報」，自美來港擔任副總編輯職務，堅持民主自由立場，在王炳章宣佈「中國之春」運動後，李寫了一篇文章，肯定「中國之春」的正面價值，傅朝樞認為此文開罪了中共，親自在港向中共有關方面認錯，並請中共方面特別供給一條搞臭王炳章的專稿，以便「立功贖罪」。該報因而於十二月廿二日刊出了「石家莊市長安區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談話」，這一發自「中國新聞社」的專稿，當時，該報還加了一個「編者按：這是『中國新聞社』關於王炳章事件的採訪特稿，效全文刊出。」編輯部的人開玩笑說：「這是傅老闆的特別訂貨。」與此同時，該報還發表了王玉蘭委託「新華社」和「中新社」代為發表的「給王炳章的一封信」。該兩文端盡對王炳章攻擊之能事。

原來，當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炳章宣佈棄醫從「運」之次日，該報紐約版在俞國基主持下即給以充份肯定的報導。傅朝樞於是採取「釜底抽薪」之計，僞稱有緊急要事磋商，將俞調到香港。其後該報對「中國之春」的調子即起變化，到十一月廿九日刊出以「『中國之春』爆出內幕」為題的新聞，開始給中國之春抹黑。

「中報」內部的路線之爭，即俞國基等以民主自由為重、堅持中間立場與傅朝樞反對國民黨、靠攏共產黨，以報紙為政治工具之爭，非自王炳章事件始。據了解內幕者透露，自該報紐約版開報以來，這種鬭爭斷續出現，但因傅朝樞當時一切倚重俞國基，故多是採取商量與施加影響的手段，及至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空軍飛行員吳榮根投奔自由，雙方才形成了短兵相接。

吳榮根「投奔自由」的消息傳出後，俞國基基於對新聞價值的判斷，決定以頭版頭條處理，不料傅朝樞在香港以越洋電話勸告俞刊在

不顯著角落，以免使中共難堪，被俞拒絕。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俞嚴正提出，作為漏掉新聞不登則可，輕描淡寫處理決不可，那樣將違背「新聞的良知」。結果，傅決定隻字不提，俞亦讓了一步。因而造成當日紐約華文報紙全都刊出有關吳榮根的新聞而「中報」獨缺的怪事。及傅朝樞得知連親共的「北美日報」亦以頭版刊出此訊，才向俞寫信道歉。此事在「中報」紐約和香港兩個編輯部中都成為笑談。

到了一九八二年底，傅朝樞為了進一步靠攏中共，打擊俞國基他們之間立場，先拿俞推薦的港版副總編輯李義仁開刀，停止李的職務。接着在一月五日接受了俞國基夫婦的辭職，暫以陳玉璽代理主持紐約編輯部。

傅逼走俞國基後，在該報宣佈其政策為批國不批共，特別規定不准批中共的「四個堅持」，不准批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巨頭；而對國民黨領導人除王昇和蔣彥士據其自稱有「私交」不能批外，其餘自蔣經國以下一律可批。據傳到香港的消息，紐約編輯部人員還被迫按其規定簽字同意，創新聞事業史上之「奇聞」。

香港方面新聞傳播界，對於傅朝樞的各種手段，頗多批評。指出傅此舉不過重施其在香港初創「中報」時對名作家胡菊人先捧上天，後一脚踢開之故技。

李義仁對傅朝樞違約解僱，聞將循法律途徑解決，即按胡菊人反擊傅朝樞之辦法對付之。胡菊人當時在文化新聞界廣泛的輿論支持下向傅朝樞發出律師信，迫使傅朝樞在正義和法律面前屈服，對胡菊人作了賠償。

「中報」老闆這種態度，在讀者中亦有反應。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該報論壇版刊出讀者寒梅以「春秋大義論時政——我看中報立場及社論」為題的文章，指出「中報標榜中立，俾對海峽兩岸政權稍盡言責。對台灣國民黨來說，自「中報」創刊以來就一直朝這個方向在努力，但對中共政權的諛言，批評則仍尚差。觀諸「中報」社論，有重要時事的分析，有引起在美華人共識的主題，有鞭策國府時政的春秋大義，唯獨缺乏對中共的諛言。」——此正好印證了大陸老百姓的話：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原文刊於紐約「華語快報」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 胡總書記的諾言能夠兌現嗎？

—歐陽平（國內來稿）—

在鐵道部招待所的住宿登記處，偶爾看到《人民日報》上一則醒目的新聞——《胡耀邦會見法國記者》胡總書記說：『如果你們（指法國記者們）沒有新的問題了，我想主動同你談一個問題。我們粉碎「四人幫」以來已經六年了，經常有某些外國記者提出疑問，中國政局是否穩定，是否會有動亂。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每年都要宣布一、二次，我國的政局是安定的、穩定的。我今天在這裡還要向法國朋友們說，我敢担保我們國家會一年比一年更加安定，更加穩定。』『朋友們知道，中國農村現在實行一種承包責任制。我在這裡也可以同法國朋友在中國安定的問題上打一個「承包合同」（說到這裡，胡耀邦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做了一個表示十的手勢說：「先包十年。」』

我為什麼會對胡總書記的這幾段話感興趣呢？原來，他的話使我想起了昨晚在鄭州車站外面所見的一件事來。當時站對面高大的中原大廈右前圍了一大圈人，一個人用山東口音在大聲地叫喊。因離火車到站的時間還有兩個小時，所以我和朋友們決定也到對面去湊個熱鬧。

到了那兒一看，只見一個塊頭高大的山東大漢正高聲嚷嚷着招攬觀眾：「武術！正宗少林武術！白看不要錢！白看不要錢！」

他首先表演氣功斷鋼絲。他拿出一長段鋼絲來，一邊往自己脫得光光的肚子上繞纏，一邊若無其事地與觀眾們笑談。當他纏好之後，便閉口吸氣不吭聲地運起氣功來。人們眼見他的小肚子漸漸鼓了起來。突然，只見得他一聲爆喝，那纏繞成幾圈的鋼絲竟然斷成了三截落在了地上。再看那山東大漢，竟然面不紅，氣不喘就像沒事一般。於是，周圍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大家都誇讚那人果然功夫了得氣功不凡。

接下來，那人又表演了單手肉掌劈斷單磚、雙磚和三匹磚；以及單拳碎石和以頭碎石和以頭碎石等真功夫。並且，他一邊表演，一邊說這些只是些三腳貓的小功夫算不了啥，而過一會兒，他將給大家表演他最拿手的功夫——刀槍不入。

一聽說將有這樣精彩和不可思議的表演，

大家觀看的興趣大增更不願意離開了。可當那人表演得差不多輪到最吸引人的拿手好戲上場時，他却故意賣個關子停住不表演了。大家正感驚異和不滿時，那人却從他放在地上的箱子拿出一個花花綠綠的小紙盒子來，他從小紙盒子中掏出三枚烏黑油亮的大藥丸來。看到此，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一個跑江湖靠賣打葯為生的藝人。

果然，當那人當眾將三枚大藥丸吞下之後，便向圍觀的人們吹噓和推銷他的葯丸了。他說他之所以功夫這麼好，力氣這麼大，身體這樣強壯特殊，其原因除了從小就開始跟師傅練功以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從他從來都沒有間斷過服用他剛才吞吃的葯丸——強筋壯骨大力丸。因此，誰要是想具有一身真功夫，誰要是想有他這般好身體和這樣大的力氣，最好是服用他的這種強筋壯骨大力丸。

這年頭，人們對以表演武術或魔術為名而吸引觀眾，但最終目的是為了推銷自己的打葯的這套把戲，早已司空見慣並已沒有多少人相信了。所以，當那人自我吹噓之後，竟沒有一個人買他的強筋壯骨大力丸。

一看生意是如此地冷淡，那山東大漢急眼了。他拍着袒露的胸脯問大家：『如果你們對我的葯丸有什麼疑問，那麼我再主動同你們談一個秘密。我這個葯丸，是我家祖傳秘方配成的，過去從來不外傳。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我才決定把它獻出來「為人民服務」。六年來，經常有某些觀看的朋友提出疑問，我這個葯丸是否是真的，是否有那麼大的效力。我敢担保吃了我的葯丸後會一年比一年更加強壯，更加結實。』

一看大家仍然似信非信，那山東大漢又繼續說到：『看過我表演過的朋友們都知道，我就住在這旁邊的車站旅館裡。為了向大家保證葯丸是真的，我將還在這裡繼續表演半個月。因此，我在這裡也可以同我買葯丸的朋友們訂一個「承包合同」。「講到這裡，那人在場子中央圍繞着人群走了一圈，同時做了一個表示十的手勢說：「先包十天。我這個意思就是說，關於對這個葯丸的「承包」，是證明我這個葯丸更貨真價實，更可靠的。如果你們懷疑葯丸的效力或發現是假的，十天以後仍來這裡找我，可以吐我的口水；砸我的攤子……』

看到這裡，我的那些朋友們提醒我說進站的時候快到了，於是我們離開了那裡。至於後來有沒有人信那人的話和買他的藥丸，我們也就不不得而知了。不過朋友們都說想盡一切方法或主動向人們兜售自己的「狗皮膏藥」的人，其語言和貨色往往都極不可靠，而且大多數是假的。

正因為昨晚所見到的那場表演印象太深，所以讀完胡總書記的那段對法國記者們的談話後，總覺得與那個賣打葯的人的表演和講話十分相似。

當我把這兩件事拿來相對比時，馬上就找到的它們的共同點：那個跑江湖賣打葯的人和胡總書記，他們兩人都自賣自誇和主動地向他人宣傳和吹噓自己所講的東西是貨真價實的；並且兩人都向他人做了担保以示其真實性和可靠性。但這兩件事的不同點：又在於前者只担保了十天；而後者却担保了十年。並且，前者的担保，不管是真也好或是假也好，起碼還可使一些傻瓜相信，因他提出了具體的保證：他將繼續住在車站旅館裡並還要在原地表演半個月，而且還敢提出來如不真十天後可吐他的口水和砸他的攤子。可胡總書記的担保，却沒有任何具體的東西來使人相信而完全成了一張「空頭支票」。他既沒有說我今年已經六十好幾但保證還能活上十年；也沒有說我敢担保我將在台上連續掌權執政十年而不垮台。

更重要的是，當今中國的老百姓都知道胡總書記是靠鄧主席的提拔和撐腰才上的台。而胡總書記也沒有敢担保說我的後台老板鄧主席將肯定會活上又一個十年；或是他還將繼續掌握黨、政、軍的最高權力十年。（如真的那樣，豈不又與新通過的黨章和即將通過的新憲法相違？）那麼，既然如此，胡總書記又是以什麼為根據來訂這個「十年的承包合同」的呢？

其實，說穿了，胡總書記自己對這件事都心裡沒底。君不見胡總書記既然稱「我敢担保我們國家會一年比一年更加安定，更加穩定」。可他為什麼只「先包十年」。而不敢包上十五年、廿年或他在「十二大」上宣稱的到時經濟水平將翻兩番的二〇〇〇年呢？

本來，一個國家的安定團結，我個人的觀點是應該以民主和法治來保證和實現。而當一個國家是否安定和是否有動亂的問題，落到了

由最高掌權者主動向外國記者們拍着胸膛打包票，以及以執政者的身體健康和安危來決定和保證的地步，那這個國家的未來是可悲的，也是不可知的。而今天我們的國家，則正是出現了這種可悲的情況。

當然，也有一部份人會說：我們現在需要安定團結，所以不能再做什麼去改變現狀了。可是，過去慘痛的教訓和現在嚴酷的現實告訴我們，美好的願望並不能變成所希望的事實。而且，自從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以來，中國人民享有過十年時間長的安定團結嗎？

正因為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享受過長時間的安定團結；而且中國的政局也從來沒有出現過十年長的穩定局面。那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就應該從中找到中國為什麼沒有長時期的穩定政局的根本原因——即我們的國家沒有民主，沒有法制和法治，官僚統治領導集團內部你死我活的爭權奪利的鬥爭等等。而正是這些封建專制的東西，限制了我們國家的進步和導致了政治局面的動蕩不安。

但是，要解決上述問題並求得一個長時期的穩定政治局面，僅僅靠人們的美好的意願去等待上蒼的恩賜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況中國人民早已失望地等待盼望了二、三十年。那麼依靠某個領導人來像賣打葯似地那樣拍胸脯打包票「先包十年」行不行呢？我想是肯定不行的！因為遠的例子不說，就拿六年前當我們的那位「英明領袖華主席」上台時，我們年高德不動的葉劍英委員長和當時深得民心擁護的鄧小平副主席，都向全國人民打過同樣的包票說：從年齡上來講，英明領袖華主席今年才五十多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期。因此，從時間上說來，這就保證了我們的黨的最高領導人能夠穩定地帶領着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勝利地進入二〇〇〇年。但無情的事實却揭穿了當權者們所開出的這張空頭支票：「英明領袖」並沒有穩定地領導中國人民二三十年，却在上層權力鬥爭的傾壓下和群眾的不滿聲中迅速下了台。所以，我完全有理由懷疑：胡總書記打的包票也許不僅同樣地不會實現，而且很有可能他也會步「英明領袖」的後塵，在黨內爭權奪利的政治動亂中垮台。

一九八二年於北京

## 野火燒不盡

在這大河上下雪舞冰封，寒風刺骨，嚴冬已至的日子裡，忽然傳來了一絲春的訊息——一本新的民運刊物「中國之春」創刊出版，它的誕生，標誌着中國民主運動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和昇華，一個民主運動的新高潮即將到來！

我們歡欣、振奮并感到驕傲，激動的心情雖千言萬語也難以盡述暢懷！我們歡欣——因為「小草」有了強大的同盟軍。我們振奮——是因為「中國之春」引起的反響，證明中國的民主運動及其喉舌——「民刊」得到海內外許多朋友的支持。我們感到驕傲，是因為從「北京之春」到今天的「中國之春」，我們完成了一個飛躍！中國的民主運動走過了一段不長的路程，雖遭到了挫折，但只使我們經受了考驗和鍛鍊。在今天的形勢下，中國的民運戰士，將以全新姿態，以更高級的形式，發展自己的成員，壯大組織力量，拓展自己的影響，擴大自己的聲音！「中國之春」將是一面沖鋒在前的旗幟，她定能團結更多的民運志士，引發蓄能於大陸各地的熊熊「地火」，把中國民主運動的規模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前，是別人發現我們、採訪我們；今後，將是我們走向世界，告訴全球的朋友和敵人：中國「覺醒的一代」要創造和迎接「中國之春」——使民主自由運動之「春」早日全來！

今年八月，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小草」破土而出并頑強生存至今，不少人為她流了汗，洒了心血。為了「小草」，有人被捕，有人外逃，也有人仍堅守崗位在「地下」！我們堅信：「小草」雖然幼弱但決不孤獨，成千上萬株「小草」就是把荒漠變成綠州的力量。我們更堅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真理；堅信：「只要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我們把這些古今中外歌頌新生事物、鼓勵志士奮鬥——逆浪行舟的名句，當成中國民運戰士的座右銘。

「小草」歡呼「中國之春」，「她的枝葉放展於國外」——必能夠格外壯大，起更多的作用。「小草」是你深紮在國內的根系之一；是你的同志和戰友。我們不惜粉身碎骨，願為「中國之春」的早日到來「鞠躬盡瘁」，願為中國民主自由運動的勝利「死而後已」！

大陸民刊「小草」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

## 歷史的使命

近幾年來從中國大陸移民到北美的新僑們，雖然在語言、工作困難的情況下，並且為了謀生而付出艱巨的勞動代價，但是，我們在空閒之中，常常懷念故土，大家接觸到西方國家環境之後，體會到他們的法律比較我們為完善，民眾享受的民主與自由要比國內為確真。深深感到我們中國需要民主與法治。

由於滿清的腐敗，列強的侵略，中國近代史上缺了一堂資本主義啟蒙之課，深根蒂固的封建思想殘餘至今陰魂還在。毛澤東只是打着共產黨旗號的現代封建君王，我們的社會沒有言論自由，到處是一個論調，一種思想，幹部終身制，一人當官全家升天，當年共產黨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又顯在它自己的身上，共產黨借助人民的力量得了天下，而現在又高高坐在人民的頭上，被稱為國家的“主人”。人民群眾只能忍受，稍有越軌，右傾、資產階級、仇視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帽子、棍子接踵而來。所謂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暴露出他自己爭權奪利的真面目，也開始震醒了人民。現在，「中國之春」在地球的另一邊又點燃了民主運動火炬，再傳回國內去，肩負它的偉大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問題（包括大陸、台灣、香港等等問題）關鍵是中國大陸問題，而解決中國大陸問題的關鍵在大陸的人民。中國民主運動的方向就是為建立一個完整的法治和民主國家而奮鬥。由於各種條件和情況，無論國內或國外，中國民主運動必須提防不被國民黨和它的外圍組織所利用。中國民主運動要提倡民主與法治，反對任何政治黨派實行一黨專政，主張實行真正民選，國家各級官員規定任期，黨政分離，軍隊不受於政黨領導，軍隊不參予政治，保障人權等等。

中國民主運動是有別於國民黨、共產黨的中國第三力量，雖然它的力量目前還處於薄弱階段，但前途無量。當前怎樣去製造輿論，團結人民，推動統治者的民主改革，這是一個大課題，而又涉及很多鬥爭藝術方法。

中國民主運動在團結國內外同胞基礎上，同時爭取國共兩黨中各階層的有識之士。可以這樣預言，實行民主與法治，統一和繁榮強盛的中國的歷史使命，將落在中國民主運動的肩上。

一個大陸新移民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三日

# 孫中山的中國

仁度

正如科學家稱這物理宇宙為愛因斯坦的宇宙，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國應給稱為孫中山的中國。這些響亮的字眼，在一部「中華民國憲法」，四部「人民憲法」都有提到。但中國却不斷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孫中山的中國不是現在的中國。孫中山的台灣也不像。孫中山關懷的香港仍在英人手中，居民反而害怕給祖國收回！

最近「中國之春」所發起的民主運動，可說是多彩多姿，海內外同胞反應熱烈空前。這並不是意外。因為近日華僑在美普選的踴躍投票，香港的收回問題，都反映出華僑的普遍醒覺。「民運」的催化劑，早已存在；由來自大陸的留學生主動，各項反應的因素便告齊備。當然這個運動的基礎，應由華僑起建。春天的種籽，不單是逢春吐艷的花，不單是能飽一季的嘉禾，而應包括千百年的巨木。這些花果樹林的栽培者，非華僑莫屬。另一個華僑救國的時機，業已成熟。

這裡所指的華僑，包括尚可享受十五年自由生活的五百萬香港居民。香港學生贊助民運的發起和傳播，也是很可敬和自然的事。青年人的熱誠，對自由的傾愛，切身的問題等因素在香港留學生身上，都已具備。來自大陸和台灣的留學生，顧忌仍多，唯感興奮，但活動不夠公開。像我這一群來美十數年的老學生，起初也懷疑這運動充其量不過是國民黨意外撿到的宣傳資料，轟動一時就會消失；所以多採觀望的態度。這也難怪，老學生老華僑一輩子聽到的是忽左忽右的宣傳口號，民主運動畢竟是個老口頭禪，令人見怪不怪。

已有人在報章發言，以為民運針對大陸的專政，跟台灣無關。因此用不着批評國民黨，省得兩面作戰。這種觀念是不能被華僑接受的。孫中山，國民黨與華僑的淵源是不可否認的。台灣政府的僑務也的確辦得比中共高明，這是中共也承認的。但是在這淵源的滋長過程中，華僑的發言權小得可憐。現在，至少也由於時勢所使，革命之母已覺悟到，必須親自將民主幼兒，好好的培養成長。這種大事，不用假

手於國民黨。

有了學生和華僑的支持，民主運動才能成為一股不可阻止的力量。它的迅速漫及自由地區是意料中事；它也會波及台灣，終至中國大陸。但不能讓那一個黨派或政權，將它收歸私有的統戰工具。國民黨的防民恐共，正如一隻老鼠的害怕白貓黑貓；這已是衆所週知的笑柄。雖然目前台灣民衆對民運反應熱烈，不遜於海外同胞；但已有些成見已深的學者專家，申言應由國民黨來領導民運。身為華僑，我們不禁先要發問，國民黨或台灣政府能對民主運動提供何種貢獻？

廿幾年前，在台灣也有一份類似「中國之春」的雜誌，叫做「自由中國」，由一些不怕死的智識份子主辦，也曾獲得青年學生的愛戴。但它被害怕民主，不能容人的國民黨封閉掉，主編人雷震被捕後不知去向。甚至今天，台灣大學的學生，仍不許普選他們的代表！台灣當局，不管自願與否，將是第一個接受這運動的考驗的對象：是否讓「中國之春」在台發售？是否讓這一類的文章與青年學生接觸？要阻止這個運動的蔓延，在大陸只有不再派人出國學習；在台灣也要關住留學生，不與外國通商往來。這種措施的代價過高，任一方面都付不起的。

再說國民黨與「革命之母」的關係。今日的國民黨已像是個陽奉陰違的兒子。政治上與孫文思想背道而馳；教育上將三民主義教條化和八股化。與中共十幾年前的神奉毛語錄並無二致。以仿共來反共，對三民主義是一種侮辱。所謂「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空談，與封建時代的「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同樣的可笑和幼稚。

不使淪為國民黨統戰工具，是民主運動最主要的立場。若這立場動搖了，那何必在國外發起這種運動？王炳章也大可去「投奔自由」，生活無慮，生命無險。將「中國之春」滙台發行，能保證幾年不遭封閉？

我的深責國民黨，也是連想到這個革命母子的關係，愛之深，責之切。國共雙方最大的錯着，是低估人民的知識水準和對自由的渴望。自孫中山發起革命以來，民主這個幼兒，童年受盡折磨，却已長大根深。王炳章是大陸「

只是了費

一民胡說

切說

親美的

新華社已放出了

胡說

解放」後的新一代，而有強烈的自由傾向，而有效法孫中山的壯舉，可見這一代民主自由的思想，是與生俱來的。

除了不惜以繁文強調這個立場外，我還有些具體的建議。雖是個人意見，但深信能與民運本身同樣的獲得中華兒女的共鳴。

(一)民運本身，以及其喉舌的「中國之春」，應儘速取得華僑的廣泛參與。若不這樣，不能在國外生根，何況是高壓的國內。這是很顯明的結論。目前的運動，始自青年學生，當然是正確的做法。在這輿論媒介傳佈迅速的太空時代，辦一個雜誌也是對的。但單是一門雜誌是不夠的。「中國之春」呼籲僑界出錢出力出文章，但不接受任何政府政黨的支持。我認爲自由地區的社團報社的支持，却應努力爭取。香港美洲已有許多獨立的報紙。甚至新近幾家由台灣來美的分報，立場却能基於僑情，也常有真知灼見，公正評論。有了許多僑報的支持，才能獲得華僑的積極參與，才能喚起民衆。

(二)摒棄個人崇拜。清亡以前，有人主張保皇立憲，認爲中國不配民主，不如留個皇帝來崇拜。不幸在滿清亡後，許多領袖，口稱民主，實搞保皇。更糟的是當自己就是皇帝，要人喊萬歲。長久下去，法治自然不張。

這次的民主運動，由於許多顧忌，僅由王炳章與世見面。當然王博士的思想、學識、勇氣和熱誠都是無懈可擊，但不免在報上看出染上英雄主義的色彩。這在王博士的生命上加上一層危險，他的家庭生活，也不能藏私。在支持者方面，也以過苛的條件盼望個完人來領導。因此，「以法治取代人治」必先由民主運動的組織做起。在最短的時間內，民主運動應先訂立組織法，財務公開。立法後必須加予保護和遵守。

(三)堅持不組黨，不流血，不走極端的原則。在這科學時代，智識是最有力的武器。所謂「鎗桿底下出政權」是暴力革命的落後思想。現在的統治者的智力，也不能低估。他們當然能體會到，民主思想的力量比鎗桿更可畏。卅年來的高壓政策，已使有爲青年離國而獲解放高飛。晉才楚用，當然使祖國日漸淪落。其效果遠甚於喪失萬枝鎗桿，或打一場敗仗。

不流血的革命，常被譏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五年十年總可成吧。一九七九年的香港「大限」，距今也不過十五年。若憑暴

力革命，十五年是不夠打的。大英帝國的日漸解體，亞非舊殖民地大都不流血而獨立；難道千年文化的十億炎黃子孫，還要訴諸野蠻的武力嗎？卅年來民意被剝，無人敢言。民主運動無異於將十億民意，直接託與一千萬的海外自由同胞。對這個信託，華僑是責無旁貸的。

華僑的積極參議參政，將是今後中國政治的特色。這種方式的治國，其力量是不可抗禦的。猶太人就這樣做過，中國人何以不能？以千萬人當十億人民的議員，當然還是不能避免空談不爲的劣習。因此，我建議些具體的參政辦法：

第一，華僑應以輿論及經濟的辦法，要求直接管理北京，台北兩地的僑務委員會。這些現有的組織，是現存制度下改革的第一個對象。僑務畢竟是華僑的事，何必由未嘗僑居甘苦的執政者來代勞？常務委員須由香港，海外敢言無懼的人士擔任。各省也得設僑務會。這是引進自由民主僑資人才，使經濟起飛、科技發達的有效步驟。

第二，華僑應爭取民權，要求真正的選政於民。必要時要監視選舉，以僑意保障人權。

第三，要求權歸地方。中央集權，一黨專政是萬惡之源。除了解散專政的政黨外，地方自治是分化集權的另一法。這並不是基於「合久必分」的書生之見。今日美國也已覺悟到聯邦集權太大，進步沒有以前各州享有高度自治權時代的神速。地方自治是刺激競爭的良藥。中共已有名而無據地將自治辦法提供於香港、台灣的問題上。這股良藥遠比解放政黨可口些。最重要的是自治區應保留大部稅收，直接用於經濟，教育和貿易，中共不得過問。各地區自發自強，也必相競爭取人才。華僑應促成這些自治省或合衆國的早日成立，並且要在收回香港，統一台灣之前做到；以示榜樣，建立信心。

我是個科學工作者，所以此文理論實際並重。平日常感在學術上或工作上，我的智力和努力並不強於同等程度的洋科學家。中國文化使我稍能突出，引進異於西方的觀念及方法。與其他華僑科學家談起，也多有同感。但我的兒子就沒有這種文化特長。今日的國內，設法讓他們學到這些。沒有傳到文化遺產，他們長大後，祖國的興亡，當然與之無關痛癢。

孫中山所熟悉的華僑，已一代代地老暮，去國不歸。只有中山先生的中國才能以祖國文化哺養再下一代的遊子。廿一世紀若還見不到孫中山的中國，那末再也沒人會以中國人自傲了。■

# 拿出良心支援中國之春

—阿修伯

自從中共派遣留學生出國以來，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王炳章先生公開宣佈了他將棄其所學醫科專業要來獻身民主運動，此舉引起了海內外中國同胞的熱烈關心。因為王先生出身於中國大陸，他所辦的「中國之春」刊物鼓吹的也是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在台灣的國民黨對於王炳章的行動有着複雜而矛盾的心態。

起初，國民黨希望把王先生塑造成為一個「反共義士」，最好由國府導演，手搖青天白日旗，高喊幾聲「打倒××！」「××××萬歲！」「×××萬歲！」後來眼看着王先生不願成為任何黨派的工具，對於右派的統戰接觸保持距離與警覺，右派人士就開始對王先生做起種種猜測，漸漸十分不友善了。右派人士心胸之狹窄，氣度之貧乏，眼光之短淺，識見之卑薄，不知影響，不認是非，不識好壞，不計效果，不明利害，把多少朋友不是逼成烈士就是逼成敵人！真是可憐可嘆！

國民黨老官僚陳裕清公開在座談會上指出：王炳章鼓吹中國大陸民主運動是為了救共產黨，有如滿清末年康有為梁啟超的君主立憲改良派保皇黨。這樣的狂右派人士希望中國大陸永遠沒有民主，永遠封建愚昧，希望中共永遠鬥爭專政，打、砸、搶一片混亂，永遠爛下去，希望十億同胞永遠呻吟哀號，希望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永遠被窒息。最好是大陸神州陸沉，這樣才能徹底解除中共對台灣的威脅，他們就可以永久偏安台灣了。王炳章先生是中共的諍友是和平的改良主義者，他的民主運動是對中共的治療保健，使中共健康強壯起來，對台灣國府是十分不利的。這種心態與狂左人士忌恨國民黨開明派改良主義者是一模一樣的。阿修伯却是希望國共雙方的民主派改良主義者都能成功都能掌權，國共雙方統統健康強壯和平理性，那樣才能順利的解決中國問題，也才真正是中華民族的福氣也。

多年來，海外有許多督促鼓吹台灣民主運動的活動，那也是對國民黨的治療保健，促使國府健康強壯起來。可惜的是，國民黨老官僚從來就不認為這些人是他的諍友，更絕不會認為他們是國民黨的保皇黨，反而採取戴帽子打棍子的手法對付，並以中共的威脅為藉口，更加理直氣壯的做出種種反民主反人權的行為，有如慈禧太后的對付康梁保皇黨，終於導致大清帝國的覆亡。而中共老官僚對大陸民主運動

人士的殘酷壓制打擊迫害比國民黨老官僚更加恐怖，他們使用「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顛覆破壞」為藉口整肅異己。我們清清楚楚的看到了國共兩黨在本質上都是繼承了中華民族五千年封建官僚傳統，唯我獨尊，唯我獨大，忌恨民主自由法治人權。中共則因加上了外來的偏激狂熱馬列主義鬥爭專政，其獨裁、排斥、橫暴、野蠻較之國府更勝一籌！

由王炳章先生辦的「中國之春」足以證明中國大陸十分欠缺民主，右派人士對此十分興奮得意。但是，請右派朋友們不要忘了國民黨所實行的黨禁、報禁、戒嚴法以及關押了許多年的政治犯，這也不能算是什麼民主吧？不能用兩種標準來評判同一件事情啊！我們同樣須要辦一本「台灣之春」來促進國府的民主啊！

目前海外左派已經明明白白對「中國之春」採取敵對立場了。美東左報社論認為王炳章提出文革時期中共的封建專制官僚特權黑暗腐敗是無理取鬧，今天的中共已經沒有這些現象，形勢一片大好，就中國來說已經是最民主的了。大家要集中精力搞四化才對，王炳章偏偏要搞什麼民主，真是不知好歹故意搗蛋嘛！可笑的是這些左派朋友在四人幫當權掌政時也唱着同樣的調子，他們永遠擁護當權派緊跟黨中央真是聰明啊！

承蒙看得起，也不知是何方神聖長期贈送「人民日報」和「紅旗」半月刊給阿修伯看。就從中共自己的報導中得知，今日的中國大陸雖然比毛始皇四人幫的地獄時期要好得多，但是，仍然有頗多的封建專制官僚特權黑暗腐敗，為了搞統戰連老牌漢奸梁容若也被封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知識貧乏的外行官僚仍然領導內行，大搞一言堂，最近又有搞個人崇拜的什麼「鄧福樓」出現。既然要「專政」「集中」又有「四大堅持」「革命路線」，那還能談什麼民主呢？王炳章先生大聲疾呼民主，絕對不是無理取鬧，中國大陸太需要民主了。更何況，即使站在功利的立場上，沒有民主也是搞不好四化的。

阿修伯一向十分敬重大陸報導文學作家劉賓雁先生，劉先生最近來紐約完全在左派朋友的包圍中，阿修伯居然連見他一面一瞻風采的機會都沒有，這實在是有違中共所號召的「三通」「四流」原則也。劉先生在接受香港「七十年代」主編李怡先生的訪問中，對於在中國

大陸爭取民主不以爲然，他認爲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文化條件不夠，無法實施民主。劉先生可敬之處是他承認今日中國大陸距民主頗遠，這比那些閉着眼睛昧着良心歌功頌德的海外左派要强得多。但是，阿修伯認爲民主與經濟、文化是互爲表裡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絕不是互相妨碍互相扼制的。由廣大的人民當家做主才能監督防止少數官僚特權亂搞，虛擲民力，浪費民脂民膏，才能促進經濟建設教育文化的發展，由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更加啟迪民智更加促進民主階段的上昇，如此良性循環，政治、經濟、社會日趨健全，國家、民族才能日益興旺。當然，今天王炳章先生所呼籲的民主，不會是要一步登天使中國的民主階段立刻達到歐美的水平。但是，像今天大陸上仍然以言治罪，秘密逮捕，不公開審判，勞改勞教，人權毫無保障，人民沒有發言權，完全由官僚特權爲所欲爲誤國誤民。黨的主席對於犯人的判決隨意發表意見，毫無法治觀念，種種等等坑害即使用中共自己所公佈的憲法來衡量，連最基本的民主法治都談不上，難道還不應當盡力呼籲促進大陸的民主嗎？

美東左報又有論調認爲王炳章受「祖國的乳汁撫養成人」「是國家信任而加以培養」祖國和人民的確沒有虧待他」這些話也許都不錯。但因此而指責王炳章「叛變」「忘恩負義」「受人利用」「親者痛仇者快」則未免荒謬。

當年孫中山先生也是吃滿清帝國的乳汁長大，他却要革滿清帝國的命，劉邦、項羽是吃秦朝的乳汁長大，他們都揭竿反秦。今天許多從台灣出來的海外左派都是吃國民黨乳汁長大，受國民黨的教育培養，國民黨不但沒有虧待他，相反的，他可能在台灣就享受過不少特權特惠呢，怎麼今天來到海外却成了國民黨的死對頭呢？以前右派以同樣的論調痛責這些在台灣受教育的海外左派忘恩負義，被海外左派迎頭痛擊，想不到今日海外左派却以同樣論調來指責王炳章，你說可笑不可笑？什麼左什麼右根本就是一模一樣滿腦子皇恩浩蕩的封建奴才思想，何嘗有一點人民當家做主的氣魄？

今天王炳章並沒有要革中共的命，並沒有成爲中共的死對頭。就是因爲他忘不了祖國的乳汁之恩人民的培養之義，他才不願自己個人事業生活享受，毅然決然走向鼓吹中國民主之路，王先生才真是有恩有義，他的行爲應該是使仇者痛親者快才對。他受哺於祖國和人民，但却不是反哺於某黨某派！至今還有那麼多左右派高級知識份子硬要把黨派、政權，和國家

人民混爲一談，你說奇怪不奇怪？

海外左派另一個打擊中國之春的手法就是針對王炳章的婚姻問題大做文章。其實，王先生的個人私生活與「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並沒有絕對的關係，不應混爲一談。想當年，孫中山先生獻身革命，與宋慶齡女士同居時，孫先生在廣東鄉下早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髮妻盧女士，並已有一子孫科。孫中山先生要從事政治運動必須宋慶齡女士的幫助，他鄉下的妻子却沒有這樣的能力。今天不論國共不分左右派中國人，都沒有人認爲這是孫中山先生和宋慶齡女士的大污點，大家仍然對孫、宋十分尊敬，他們的結合也沒有造成孫中山民主革命的任何不利。左派朋友們實在用不着在這事上化工夫用心思浪費精力了。有空時，不妨檢討一下你們自己的私生活吧，或者你們不妨去參加右派人士的「中華文化復興會」「道德重整會」「孔孟學會」來一個左右合流道貌岸然一番。

右派朋友雖然還沒有像左派朋友那樣聲色嚴厲的抨擊中國之春和王炳章個人，但是對於「中國之春」的「不識抬舉」也已露出愠怒之色了。美國狂右報紙——世界日報登出讀者投書，對於「中國之春」批評台灣國府有非常激烈的反應，威脅「將來如果他們再無理的傷害台灣，我就會馬上停止訂閱。」但却說不出中國之春如何「無理」？阿修伯承認台灣的經濟、文化條件比大陸好，因此民主的階段也比大陸高，但是說台灣十全十美不准批評，那就真是一付「大爺出錢是叫你罵中共的，不是叫你批評台灣的！」爲富不仁爲富不義的霸道嘴臉了！

不但國共兩黨的本質十分接近，分別歸附於國共的狂右狂左人士的心態也是一模一樣。狂右派口頭說要解救大陸十億同胞，其實心裡恨不得十億同胞自動毀滅才不會威脅到他們。狂左派口頭上要解放台灣一千八百萬同胞，其實心裡恨不得台灣自相內亂殘殺破壞，再由他們來接收。他們一旦發現「中國之春」只爲中國人民爭民主，不爲任何黨派做走卒時，狂左狂右對「中國之春」的態度就會統一了，他們會不謀而合的杯葛阻遏打擊「中國之春」的發芽生長壯大。狂左狂右完全是站在黨派私利的立場上，根本不把民族利益同胞幸福放在眼內。

中國之春不能靠左邊也不能靠右邊，只能靠中國人的良心走堂堂正正的大道路。等到大陸與台灣「兩個中國」都有了民主有了春天，那才是中國和平統一的時候。同胞們，讓我們共同努力來發揚中國人的良心支援「中國之春」促進中國民主和平統一這一天的早日來臨吧！

自述  
夢話

# 小小的改動，大大的不同

——丁（香港）

一九六一年一六四年，雙山完成了一部批評毛澤東思想的鉅著「毛澤東思想論稿」，第十章為「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主要指出毛澤東文藝政策的出發點，是不正確地引用了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回國前所寫的一篇文章「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不知是那個「秀才」在翻譯時，題目和內文都把歐洲通用的 literature 這個字一律譯成了「文學」，毛澤東就是依據這譯文發表「講話」的。不消說，這不是毛澤東獨有的意見，斯大林早已曲解列寧的原意，用來作為控制文藝的工具了。中共本來沒有文藝政策，自從一九三六年長征結束偏安延安後，集中在保安的文學家組織了「中國文藝協會」，毛澤東致辭說：「文協要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

他祇簡單對文藝提出了一般方針，並不用作指導思想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抗日運動高漲，宣傳抗日的文藝活動也隨軍事活動大大地開展了。但文藝部門還是各自為政的，沒有集中的統一領導，主要活動的是多種多樣的劇團，中西雜陳，新舊並存，祇要有些反抗意識，就能搬上舞台。

一九四一年五月，「解放日報」出版，由王明系的博古主持，編文藝副刊的是丁玲。當時部份文學家（舒群、蕭軍、白朗、羅烽、艾青）已與周揚對立，發生爭論，幾篇小說（「一個釘子」「廠長追豬去了」），也引起外界注意，甚至有人「對號入座」，安塞紡織工廠的廠長查問寫文章的是誰。

可是引起軒然大波的是幾篇雜文，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都對延安已在萌芽的官僚特權有所諷刺。黨政軍的頭頭或多或少表示不滿，王實味後來被殺，丁玲在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時，罪案之一，仍是這篇「三八節有感」，除了周揚是當時操刀的劊子手外，姚文元亦已嶄露頭角，掄起手中的「金棍子」了。

據丁玲說，這兩篇雜文直接引出了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結合整風運動進行的，「講話」成為半世紀來規范文藝活動的桎梏，多少人因為想解脫這桎梏而獲罪，胡風更以「反革命」罪與文字獄，被視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百八十多人以及受株連的家屬，到一九八二年才陸續平反。三十年來，

死的死了，老的老了！

毛澤東「講話」提出「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他說是為人民，為工、農、兵和小資產階級；他又提出文藝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他說應該寫光明面，不該寫黑暗面。他進一步說「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履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綫」，無產階級文學藝術該如列寧所說，是革命事業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無產階級革命是黨領導的，黨又是少數政治家領導的，所以文學家應該分清無產階級政治家和腐朽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區別，不能把無產階級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了。他說文藝需要文藝批評，文藝批評第一是政治標準，第二是藝術標準，作品的動機必須符合社會效果，否則就不是好作品。由此他就說到延安文藝的缺點，他反對「人性論」；反對「愛」，「人類愛」；反對「寫光明與黑暗並重」；反對「暴露文學」；反對「魯迅筆法」，因為魯迅處在黑暗統治下面，但在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雜文的寫法就必須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用滿腔熱情來說話。

他直接地問：「對於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由此談到「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蠢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三十多年中不斷發生的文字獄，莫不以「講話」所提出的標準為依歸，憑此標準，共產黨隨時可用文藝批評這把刀子，對作家生殺予奪，批倒批臭，迫得作家自殺，病死，或者精神分裂。

最近幾年，共產黨雖還年年紀念延安文藝「講話」，却不得不放寬文藝控制政策，給作者以相當的寫作自由，但仍沿用毛澤東的「社會效果」說，批評、甚至禁止葉文福、沙葉新、白樺的現實主義的諷刺作品。

這一切，毛澤東都假列寧的「黨的組織與黨內文學」之名以行，彷彿他才是正統的列寧主義者，誰都不敢異議。實際上，他的「講話」扼殺了文藝的生機，祇有歌功頌德的作品才能存在。

列寧的文章寫於一九〇五年，直到一九四



○年十一月才在「真理報」上發表出來，這時斯大林的官僚主義統治已經鞏固，任由他如何解釋，沒有人敢說「不」字了。

毛澤東的「講話」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不是偶然的，偏安延安之後，共產黨暫時得到休養生息，毛澤東也得以補修「馬列主義」，如陳伯達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實際上，他補修的祇是斯大林主義。把列寧文章中的 literature 一概譯做「文學」，就是斯大林修改過的列寧主義。

原來 literature 這字有多種解釋，牠有「文獻」、「文件」、「出版物」、「出版業」各種含意，不僅僅「文學」一種意義，把列寧文章中的廣義用法全譯做狹義的「文學」，簡直無法了解他的前後文義，這是讀他文章時一看就知的。但幾及半個世紀，無人敢指出這個矛盾，祇有雙山在海外批評毛澤東的整個思想，才專闢一章指出他的文藝觀點，不過是歪曲了列寧原意的斯大林主義吧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發表了列寧文章的改譯：「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並由「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斯大林編譯室」具名，寫了一篇改譯的說明。

文章所述不出雙山批評的範圍，這是可以對照看的。祇是文章沒有觸及毛澤東的延安文藝「講話」，更沒有糾正毛澤東對列寧意見的

錯誤引述，這從「四個堅持」說，也是可以理解的。

譯文的改變，差別是很大的，舊譯中所有的「文學」一字，現在改做「出版物」的有十一處；改做「寫作」或「寫作事業」的有十四處；「文學關係」改作「買賣關係」的一處；「文學」或「文學創作」單純改作「創作」的二處；「文學者」改作「寫作者」三處。

從整句句字對比來看，更顯得意義差距之大，例如：

「出版物應當成為黨內出版物」（新譯）

「文學應當成為黨的文學」（舊譯）

「我把寫作事業比作螺絲釘」（新譯）

「我把文學比作螺絲釘」（舊譯）

「紅旗」雜誌是共產黨的理論刊物，牠登載了一篇改譯，一篇說明文章，應該認為這是原則上否定毛澤東「講話」的意義，並重新定出文藝政策的標準。雖未寫成「決議」，至少文學家此後不必劃地為牢，誠如列寧所說，可以在「廣濶天地」馳騁了。

奇怪的是，文藝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迄今仍沒有對這個改變作出反應。小鞋子穿得太久了，驟然放足，反而不良於行吧？但不久將來，它必然會出現巨大的影響，不僅文藝工作者獲得徹底解放，而且會滲及其他意識形態方面。

## 死而後“已”

趙小青（國內來稿）

### 一、北京城裡的“奇談怪論”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會日期，由於其黨內最高領導階層內部之間激烈的權力之爭，所以遲遲的定不下來，一延再延。按照當今在黨內執掌大權的鄧小平派的原定計劃安排，“十二大”應在去年（指一九八一）召開。但因為“十一屆六中全會”未按既定日期召開“拖了後腿”，所以“十二大”才拖到今年，最後定於九月一日召開。

有趣的是，“十二大”還未召開，在北京城裡就流傳開了一些從“最官方權威人士”那裡來的奇談怪論。而其中最覺稀奇的，就要數“我們一些黨的最高領導”，雖然“年齡已很高”但卻“德劭和深得民心”。……，不能讓他們“掛

冠而去”，而應該讓他們繼續留在領導工作的崗位上領導我們的黨和國家，以求保證我們國家能夠大治和有長期的安定團結。

這種與將要在“十二大”上通過的新黨章中，有關各級黨的領導幹部的在職任期的規定針鋒相對的言論，來自於我們的葉劍英“老委員長”。並且，無獨有偶，人們也從“德高望重”的陳雲和有“不倒翁”和“石油幫”的總後台之稱的李先念的手下人員，那裡聽到了類似的「豪言壯語」。

“明眼人”都很清楚；那種奇談怪論是隨著大權在握的鄧小平而來的，鄧小平早在八〇年就提出：要在黨的“十二大”召開時開創一個各國共產黨黨史上史無前例的先例——設立壹

個黨中央的顧問委員會。

當初鄧小平設想的中央顧問委員是相當於政治局委員。並且顧問委員的職責和日常工作將是諮詢、討論、參謀、檢查、審核、通過批准黨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以及提出或補充各種具體的建議。同時，鄧小平還詳細地提出能進入顧問委員會的成員資格——具有四十年黨齡的部長級以上的老幹部。可見此委員會是專為那些大權在握，但同時又年老體弱，占着茅坑不拉屎或“不聽話”的人而設的。

## 二 葉劍英為何想要提前南下過冬

根據上述能進入顧問委員會的資格和條件，其最有資格的人，當首推葉劍英了。因論年齡，他最大；論黨齡，也可說最長；論行政職務，他最高（人大委員長）；且論身體，他最差，他說話困難並且連走路都要人挾扶，但更為重要的是，當今在黨內和軍內唯一還擁有一批追隨者，而敢於同“鄧大人”分庭抗禮的，也就剩下他一個人了。所以，對於這個無可奈何的“眼中釘，肉中刺（但現在黨內有的領導人只以為他是一塊“大拌腳石”。）請他進入顧問委員會，的確是條上策，即冠冕堂皇地以廢除幹部終身制，請接班人跟上來為理由，又達到了清除黨內反對派的總後台的目的。

但要葉劍英乖乖就範，心甘情願地進入顧問委員會裡去“享清福”，不那麼容易。因為他雖然也在嘴上高講什麼“要在老幹部的幫助和帶領下，在群眾的監督下，讓越來越多的年輕或比較年輕的幹部把我們各項事業的領導責任擔當起來”（註1）但實際上却久久戀棧或霸棧不去。所以，對針對自己而設顧問委員會一事，他表面上不好直接提出理由反對，暗中却大唱反調。

眼看“十二大”召開的日子一天天的臨近，以葉劍英為首的一批應該進入顧問委員會的中央領導人對此事還沒有任何動靜。這就給黨內的另一派人出了個很大的難題。因到時這批該下不下的老頭子們裝聾做啞硬是不退下來，那“十二大”的主要任務之一——使黨的領導幹部隊伍年輕化豈不將成爲一句廢話？於是，經過內部的反覆商量，黨內的掌權派決定派出一人前往葉劍英處游說。這吃力不討好的“摸底”任務便義不容辭地落到了胡耀邦身上。

使胡耀邦大吃一驚的，是當他來到葉老師住處後，問候請安之類的話剛完，葉劍英就先發制人地表示；自己的年事已高，對黨內的工作過問和領導方面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但自己始終是抱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原則盡力而為。並且自己的身體現又不太好，所以想在最近提早南下到廣東去過冬。

胡總書記聞言便暗叫不妙，知道葉劍英話中有話。葉劍英一旦離開北京南下，那即將召開的“十二大”這幕好戲就唱不起來。所以，葉以年齡大，身體不好要提早離京南下的理由是假，而以此話表示不滿和不願退出政治舞台是真。葉劍英以不辭職或退休但又不參加“十

二大”為要挾，這種手法早有先例。如以往的幾次中央全會或人大會議，葉劍英對人事上的安排不滿或認為是在削弱他的力量，就死賴在南方不返而使會議一再延期召開。

由於黨內的掌權派們對於“十二大”寄予很高的希望，想要把它搞成自四五年“七大”以後的具有歷史性偉大轉變的會議，所以此次會一不能“流產”，二也不能成爲主要領導人拒不出來參加的“獨角戲。”因此，胡總書記除了關心地問候葉老師的身體健康之外，便再也沒有開口多說什麼而告辭了。

黨內鬥爭的經驗和規律，歷來就是當條件不成熟時，便搞妥協相互搞“團結”，而一旦一方力量壯大，權力在握，有把握解決對方時，便會毫不留情的拿人“開刀”。從黨的歷史看來，從陳獨秀、王明、張國濤等早期黨的領導人到建國後的劉少奇、林彪，所謂的“四人幫”以及將在“十二大”上解決的華國鋒，歷來均是如此。所以，當胡總書記向有關人物匯報了在葉處碰一個軟釘子後。經過商量，認爲原來計劃的在“十二大”上能一舉打除黨內反對派的估計是過於樂觀而不現實。但現已有絕對的把握把“凡是派”的總頭頭華國鋒趕出政治舞台。這已是一個很大的勝利，而對於像葉劍英這類人則暫時還不能操之過急。只有做暫時的妥協、搞“團結”等時機。否則，不但會得不到預期的效果，而且還會弄巧成拙，得不償失。

最後，胡總書記再次肩負重任前往葉劍英的住處并與之“言歸和好和達成協議”——葉不再堅持提早南下過冬，保證出來參加“十二大”。做爲交換，他得到的允諾是不再逼他進入顧問委員會。

## 三 繼續維護幹部終身制

因早已做好了幕後的私下交易，所以葉劍英不僅在“十二大”上不加入顧問委員會；而且還在大會上公開做挑戰性的宣稱：“我今年八十五歲了，年老多病，在中央沒有決定我退出之前，當盡力而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以葉劍英為榜樣，那些最符合進入顧問委員會的人選如陳雲、李先念當然也樂得以葉做爲擋箭牌，而不願進入顧問委員會了。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中曾明文規定中央委員會和地方各級委員的任期爲五年；以及連選任的期限不得超過三屆。但是，在“十二大”上新通過的新黨章中則再也找不到有關限制連任的期限的規定。這也就使得十一屆五中全會時明確宣佈一定要廢除幹部終身制成了一句騙人的空話。

另外，在“十二大”上通過的新黨章明確規定“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選舉，或是任命的，他們的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廢除。年齡和健康狀況不適宜於繼續擔任工作的幹部，應當按照國家的規定，或者離職休養，或者退休。”（註2），那麼，葉劍英本人不得不承認自己已是八五高齡，年老多病了，黨中

央爲什麼”還不諱他“退休”？難道少了葉劍英，地球真的會不轉嗎？上樑不正下樑歪，葉劍英可以賴在那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他幾百萬張劍英、李劍英們爲什麼定要掛冠而去呢？

由於原先設想的葉劍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四人應一起進入顧問委員會的計劃沒能實現，黨的最高核心領導班子—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六名成員的平均年齡高達爲七十五歲，這比起上屆（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初次成立的平均年齡六十八歲，也要高出七歲之多。所以，這種現象，能夠說明“十二大”是自四五年“七大”以來的具有歷史性的偉大轉變的會議嗎？此屆政治局常委會的平均年齡是中共有史以來最高的。那麼天天大肆宣傳的要使幹部隊伍年輕化，徹底廢除幹部終身制和讓年富力強的人來擔當接班人的這項“重要的、迫切的戰略任務”（註3），又體現在哪裡？人們聽到的是要堅決貫徹執行上述重要的和迫切的戰略任務的誓言，但實際上看到的却是黨的最高領導機構的成員的年齡不僅沒有年輕化，反而增加年齡造成越來越老化。這能說明“十二大”的組織路線是成功的嗎？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尚且帶頭如此，那下面各省市領導機構和基層單位的幹部制度的改革和接班人的提拔挑選；以及老幹部的自動讓賢讓位又如何進行？遠的不談，先看看在權力使用上僅次於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中央政治局，由於葉、陳、李的不退，就使得一大群年過七十的老人如彭真、徐向前、聶榮臻、楊尚昆、鄧穎超、王震等老人“理所當然”地繼續留在政治局內“鞠躬盡瘁”。這種由年高體弱，思想日益僵化的老人們組織成的最高階層，對我們的國家、人民以及對共產黨本身說來，都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歷史已經表明，在任何一个國家裡，凡是是由“老人治國”或“老人治黨”其最後結果總是要造成政治上的不民主，不穩定甚至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大倒退。

#### 四「因人因事而異」，還是權力、再分配？

最後，值得提一提的是，有着黨內“權威理論家”之稱的胡喬木（也是一位七十多歲的“年富力強”者）出面作了解釋：我們黨必須要有一批經驗豐富，見深識廣，有威信的老同志在中央掌權“因此，在這次黨章修改過程中，最後還是決定不對領導人的任期作嚴格的限制，對各人的工作任期因人因事而異”（註5）。

胡喬木的這番議論，實在荒唐得很。

試問當今賴在最高領導崗位上的那一批老人，他們的經驗有當年的毛澤東豐富嗎？他們比毛澤東更見深識廣嗎？他們比毛澤東更善於應付各種複雜局勢嗎？他們在黨和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信能比毛澤東當年還要高嗎？更何況這批人，具體地說來如葉劍英，他如今在全國老百姓的心目中，還有何崇高威信之談？至於

胡喬木最後所講的“因人因事而異”，這才是關鍵所在。共產黨做事歷來如此。例如，“九大”時林彪被毛澤東選定爲接班人，便明文規定并寫進黨章和憲法裡。“十大”時由於出了一個王洪文，黨章裡便硬塞進一段關於“反潮流”和“五不怕”的豪言。“十一大”時也是因人因事之故，對華國鋒和文革大加贊揚和加以肯定。而到了“十二大”時，則不僅將華國鋒掃下台，因人因事地撤消黨的主席職位，設總書記一職，而且還因人設事地繼續維持封建的終身制。人們也許不禁要問：共產黨不是自謂因“十年浩劫”，痛定思痛，要恢復黨內民主，廢除幹部終身制，怎麼又出爾反爾，大談“因人因事而異”了呢？如果一個黨，特別是執政黨的黨章黨規可以隨時“因人因事”而不斷變動，如果這個黨從來很少兌現自己的諾言、許願，如果這個黨的“權威理論家”的看家本事竟是應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而不斷炮制前後相左，不合邏輯的“理論”或解釋的話，這個黨會有前途嗎？這個黨的廣大黨員將何以遵從呢？這個黨還配要求人民對它報有“信心”嗎？

什麼是“因人因事而異”？說穿了不過是因爲黨內鬥爭和權力再分配擺不平而不得不向那些尚有實力的老頑固們作出讓步而已。中共“十二大”的組織路線的一大難題是廢除幹部終身制和起用所謂“年輕”有知識和政治立場堅定的幹部來取代那些黨內的保守的老朽們。但是，這道難題的答案却是“無解”。

兩千年前的諸葛武侯的確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克己奉公，不謀私利；清風兩袖，粗茶淡飯；他廢寢忘食，日理萬機；他家教甚嚴，處處表率；他先身士卒，直至病死軍中。所有這些，甚至他的敵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而以“諸葛武侯”自命的中國當代“賢相”們是否也真的做到了上述幾點了呢？至少在小說『三國演義』中，諸葛武侯是料事如神的。但他却没有算計到在兩千年之後的今天，那些老朽們會把他的名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作權力鬥爭的遮羞布。不然的話，聰明的諸葛武侯是斷然不肯說出這八個字來的。

寫于一九八二年九月  
北京

註1：此話引自於一九七九年葉劍英在國慶三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

註2：此引自於“十二大”上通過的新黨章第三十七條。

註3：此引自於鄧小平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人民日報』社論。

註4：此引自於鄧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註5：此引自於胡喬木在“十二大”結束時舉行的記者會上的講話。



# 他為什麼要申請政治避難

(報告文學)

——木木 (加拿大)

(編者按)

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鳴放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大大陸接管政權後，第一次人民群眾要求「自由」、「民主」的運動。然而，這場運動被共產黨以「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為名徹底鎮壓下去了。「反右鬥爭」不知殘害了多少有良知、有見識的知識份子，逼得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釀成了無可挽回的惡果。

一九七七年，在人民強烈要求及壓力下，鄧小平等宣佈為錯劃了的「右派」平反。結果，經查證屬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都屬於錯劃之列而應得到改正。可是，身為當年黨中央整風反右辦公室主要負責人的鄧小平，却一口咬定『反右』鬥爭大方向是正確的，只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而已。該結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試問，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都屬於冤案，批判這些人的運動還能說是正確的嗎？

或許，還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仍為鄧小平辯解。他們會說：『至少給這些人平反是真心實意的吧！』那好，我們就讓事實講話吧。

『他為什麼尋求政治避難』這篇文章，用鐵的事實回答了上述問題。中共派往加拿大的公費訪問學者許某，五七年讀大學時被錯打成「右派」，六二年做為悔過良好的「樣版」而摘帽。一九七九年，又被宣佈為「錯劃」而「徹底」平反。一九七九年被中共當做體現政策的「樣版」以訪問學者身份派往加拿大進修學習。後來，由於許在進修期間表現比較突出，

加方主動提供獎學金，並由加方政府出面交涉，使中國大使館和教育部不得不批准而轉為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然而，許某在國外受到「意外」的厚遇，使國內一些高層決策者十分眼紅和惱火。在高階層領導授意下，由教育部導演而駐加大使館出馬，無任何理由地強迫許先生停止研究生學習，中途返國。最後，策劃者們在陰謀即將得逞而得意忘形之時，不慎暴露了調回許先生的理由：許先生是一個有嚴重問題的「右派份子」，無資格攻讀博士學位。許在出國時所抱的「自此永遠清白」的幻想破滅了，共產黨「徹底平反」、「不究既往」的許諾被粉碎了。一個被共產黨整了十多年，連個樹葉都害怕砸着頭的人，終於畏懼回國再頂上「右派」帽子而永世不得翻身，被迫要求留在他國做「三等公民」。

昨天，共產黨為了自身利益，可以無辜把你打成「右派」、「階級敵人」；今天，又可以因維護自身利益而為你「平反」，做為樣版派出國外；明天，他又可以為維護自身利益而翻起老帳，出爾反爾，重新把你打入地獄。共產黨把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當作隨心所欲的「政治」玩偶，這樣的現象難道我們見到的還少嗎？

鄧小平口口聲聲說「反右」大方向是正確的。許先生的遭遇告訴我們，這種大方向正確論所包藏的禍心是多麼可怕！新的黨官僚們一再吹噓他們為「右派」、「徹底平反」是如何如何偉大。許先生的遭遇，給了這種「徹底平反」以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一間小小的單人房裏，除了床、桌子和椅子等原來就屬於這屋子裏的大件東西外，就看不見任何日常個人用的物品了。靠門邊的地方，兩個大的旅行箱裝得滿滿的，緊靠在一起。房間的主人，又重新把室內的各個地方仔細地檢查了一遍，以防還有什麼東西遺留下來。從這些迹象看來，他是將要離開這裏了。最後，當他用一種無限傷感而又依依不捨的眼光凝視着這會伴隨着他生活了數百個日日夜夜的小房間時，一串串痛苦的熱淚，再也控制不住地從他憂傷迷茫的眼裏流淌了下來。

此時此刻，要說這世界上還有最痛苦、最不幸和最悲傷的人的話，那就一定是他了。因為從明天開始，不！更確切的說，幾分鐘以後，他就將要變成另外一種人，將要開始另外的一種生活。但自己將要變成一種什麼樣的人和將要過着一種什麼樣的生活，他心中一點也不知道。對於自己的未來，他想都不敢想。他現在唯一所能想到的，就是認為這個世界是如此地不公平和自己的命運太不好……

從外面傳進來的一聲汽車喇叭聲，把滿面淚痕的房主人從傷感的回思狀態中驚醒了過來。這喇叭聲提醒他不能再在這小屋裏耽擱下去了，他必須立即離開這裏，而且越快越安全。

終於，他下了決心，快步走到了門邊提起了兩個大旅行箱來。正當他打開房門準備走出去時，一陣急促的電話鈴響了起來。

聽到電話鈴聲，房主人又猶豫了。他還是重新又返回屋內放下手中的旅行箱，然後走到電話旁。

急促的電話鈴聲響個不停，但他就是不敢伸手去接。就這樣，連續僵持了好一會兒，直到從外面又傳進來一陣短而急促的喇叭聲，房主人才定下決心來不接電話，而又來到門邊重新提起了旅行箱。當他用無限依戀的目光最後掃視了一遍房間後，才走了出去。

房門外的街邊，停着一輛「升火待發」的汽車。當房主人剛跨進車裏還沒坐穩，早已坐在方向盤後等他的人就立即啟動了車子。不一會兒，這輛汽車就在茫茫的夜色中高速駛出了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市區向郊外的公路奔去……

只十分鐘以後，另一輛汽車向着剛離開不久的房主人的住處急駛而來。車在街邊停住後，跳下兩個人來，立即直向所要找的「目標」奔去。

來到所要找的人的房門前，這兩人馬上

就用手使勁地敲着門。敲了半天，裏邊竟沒有一點回音。這兩人心知不妙，在相互對看了一眼之後，便立即開始想辦法弄開房門。

門，終於被撬開了。當這兩人闖進去一看，房間裏竟空空如也。見狀之下，兩人大吃一驚地楞住了。事情很明顯地擺在這兩人的面前，他們所要找的房主人，已早於他們到達這裏之前先行離開了。難怪，二十分鐘前他們打電話來這裏時竟一直沒有人接聽。當這兩人從震驚中清醒過來後，兩人商量了一下，也不管這是什麼地方，就拿起了房間裏的電話撥了通向渥太華的號碼。電話通後，打電話的人在震驚和慌亂中用結結巴巴的聲音說道：「他……他……他失蹤了……。」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近郊聖安多街，（註：即 St. Andrew）有一幢五層樓的灰白色建築物，據說過去是一座修女院。現在，却被中國政府買了下來做了中國駐加的大使館。

這天晚上，由於是使館過了下班時間，所以從外向裏望去，整個五層大樓黑燈瞎火顯得冷冷清清的。然而，人們想不到的是，就在這幢大樓的四樓會議室裏，却正在召開着使館的黨委緊急會議。

黨委緊急會議由劉民臨時代辦主持（因王棟大使此時正返回國內去檢查身體。）參加會議的人有負責文化教育方面的胡參贊（據說是最有希望將來替代王棟大使的人。）負責管理留學生方面事務的留學生管理處的程處長等。

隨帶值得一提的是四樓的這間會議室。這間會議室，長約五公尺，寬約三公尺，只放置了一舖着潔白桌布的長會議桌以及週圍環繞着的兩排椅子。前排的椅子是屬於大使館黨委成員或參贊一級的人員坐的；而後排的椅子則是屬於負責擔任記錄的機要秘書或有時列席某些會議時的低一級官員們坐的。這間小會議室沒有窗戶通風或透光線，空調設備也沒有。不僅如此，還特地在牆壁上和門上加上了一道金屬屏壁防竊聽設備。所以儘管裏面燈火通明，但從外邊是看不出一點燈光或動靜的。正是由於這間小屋的特殊安全性和保密性，因此便成了大使館的機要或秘密會議室。

在正常的狀況下，由於房間是處於一種緊密封閉的狀態下，進入裏面開會的人都在十五分鐘左右從裏面出來到外面放放風透透氣。可今天，由於情況特殊、緊急和重大，所以二十

分鐘後還沒有見一個人出來換換氣。

會議室內，焦躁不安的會議出席者們猛吸着香煙，苦思苦索商討對策。整個室內烟霧騰騰空氣十分渾濁難聞。這個會可真難開呀！人人都怕承擔責任，個個都顯得焦頭爛額和束手無策。

終於，經過近兩個小時馬拉松式的會議後，大使館黨委做出了五項決議：

(一)立即向加拿大政府發出照會，請求加方按照兩國政府間的有關協定，幫助中方尋找剛剛失蹤的那人；

(二)馬上通知在蒙特利爾市的負責管理留學生的小組長，要不惜一切代價的去想方設法找到此人；

(三)大使館立即派出專人到蒙特利爾市去協助管理留學生的各分組的大組長進行此項工作；

(四)立即發急電向國內報告此事；

(五)對此事嚴加保密，盡量不讓更多的人知道，以免影響所有在此的中國留學生的情緒。

第二天的下午，在遠隔千山萬水的中國，教育部在西單大木倉胡同教育部的主樓三樓會議室裏，也同樣爲此事召開了緊急會議。

教育部的緊急會議，由一個身材中等，不胖也不瘦的人主持，這人就是教育部副部長、負責管留學生工作的黃辛白。他宣佈會議開始後，一個身高約一米六五，體形矮胖的人從長會議桌邊的椅子裏站了起來首先發言，這人就是教育部留管司美加組組長林興朗。

林興朗拿著手中的一份材料，詳細地向出席會議者們講了今天早上國內接到了駐加大使館的一份緊急電報。電報稱一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進行數學方面研究工作的中國訪問學者，在其研究訪問的期限兩年滿後不願歸來而在加叛國。

聽了林興朗的匯報，所有坐在舒舒服服深栗色皮包面軟坐椅裏的人們，都被這消息驚住了，就連個別象往常那樣一開會就閉目養神打瞌睡的人，此時也驚得睜開雙目來靜聽下文的發展了。

整個會場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好半天，竟沒有一個人發言說話。終於，一直神色嚴肅面部鐵青的黃辛白副部長開口說話打破了這死一樣僵場的氣氛。只見他緊繃着嚴峻的臉一字一句的說道：「調這人的檔案來。」

被調來查根尋底的檔案很快地就送到黃辛白副部長的面前。厚厚的一疊個人檔案材料的第一頁上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地寫着：許××

男；四十五歲；北京輕工業學院數學教師……黃辛白繼續看了下去。突然間，他的眼光在檔案材料的第二頁上面停住了。原來，在這一頁上明明白白地記載着許××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大學數學系三年級讀書的時候，曾配合着黨內外的階級敵人一起瘋狂的發洩對黨的不滿，發表了大量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人民的反動言論，因而在後來的反右鬥爭中被劃爲右派分子並戴上帽子。

黃辛白又翻過一頁來看，上面寫着兩個對此問題的結論。一個是一九七九年陝西輕工業學院的結論，大意是該同志曾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講過一些錯話。但這些講錯的話都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此被錯劃成右派分子，現將向其本人和所在單位宣佈當時屬於錯劃範圍而給予糾正。另一個則是許××臨出國赴加的一九八〇年北京輕工業學院和北京大學兩家院校的聯合結論。這一次的內容與第一個結論比起來則顯得大學進步好得多了，其大意爲該同志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完全被錯誤地劃爲右派分子，因而現特向本人和所在的單位宣佈爲他徹底地平反和賠禮道歉，並允許其人根據專業所長調回北京原單位恢復原數學教師的職務。這一次，在第一個結論中留下來的屬於將來搞政治運動時的禍害尾巴，如像「該同志曾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講過一些錯話，但這些講錯的話都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等等，則統統都被刪掉不見了。

根據最後的一個結論，證實了許××五七年反右鬥爭時不僅沒有說過任何錯話，而且完全是被無辜地遭受政治陷害而錯劃成右派分子的。所以，他的那段歷史是清白無罪的，政治上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身爲教育部的副部長却不這樣認爲。他像許多掌握權力的政治官僚一樣，始終認爲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是絕對正確和必需的，而儘管擺在人們面前的事實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右派分子現經反復調查證明都是屬於當時錯劃而現應給予糾正和平反的。因此，對於右派分子平反的問題，他就理所當然地按照歷來的政治規律和教條認爲這只是現在黨內鬥爭的需要才不得不這麼做；以及爲了搞四化而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的一種體現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那麼，說穿了，現在雖然也給這些人賠禮道歉和徹底平反，但那只是一種鬥爭的需要和策略，而並不能說明這些人完全沒有講錯話，犯過錯誤或政治上完全可靠而沒有任何問題。關於這個觀點的絕對正確性，鄧小平和黨中央仍然毫不猶豫地認爲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是必需的和大方

向是正確的就是最好的證明。

正因為黃辛白對五七年的反右鬥爭和知識分子存有錯誤的看法，所以當他閱完面前檔案材料的第三頁後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從檔案材料上收起眼光，然後對坐在會議桌邊正望着他靜聽他講話的人們生氣地說道：「這是怎麼搞的？這個人過去在政治上犯過錯誤嘛！而且像這種政治上不太可靠的人，當初根本就不該讓他出國嘛！應該好好地查一查，這人是誰批准，又是怎樣在政審上蒙混過關溜出國的？」話完後，他端起桌上的一杯散發着清香的熱茶猛押了一口，然後又從桌上的香煙盒裏掏出了一支中華牌過濾嘴高級香煙來點燃了。

聽了副部長的問話，林興朗忙翻開面前桌上的一本厚厚的記事簿查找了一番後回答道：「這個人過去在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犯過錯誤（天哪！原來他也這樣想和講！），這事在他出國前我們是知道的。不過，不過批准他出國的是陝西省委和輕工業部。當初為這事陝西省委和輕工業部黨委還專門開過會研究討論過，後將他做為「樣版」派出的。

就這樣，林興朗現而易舉地把批准許××出國的責任推到了陝西省委和輕工業部的黨委身上。並且，他繼續要想說的話是正因為覺得這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才打破常規特意召他在留學期未滿時立即返國。但是，他的話就被黃辛白深吸了一口青煙後一邊吐雲駕霧一邊更為生氣不滿地用手敲着桌子說道：「既然已知道這個人政治上有問題不可靠，那為什麼不加強對他的思想教育和對他嚴加管理？」

看到黃副部長仍在生氣和追究責任，林興朗誠惶誠恐地從座位中站了起來檢討道：「是的，這個工作我們沒有做好。作為具體負責管理這方面工作的我，首先應該多多檢討……」綠豆般大的汗粒從他的額頭上沁浸了出來，他心裏不服地想到：像這樣重要的事情，我這個管具體工作的人，做得了主嗎？

被有關部門和人員稱為在外學習的期限滿後而留加不歸的許先生（讓我們這樣稱呼他吧），是不是出於被西方社會花花綠綠的物質生活所吸引，或是出於政治原因而滯加「叛國」呢？真正的答案是：非也！那麼，他又為什麼在得到大使館的命令要他返國後而故意違抗拒絕不受令呢？要想知道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和真實情況，這一——就不得不從一九七九年說起了。

一九七九年的十月中旬，許先生以作為中國政府第一批派往加拿大的研究訪問學者的身

份來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市。經過短暫的適應和辦理好了一切應辦的手續後，他於一九八〇年一月正式進入蒙特利爾大學，以訪問研究學者的身份進修數學兩年。

許先生個頭長得並不高，身材也很單薄瘦小。他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使人一見他就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知識分子。當他在國內的時候，除了拼命地鑽研學習業務知識之外，就沒有其他別的愛好了。對於政治上的事情和歷次政治運動，他從來就不懂也絲毫不感興趣。他是非常膽小怕事的人，用他自己和別人形容他的話來說，就是：「走路都怕樹葉掉在頭上打破頭的人。」那麼，人們也許不禁要問：像這樣一個膽小怕事，一心一意只專業務而一點不過問政治的人，怎麼會在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反黨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呢？這個問題後面將專門提到；更何況在五七年的那場所謂的反右鬥爭中，遭到與許先生相類似的橫遭迫害和打擊的人，是成千上萬計的正直的知識分子、人民群眾、黨外耿直不阿的民主人士以及共產黨內部的許多精英分子。

話說回來，正是因為許先生唯一的愛好就是一心一意地鑽研業務而不過問他事，這種良好的習慣即使是在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後和後來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沒中斷過，所以他才能在「人過中年萬事休」的年齡考上了出國研究進修的資格。他深知這種寶貴的學習機會難得，因此格外地珍惜和發奮努力，以為學得更多的東西後返國為「四個現代化」能做出貢獻。還有，來加拿大後沒有國內的那種如像外行領導內行、無休無止的政治學習等壓力，使他身心為之一鬆完全置身於一個搞業務的環境裏，故而把整個心思和精力完全放在了業務學習裏。因此，他在數學領域裏鑽研進修的成績也與日俱進，很得他的指導教授的贊揚和賞識。

一年以後，許先生的指導教授看出了他將來在數學領域方面的發展前途，故而主動向他提出來要他改變訪問學者的課程，而建議他直接攻讀博士學位。指導教授說他完全有這個能力和把握拿下博士學位，並且指導教授還特地言明攻讀博士學位的所有經費，完全由他從研究的經費中專門撥出來提供。

對於這樣一個別人求之不得的大好機會，許先生是沒有任何權力來回答決定是否接受。因為一生的經驗教訓已早使他形成一種固定法則——那就是永遠要聽黨的話和一生交給黨安排。所以他不敢立即向指導教授做任何表示。

許先生本着正常的途徑，把指導教授的建議馬上向在同一個政治學習組負責的小組長做了匯報。這個小組長聽後又馬上把此事向總負責蒙特利爾留學生工作的大組長做了匯報。這個大組長隨之又立即向大使館做了匯報。為這事大使館留學生事務管理處的程處長專門從渥太華來到蒙特利爾市了解處理此事。

程處長這個人身高過了一米七。雖然他也像大多數的在使館工作的幹部那樣面容嚴肅，但一當他開口用他那湖南口音說話時，立即就給人一種誠懇和親切和藹的感覺。也許是他在開始外交官生涯之前曾任湖南師範學院外文系主任的原因之故吧？他這個人待人接物沒有架子和做事講究過細重調查研究，所以較得我們留學生的好感和信任。像這一次，當他來到蒙特利爾直接找到許先生本人了解到全部情況後，他當即表示這是一個難得的大好機會故給予極力支持。並且，當他返回渥太華向大使館黨委做了匯報並取得同意後，立即就此事專門寫了一個報告送回給國內的教育部。因所有出國的人，不論是攻讀學位的研究生或還是兩年期限的訪問學者，其檔案材料和具體管理領導的權力都屬教育部。因而許先生要想從一個訪問學者的身份轉為攻讀學位的研究生，就必須經過教育部的審查。而且最後批不批准，這個權限也是屬教育部的。

教育部對此報告的回覆很快就批下來了，其意見為：批准同意。教育部這次辦事這樣乾淨利落回覆很快，主要是基於下面兩個原因：

一、由於許先生的指導教授在魁北克省教育界有很高的威信和很大的影響，所以他特地在魁北克省教育代表團訪華時，拜託他們特為此事向中國政府提出和商量。

二、魁北克省政府因在鬧獨立問題，所以極願意避開加拿大聯邦政府而與中國單獨建立起文化交流關係。因此後來在教育部，中方和魁北克省教育代表團雙方就許先生正式改換課程題目而攻讀博士學位的事正式達成協議，把許先生列入為魁北克省政府正式撥款支持攻讀學位的財經受授人的範圍之內。

當中方和魁北克省政府雙方簽字同意後，便由中國駐加大使館的官員出面親自告訴許先生，說中方與魁省政府簽有協議同意批准並支持此事；大使館的官員並且還要許先生安心讀書拿下學位來為黨為國爭光。從這時開始，許先生正式進入了攻讀 P H . D . 的課程。

當許先生進入了攻讀博士學位的課程四個月之後，他來加原來未變身份和課程的兩年期

限也快來臨了。當然，由於他現在已在正式攻讀博士學位，所以理所當然地不受此期限的限制而繼續安心讀書。而與許先生同來的那一批訪問學者們，則紛紛收拾行裝準備回國。

這天，許先生正在學校中安心苦讀。突然間他接到一個通知，要他立即放下學習趕到渥太華的大使館去。當天下午，許先生就乘長途公共汽車趕到了渥太華的大使館裏。他一路上心裏忐忑不安，不知發生了什麼大事和大使館為何原因要緊急召見他？

許先生來到大使館後，由留管處的程處長出面接見了他。一見面，程處長就告訴許先生說，根據上面（指領導）的按排和決定，要許先生立即收拾行裝跟與他同來的那一批訪問學者一起返回國內去。

這突如其來的巨變消息有如晴天霹靂一般，頓時把許先生這個老老實實搞業務的人給震驚得目瞪口呆。但他也跟國內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多少年來的殘酷鬥爭和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運動，早已把他改變成爲一個規規矩矩地服從命運，以及對任何打擊都只能逆來順受的人了。像處在這種悲慘、軟弱無力和令人同情嘆息狀況之中的知識分子，在中國你能說很少嗎？你能責備他們這就是知識分子軟弱的一面嗎？你能苛求他們太膽小怕事嗎？他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被過去無數慘痛的教訓害得失掉了他們應有的個性和鬥志。

正因為許先生早已是變爲一個與事無爭和逆來順受的善良的知識分子，所以他對眼前這突如其來的巨大打擊，一時間也不知怎麼辦才好，也只有像過去通常所做的那樣，一個勁地點頭表示服從和遵守領導的這一按排和決定。隨後，他又懷着一顆不知所措和淒涼痛苦的心離開了大使館乘車返回了蒙特利爾。

當許先生回到了蒙特利爾市的當晚，他突然想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雖然自己堅決服從遵守上級的按排決定，但自己畢竟不是在國內事事由領導說了算；而自己現在是在加拿大，這件事總得向辛苦而又熱情幫助自己的指導教授們做個交待啊！但自己以什麼樣的理由來向指導教授們講明自己爲什麼要突然中斷學習而返回中國去呢？他一夜未睡苦苦想想，但他想不出任何理由，因他確實也不知道啊！因此，他決定再去渥太華大使館問明原因，以此好對指導教授們有個理由來交待。

許先生第二次來到大使館，仍然是程處長出面接待。許先生老老實實地對他說：「程處長，我是堅決服從遵守領導的按排決定，一定



同期滿的同志們一起返回祖國去。但是，這件事我該怎麼向我的指導教授們交待？用什麼樣的理由來說明我為什麼要中斷學習提前回國去呢？」

聽了許先生這合情合理的問話，程處長似乎也有難言之苦。後來，他想了好一會兒，才回答許先生道：「要你立即返回國內去工作的原因，是因為國內你所在的工作單位教學工作上的需要，要你馬上返回國去擔任新的教學任務。」

許先生聽後又問道：「我回去後，那幾萬塊錢的獎學金又怎麼辦呢？」

這一次，程處長聽了以後一點不加以思索就毫不猶豫地回答道：「這個問題嘛，組織上早已考慮過了，你回去後，再派另外一個人出來頂替你。」

程處長的話可真謂有點絕妙和荒唐。假如此事發生在國內，那到十分好辦。通常也就是由所謂的組織出面做出一項按排或決定，那麼任何人都只能規規矩矩的服從而不能有半點的怨言。可偏偏這事又發生在加拿大，又偏偏不能由那個在大陸掌握了人的一切的領導說了算。在這裏的大專院校等學術科研機構，是由真正懂業務的內行領導着和說了算，更何況任何政黨或政治組織沒有權力來干涉和影響科研和教學的。所以，提出以國內另外重新派出一人，來頂替換掉雙方政府經過簽字協定確認的許先生，這不僅很難被這裏的人接受；同時還會自損信譽。令人覺得此法粗暴和可笑。值得指出的是程處長的話並不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着那個知識少得可憐——那個高高在上做出決定的黨官僚組織。

話說回來，當許先生離開大使館返回到蒙特利爾後，他越想越不對頭，越想越感到奇怪。因為他剛剛才收到自己單位寫來的信，信中並沒有提起要他立即返國，因學院需要他回去擔任新的教學任務呀？所以，爲了搞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老老實實的許先生竟就此專門寫了一封信給自己國內所在的工作單位。

在等待單位回信的期間，許先生同時也積極地做好返回祖國的準備。比如：他訂購了一架出國學者返國時海關可免稅放行的彩色電視機，並把所應付給的款交給了大使館。而他唯一沒有做的，就是爲了不損害祖國的名譽和自己難於向指導教授們開口講個明白，所以此事仍對指導教授們保密沒有談出來。

不久，許先生就接到了國內單位領導給他的回信。信上說：單位裏並不知道要他馬上返回國內去的事情，因上至單位領導，下至一般

群衆，都知道他已經取得了加方和國內教育部的同意改成了攻讀學位的研究生身份，因而也就將繼續留加唸博士學位。最使許先生吃驚和不解的，是本單位領導在信上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單位裏並不立即需要他返回國內去擔任什麼新的教學任務；同時也沒有其他任何理由要他現在就非趕回去不可。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大使館的領導說要自己立即返回去的理由是自己單位裏提出來的要求；可是現在單位裏的領導來信却完全證明了根本沒有這回事情。所以，許先生完全被弄得暈頭轉向了。

當然，也許換了一個人，早就頭腦清醒地看出來了這明明是有人在搞鬼。可這事又偏偏發生在具有典型書生氣息的許先生身上。因此，這個只知專業的「書呆子」竟又「傻裏傻氣」地做出新決定：再去大使館問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

許先生第三次來到了渥太華的大使館裏。這一次，他向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提出要求，想與更高一級的大使官負責人見面談一談自己所面臨的具體問題。

這次大使館出面接見許先生的人，是一個身材瘦高（約一米七五），眉毛濃而重，眼睛又圓又大，身穿一套黑色呢料縫製的毛式服裝的人。這個人就是大使館的黨委委員之一；以及也是前面提到過的在大使館裏任職負責文化教育方面事務的胡參贊。

胡參贊這個人講一口流利的帶有北京口音的普通話。他爲人非常機敏，辦起事來也相當麻利精幹，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這個人政治覺悟非常高和無產階級的黨性也非常強。開口閉口都是像要以黨的利益爲重啦、要以服從組織上的按排決定爲個人的第一需要啦、要認真地讀一下馬列毛的書，提高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覺悟啦等諸如此類的「大道理」。正因爲他這個人開口馬列主義、閉口毛澤東思想，所以在我們多數留學生的印象裏面，他是最不受歡迎和最令人討厭的一個人。但在另外一方面，他的這一套黨式作法，却能頗得比他更高一級的某些領導人的欣賞。難怪，在很早以前就有傳聞稱：如王棟大使調職，其大使職位的空缺，則將由他來出面替代。

話說胡參贊本人講起話來頭頭是道對別人馬列主義，可他對自己却是自由或享樂主義，因從來也沒有人看到過他本人在認真讀馬列毛的書去提高他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覺悟。人們從看到的或聽到的，只知道他是一個牌癮極大的「撲克迷」。比如像這次，許先生就是在牌桌的戰場上才找到他的。

凡是到過渥太華大使館並在那兒住過或稍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大使館五層大樓的一樓（即底層。），設有一個專門供使館工作人員休息玩耍的娛樂室。在那裏邊設有乒乓球桌、克朗棋、象棋和撲克牌桌等娛樂設備。而當許先生找到這裏來時，看見胡參贊本人正在一張牌桌上戰得興起。此時的胡參贊，完全不同於平日。只見他脫去鞋子一條腿高高地擱在所坐的椅子上。他這個人的烟癮也很大，抽起烟來一根接一根的。此時，他嘴上叼着一支冉冉冒着青烟的過濾嘴香烟，一隻手忙着抓牌，另一隻手則不停地在搔擾着擱在椅面上那患有「香港腳」的腳丫子。真正謂手忙腳不停也。他那體態豐滿的夫人，也依傍站立在他的身後，給他出謀劃策當軍師甚至不時還向旁人瞄幾眼偷看別人的牌。所以許先生此時找到這裏可謂來的真不是時候。

一見許先生的到來，胡參贊點了一下頭算是打過了招呼。然後他一面摸牌一面說道：「老許呀，你來了。坐下，坐下。來甩兩把！來甩兩把！」

許先生小心翼翼地在一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然後他等到一盤牌局戰完的機會，才告訴胡參贊說他有事情想找他單獨匯報一下。

因這時早已下班是屬個人晚上的休息時間，所以剛開始聽許先生講話的時候，胡參贊還哼呀哈呀地敷衍應付着。可後來當他聽許先生說有事要單獨地向自己匯報時，他很不情願地把手中的牌遞交給立在身後的自己老婆說道：「來來來，你來幫我接兩把。」然後他才穿上鞋子立起身來，帶着許先生來到了一樓的一間會客室。

看到胡參贊滿臉的不高興，所以嚇得許先生一進會客室就趕緊說明自己並不是存心在這個時間來影響領導同志的休息，而自己這個時候來，是因下午沒課和為了自己當晚或明早又可不就誤學習而能趕回學校去。

當胡參贊在會客室裏的沙發上坐定並重新點上一支烟後，這時的他，又變成了平時滿嘴馬列主義唱高調的他了。所以，當他聽完許先生的匯報後，即清了清喉嚨然後板起臉正正經經地說道：「唉！老許呀，你這個人怎麼搞的？安排你隨其他的同志一塊兒返回祖國去，是你們單位裏需要你回去擔任新的教學任務。這也是領導上做出的決定囉！看來，你還得好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方面的學習，跟上形勢，提高一下你的馬列主義水平喇！」

看到許先生沒有話說，胡參贊深吸了一口香烟，又十分得意地繼續說道：「老許呀！我們要以黨的利益為重，要時時刻刻聽黨的話囉

！再說，回去也一樣地工作，一樣地為四個現代化出力囉。」

許先生最後又提出了怎麼向自己的指導教授們交待講明這件事的問題。胡參贊聽後用顯得有點不耐煩的聲音說道：「老許啊！這個問題嘛，首先就要看自己是不是以黨的利益為重？以國家的利益為重？是不是服從組織上的安排決定囉？如果能夠拋棄個人的私心雜念，那就絕對沒有什麼問題的！至於向指導教授們講的問題，那很好辦嘛！我們多多地向他們解釋一下，不就做好了這個工作了嗎？」

就這樣，許先生在接受了一大通所謂的馬列主義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後，帶着一個似是而非和不得要領的回答離開渥太華返回了蒙特利爾。

隨着返國時間一天天的臨近，許先生再也不能對指導教授保密不講此事了。所以，他按照大使館的上級領導所教的話，告訴指導教授說他將要中止攻讀博士學位的課程，並將按原來訪問學者兩年的期限於最近返回中國去。

許先生的指導教授聞言後立刻表示深為震驚。他問許先生為什麼要停止學習和非要現在返回中國去？許先生只好平生第一次撒謊紅着臉說是國內自己的工作單位需要自己趕回去擔任新的教學任務。指導教授表示不能理解和很難相信。他覺得這樣半途而廢的作法實在沒有道理和太可惜，因此指導教授在沒有事先告訴許先生的情況下，私下以自己個人的名義出面給中國大使館寫信和聯系辦交涉。指導教授提出的意見認為許先生在學習上很是用功，將來在數學研究的領域中很有培養和發展的前途。指導教授還指出許先生完全有把握在一年半之內拿下 P H . D . 的學位，而這樣半途而廢將前功盡棄實在太可惜，所以特別向中國大使館提出建議要求挽留住許先生繼續在加完成博士學位的課程。

許先生在一邊繼續學習一邊收拾行裝做回國準備的同時，又收到了國內在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們的數封來信。大家對他很關心，問他聽說他將要馬上回國，故表示懷疑這消息是否是真的？如果是，那理由又是為什麼呢？因在國內工作單位裏幾乎人人都知道他早已改換身份和課程，而正式進入了攻讀博士學位的緊張學習階段。又其中一位熱心的同事在信中更是關切地問許先生，是不是他在國外犯了什麼政治上或生活上的錯誤，因而為此才被召回國的？

同事們的來信，又使許先生陷入了極大的痛苦和不安之中。他不得不思考和面臨着另外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對外國人可撒謊欺騙說是

單位需要而奉令回去；可如果自己回去後，又怎樣向單位、同事、朋友等國內的人交待啊？

當天晚上，許先生上床後被這個困擾人心的問題弄得失眠久久不能入睡。他在床上翻來復去。他一閉上眼睛，就仿佛看到他現已回到了國內，而不管單位裏的同事或社會上他所認識的人都不理睬他。而且這些人均用過去在左右鬥爭中或在文化大革命裏的那種對待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的懷疑、歧視或仇視的特有眼光注視打量着他。還有些人甚至在他背後故意指指點點說給他聽：「這個人，歷來政治就有問題。看，現在他在國外犯了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錯誤，才被組織上緊急中斷他的學習弄回國來的。」後半夜，許先生苦思苦索得頭痛欲裂而困倦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即使是這樣，他也被同樣的惡夢驚嚇醒了好幾回。

第二天早上當許先生起床後，他決定今天再去一次大使館，把這個回國後將面臨的具體問題向領導匯報，並且請求組織上幫助自己解決這個問題以便使自己回國後能向國內的人和單位有個交待。

這次來大使館，許先生仍找的是高級官員胡參贊。雙方一見面，許先生就趕緊先表明自己的態度：堅決聽黨的話；堅決服從組織的按排和上級的決定，一定按期與同志們一起返回祖國去為四個現代化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隨後，許先生又向胡參贊匯報談到了自己回國後將遇到的具體問題。

見上次自己所講的那一套大道理沒能說服許先生，今天他仍跑來找自己，所以胡參贊顯得有點不高興了。因此，當他聽完許先生的話後，就用教訓的口吻說道：「唉！我說老許啊，你這個人是怎麼搞的？怎麼你還沒有從個人主義的泥潭中拔出來？我不是反復地告訴你嗎？回去，是黨的決定；是領導上的按排；也是國內我們現在搞四個現代化的需要嘛！」

正如前面所講，胡參贊這個人的烟癮很大，所以他一動用腦子來訓人，便非靠吸烟來提神不可。只見他點燃一支烟後，一邊抽着一邊又開始頭頭是道地說教道：「回去怎麼向國內的人交待？這又有什麼好擔心的嘛？我說老許啊，你可要加強政治學習，跟上形勢囉！再說，你一定要相信以小平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嘛！你看看：現在跟林彪、『四人幫』時代完全不一樣嘛！黨中央已保證不搞什麼急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也不搞什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即使是對犯有錯誤的同志，也只是批評教育，不再打棍子，也不戴帽子嘛！所以，老許啊！不要再東猜西想了！回去後，好好地

學習一下胡耀邦同志代表黨中央所做的『有關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吧！……」最後，在這次談話結束時，胡參贊順便告訴許先生：說大使館已經按排好他下個月離加回國；並且飛機票也已經為他定好了。

許先生從渥太華大使館回來之後，他的指導教授就告訴他說不久前曾為他的事向中國大使館寫過信辦交涉，但現在接到大使館的回覆說由於國內工作的需要，所以許先生不能繼續完成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習而要立即回國。並且，中國大使館還表示將從中國重新另派一人來跟隨這位教授學習。

當許先生講完這些事情後，指導教授對他連連搖頭，並表示不理解為什麼你們的政府連純科學和技術性的事務都要干涉？而且為什麼個人連決定自己是否應該學習的權力都沒有？在此順帶提一下的，是該位教授相當親華，他不僅與中國當局的關係很好；而且幾乎年年都要到中國大陸去講學和參觀訪問。

另外，許先生此次回來後，也開始聽到一些在此地的其他中國留學生對他的事情的議論。個別膽大和有正義感的人告訴他說：「老許，你之所以被提前弄回國去，還不是有人向大使館打了『小報告』，說你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有問題……」

留學生們的議論，當然給予了許先生思想上很大的壓力。可還沒等他從這些沉重的思想包袱中解脫出來，他又面臨着另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每個公費留學生或訪問學者臨回國之前必須要做的事——個人自我鑑定。

通常，我們中國留學生都由七至八人組成一個政治學習小組。按大使館的規定學習小組必須每週開一次會，學習和討論新的中央文件或報刊雜誌。而每個留學生表現的好壞，則也要看他是否積極參加每週一次的小組政治學習了。所以，許先生的鑑定，也就必須由小組評定和通過。其具體程序則為：先個人宣讀自我鑑定；然後是小組意見；蒙特利爾市的中共黨支部意見；最後才是大使館黨委簽署意見。

當然，許先生的自我鑑定，也像以往返國的留學生一樣，盡管對政治一竅不通，但也不得不來個「臨陣磨槍，不快也光」。那就是臨時找一些最近期國內出的報紙看看抄抄；並也請教一些政治覺悟「高」的人指點指點；最後再加進諸如能積極參加政治學習；熱愛黨中央；擁護四個堅持等所謂突出政治之類的陳詞濫調，那麼自我鑑定在政治學習小組裏便不難通過了。

可是，當許先生看到鑑定表上的大使館黨委意見這一欄時，他意識到了這欄意見的重要

性。因這欄帶有權威性的鑑定，就像一份判決書一樣決定着每一個回國的人的命運和前途。所以許先生此時竟存有一份天真的幻想。他想如果大使館領導能如實地在此欄裏寫明他之所以中斷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習，是組織上的安排和國內單位工作的需要，那麼，自己回國後也能夠向人們交待自己在國外並沒有犯任何政治上或生活上的錯誤，因此也就能放下心來不必為將來擔驚受怕了。第二、自己現在正在做的這個課題剛好做了一半，要是如果自己能夠爭取到把這個課題做完再走，那麼快要到手的研究成果也不會白白扔掉，對國家和對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也有好處。第三、更重要的是，如果上級領導批准了做完這個題目再走，那自己就將比別人晚返回國內一個多月，這也就說明我並沒有犯任何錯誤，黨和組織上仍然還是信任我。

就這樣，許先生抱着最後一線希望，第五次來到了渥太華的大使館。

第一次，大使館是由胡參贊和程處長兩人出面接見許先生。還是像往常一樣，胡參贊滔滔不絕地說教，而程處長只是抽着香烟很少發言。

當許先生對這兩位領導同志談出自己的兩個心願後，奇怪的是胡參贊這次沒有批評他還在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泥潭中計較盤算，而是用強裝出來的笑臉給許先生打保票道：「老許啊！你就放心好了。你的導師的工作由我們負責去做好了。而且國內我們已打過招呼了，你就放心地回去吧！我們保證你不會有什麼問題的！鑑定意見你也放心好了，一定會很好的，另外，你不是說你現在正在研究的課題有苗頭了嗎？那很好嘛！帶回國去一樣地搞嘛！再說，搞出來了後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成果，更好以更大的成績向黨貢獻嘛……」

胡參贊今天的態度之所以這樣好，自然也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盤。他想的是只要你許某人能按期返回國內去，那我份內的工作也就圓滿地完成了。至於你回去以後怎麼樣？那既不是我份內的事，而且就算是我想管也管不着了。所以現在為了完成這事，態度好點，笑臉相迎說點好話許點願又有何妨？

胡參贊講完之後，程處長也講了幾句，其講話的大意也與胡的話差不多，均是要許先生放心地回去好了；並保證他回去後不會有什麼問題發生，應當相信組織上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等等。

聽了兩位領導的這番許諾帶打保票的話，許先生渾身頓感一熱，他做夢都沒有想到使自

己多天來擔驚受怕和坐臥不安的大問題，今天竟會如此順利和妥善地得到解決。領導上不僅答應鑑定意見沒問題會很好，而且還保證他回去後也不會有什麼麻煩。所以，他除了十分感動地向兩位領導表示萬分感謝大使館黨委和諸多領導同志對自己的幫助關懷外，並且還當場向這兩位領導同志表示了自己回國後，一定要聽黨的話，好好工作，努力學習和要為「四個現代化」貢獻出自己全部力量的決心。

聽了許先生所表的決心後，胡參贊心中認為可謂大功告成也。於是神情為之一鬆，談話也就顯得隨便起來。不知他是為了顯示一下自己這個領導對許先生一直是非常關懷，還是想乘此說明一下許先生突然被召回國的事是與大使館黨委領導絲毫無關，總之他用半表功和半發牢騷的口氣說道：「老許啊！我們都知道你是一個好同志！而且我們的心情何嘗不是與你一樣。為了你繼續在加拿大唸完博士學位的事情，老程和我曾與國內的教育部交涉了多次，也要求教育部給我們理由來做說服工作……」講到這裏，他手中的香烟剛燃完了。

「唉！」當胡參贊重新點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後重重地嘆道：「老許啊！誰叫你五七年的時候犯過錯誤被錯劃成了右派分子呢！說來說去，國內要你馬上回去，還不是因為是這個老問題嘛！」

胡參贊的話，猶如當頭一棒，差一點把許先生給擊暈過去。他像一下子掉進了冰窟裏，剛才為之一暖的身體此時也忽冷忽熱地打着寒戰。他面色蒼白，額頭上也冒出了汗。

看見許先生一下子臉色大變和冷汗直冒的樣子，胡參贊還沒有察覺到是剛才自己的那幾句話所造成的，這也許是他認為像老許這樣典型的逆來順受的知識分子，從來就對上級領導的話，只有老老實實地點頭聽從的份兒而不能有其他別的想法。所以見狀之下，他和程處長兩人同時問道：「老許，你怎麼了？是不是病了？快叫醫生看看！」

不一會兒，程處長帶着一位外來的醫生來了。但此時，許先生已從剛才那致命的一擊中緩過氣來。他用虛弱的聲音說道：「我沒有什麼！主要是昨天晚上在研究室呆得太晚了，今天又一大早起來這裏，太疲倦了。我的身體一直都不好……」

經這位醫生初步檢查後證明許先生確實沒有什麼大的急病之後；並在休息一會兒後在許先生的再三堅持要求之下，大使館的人也就同意了讓他離開大使館返回蒙特利爾去。

（未完待續）

# 民運戰士之歌

——聶紫（洛杉磯）

民主自由  
不是炫耀的口號  
身在海外  
不是爲了躲避槍刀  
× × ×  
不要忘記  
你需要民主自由  
等待你的  
是更不自由的監牢  
不要忘記  
你高呼民主自由  
回答你的  
是更不自由的鎖銬  
× × ×  
誰無父母  
誰無妻女  
誰無所愛  
誰無所求  
爲民主自由獻身的戰士啊  
當你成爲一名囚徒  
失去一切的時候  
在那黑暗的牢房  
你想些什麼——  
當你餓得骨瘦如柴  
雙目失神  
拖不動鐵鏈的時候  
面對蒼茫的四壁  
你想些什麼——  
當你皮開肉綻  
神經由痛而木  
昏倒在地  
驀然醒來  
臥在自己的血泊中  
你想些什麼——  
當寒風刺透心房  
只能向陽光和時間告別  
伴隨你的  
是被拖拉的脚步聲  
押赴刑場的時候

你想些什麼——  
衝鋒陷陣非容易  
生死搏鬥更艱難  
× × ×  
人類爲求得民主  
拋擲了多少頭顱  
人類爲爭取自由  
揮洒了多少鮮血  
換來的仍是封建王朝  
爲什麼昔日的革命者  
却比他的壓迫者更殘暴  
既得的利益  
難以丟掉  
虛假的榮耀  
怎肯輕拋  
你是否  
有朝一日大權在握  
也會對後來的革命者  
使用屠刀  
× × ×  
你爲  
如何取得民主  
嘔心瀝血  
更要爲  
如何保障民主  
縝密思考  
什麼形式完善  
那種制度更好那種制度更  
必須有哲理作指導  
× × ×  
民主自由的前途啊  
艱巨遙遠  
民主戰士的責任啊  
偉大崇高

十一、廿九晨四時

※作者聶紫：來自大陸，曾因寫詩被打成  
“反革命”入獄三次。

## 名譽編輯簡介（二）

- 楊 靖 一九四六年生於湖北江陵縣，現年三十七歲。一九六二年初畢業於北京第三中學，此後一直在工廠當工人，被捕時在北京軋鋼廠工作。楊靖參與出版《四五論壇》，但觀點較徐文立激烈，主張在中國必須實行徹底改革。八〇年十一月，他協助復刊《四五論壇》，堅持要繼續辦報，成為該刊主要負責人，並參加《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出任該刊領導成員之一。他曾以大量篇幅要求當局釋放劉青。《四五論壇》後來成為華北地區最有影響力的民辦刊物。
- 陳爾晉 一九四五年生於雲南宣威，現年三十八歲。雲南省活躍的民運人士，也是國內民運隊伍中為人熟知的理論家。他只受過小學教育，長期生活於社會最底層，使他了解各種社會問題。他把自己對社會的觀察與理論探討的心得化為文字，從七四～七六年寫成了《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書，後投寄學術機構不但沒有回音，七八年初反被捕入獄，受到嚴刑拷毒。七九年四月獲釋，在北京加入《四五論壇》的民刊工作，該刊七九年六月特出專刊載其著作，以廣博散。八一年四月的大逮捕中，他又第二次入獄，至今下落不明。
- 任曉町 一九四四年生於無錫，現年三十九歲，已婚，有一女。由於政治陷害，一直處於待業狀況。七九年一月一日，他創立了《中國人權同盟》，一月五日貼出了《中國人權宣言》，一月二十九日發動了第一次民主討論會。任曉町執筆起草《中國人權宣言十九條》，並主編《中國人權》刊物，積極參加營救傅月華的活動。七九年四月四日任曉町在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其文第一句便是“民主的敵人已開始進攻……”。任曉町和其他人權同盟成員郭樹華、高山和李偉當場被公安人員逮捕，至今下落不明。
- 孫 豐 一九四三年生於青島，現年四十歲。在青島草制工藝品廠當工人。七九年三月在北京張貼大字報後又返回青島，同年八月在本地創辦了民刊《海浪花》。此刊在八〇年又與安陽的《民主磚》出版合刊。《海浪花》積極聲援波蘭團結工會，強調多黨制的必要性。孫豐的文章主要是《就目前形勢致晏仲平的信》和《信仰道德青年》。他認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黨官僚體制。他指出中國之所以貧困的原因在於不民主，沒有民主則不可能有現代化。他對馬克思主義中的人文主義的成份給予充份肯定。他於八一年四月十日被捕，至今下落不明。
- 何 求 一九四八年生於廣州市，現年三十五歲。一九六八年進入廣州造船廠任技工。七三年因在書信中評論政局，被官方截查信件時搜出，立即判刑三年入獄。七六年底出獄。七九年四月即加入《人民之聲》從事民刊出版工作。同年九月，他從《人民之聲》分出，又創辦了《人民之路》。八〇年九月《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在廣州成立，何求擔任機關刊物《責任》的首任總編輯，當時，他因此事又被捕入獄。拘押半個月後獲釋。八一年四月，各地民刊負責人雲集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活動後，一一被捕。何求也在家中再度被捕，後被判決七年徒刑。
- 張京生 一九五四年生於湖南長沙市，現年二十八歲。在長沙市新中機械廠當工人。張京生是民辦刊物較早的活動份子，他於七七年便開始籌辦民刊《流浪者》。八〇年三月，他將主編了七期的《流浪者》改為《共和報》，和官僚特權展開鬥爭，反對當局的鎮壓行動。八〇年九月他赴廣州參加了全國民刊協會籌備會議，但被捕入獄。獲釋後，他仍然積極參加民運活動，支持聲援湖南師範學院學生的競選運動。他主辦的《共和報》及時地把此消息傳遍各地。八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他遭到公安人員的逮捕，至今下落不明。

CHINA SPRING

TABLE OF CONTENTS

Vol.1 No.2 February 1983

SHORT COMMENTARY.....China Spring Commentator

China Spring commentator reflects on rec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China, and traces the growth of the "China Spring" Democracy Movement during the past few months.

EDITORS&READERS  
\*\*\*\*\*

RESPONSE TO AND CLARIFICATION OF CERTAIN QUESTIONS.....Li Lin

The chief editor Li Lin would like to clarify certain questions which are critical and even slanderous of China Spring. China Spring has no tie with any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China Spring is a completely independent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PLANNING SYSTEMS OF VARIOUS "SOCIALIST" COUNTRIES..... Guan Weihong

An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of five so-called "socialist" economic planning systems. The author's conclusion is that China's present economic system is not a truly socialist one, but rather a system based on privileges monopolized by the State-Party bureaucratic class. This is an exploitative system. The precondition for establishing China's future economic system i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bureaucra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EXPERIENCE & LESSONS  
\*\*\*\*\*

WHAT DID THE "PRAGUE SPRING" TEACH US ?.....Lu Feng

This article looks back at and summarizes the lessons and experience of the 1968 "Prague Spring" reform movement and compares this movement with China's present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The conclusion from this comparison is that China at present does not hav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allow the successful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s from the top down.

THE LOGICAL PATH.....Wang Min

Wang Min, one of the activists in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Canton and a close friend of Wang Xizhe, discusses the transition from "Beijing Spring" to "China Spring". One of the basic weaknesses of "Beijing Spring" was its theore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immaturity.

LETTERS TO THE EDITORS  
\*\*\*\*\*

A few letters were selected from among the thousands received to represent several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PINIONS & ISSUES  
\*\*\*\*\*

THE VALIDITY OF HU YAOBANG'S GUARANTEE.....Ouyang Ping (China)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questions the ability of HuYaobang to keep the promises he made to the Chinese people guaranteeing ten year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UNTIL ONE'S DYING DAY".....Zhao Xiaoqing (China)

A difficulty facing the 12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is the problem of organization. The 12th congress was un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s as it had planned. The old guard from the conservative faction refused to retire.

CAST AWAY ILLUSIONS: OUR EXPECTATION OF CHINA SPRING.....  
.....Li Wentong & Zhou Zhenqin (China)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should be a revolution from below, and not a reform from above. The future social system in China should be a pluralistic and democratic socialist system.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should be a peaceful mass revolution but the people must prepare for any possible violent repression by the ruling class.

THE "CENTRE DAILY NEWS" IS NOT "CENTERED".....Hu Heng & Xiao Da

The biased stance of a self-claimed impartial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 is grossly amplified in its treatment of "China Spring". Its role as an eager mouthpie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exposed.

"EARTHQUAKE" AT THE "CENTRE DAILY NEWS".....(Reprinted from HuayuKuaibao)

A giant rift in personnel occurred within the "Centre Daily News" when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staff refused to follow the order of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to report negatively on "China Spring" or not at all.

THE HISTORICAL MISSION.....A new immigrant from the PRC

To struggle for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rule by law in China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our generation.

NOT EVEN A PRAIRIE FIRE CAN DESTROY THE GRASS, IT GROWS AGAIN WHEN SPRING BREEZE BLOWS.....Editorial board of Xiaocao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from the editorial board of Xiaocao, an underground mainland Chinese journal to the editorial board of "China Spring"

A SMALL CHANGE; A BIG DIFFERENCE.....Yi Ding (Hong Kong)

A discussion of an article from the "Red Flag" criticising Mao's opinions on art.

LITERATURE & ART  
\*\*\*\*\*

WHY DID HE APPLY FOR POLITICAL ASYLUM? (PART I).....Mu Mu

A true story about Mr. Xu, a Chinese government sponsored student, was forced by circumstances to apply for political asylum.

THE SONG OF THE DEMOCRACY MARCH.....Nie Zhi

A poem on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 第一號公告

1982-12-13

「中國之春」雜誌創刊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開展以來，各地志同道合者紛紛響應。爲了運動進一步推展，「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決定在各地設置聯絡站。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重申，「中國之春」運動堅持獨立立場，不受任何黨派的左右。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真正實現民主與法治、自由與人權。我們主張用民主與法治推動中國問題的解決，推動大陸與台灣的統一，推動香港問題的解決，推動海外華人現存問題的解決。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重點是在中國大陸，其任務是導致中國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在海內外，推動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形成。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實行開門政策，凡贊成「中國之春」觀點及立場的個人及團體，包括中國大陸留學生，台灣及香港留學生、僑胞、越棉寮難胞、大陸新移民及其組織，均歡迎加入「中國之春」或與「中國之春」配合行動。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採取向前看的態度，不管過去持何種政治觀點及立場，只要現在贊成在海峽兩岸推行民主與法治，用民主與法治促進中國統一及解決香港問題，就歡迎加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認爲，參加運動不分先後，早參加早歡迎，晚參加晚歡迎，不參加而同情、支持這一運動，亦表示歡迎。我們尤其歡迎對「中國之春」運動提出批評意見及建設性建議。

「中國之春」聯絡站活動宗旨如下：

一、宣傳「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觀點與立場，聯絡、匯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斷壯大組織力量。

二、協助發行「中國之春」雜誌，並爲「中國之春」雜誌寫稿、組稿。

三、根據各地實際情況、組織國是討論會及演講會。利用一切形式、包括文藝活動、聯誼活動等，擴大宣傳。

四、服務海外華人，如幫助大陸留學生、新移民解決入學、就業、居住等問題。

五、運用各種渠道做到外情內達，內情外達，將「中國之春」雜誌及信息傳入中國大陸，並協助將國內消息及稿件帶到國外，以促進

國內民主運動的發展。

六、爲「中國之春」籌款。

七、定期向「中國之春」總部匯報并向其他兄弟聯絡站交流活動情況。

現在，蒙特利爾聯絡站、紐約聯絡站、華盛頓聯絡站、休斯敦聯絡站、洛杉磯聯絡站及舊金山聯絡站已經成立，並開始工作。北美其它各地以及香港、日本、歐洲的聯絡站正在醞釀成立。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希望各地有志於變革中國社會並贊成「中國之春」觀點的朋友，向總部及附近聯絡站進行聯絡。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希望在尚未建立聯絡站的各城市的同胞們、朋友們動員起來、聯合起來，並同行動。

總部聯絡地址：

(1) P.O. 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3K3

(2) 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蒙特利爾聯絡站：聯絡地址：

P.O. 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紐約聯絡站：聯絡地址：

39 Bowery Box 441  
New York N.Y. 10002  
聯絡電話：212-226-9677

華盛頓聯絡站：聯絡地址：

P.O. Box 33306  
Washington D.C. 20033

舊金山聯絡站：聯絡地址：

1827 Haight St.  
Box No. 100  
San Francisco CA. 94117  
聯絡電話：415-751-7094

洛杉磯聯絡站：聯絡地址：

P.O. Box 1789  
Momrovia, CA. 91016-5789  
聯絡電話：213-675-9575

休斯敦聯絡站：聯絡地址：

P.O. Box 42821 No. 806  
Huston, Texas 77042  
聯絡電話：713-879-7107

#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 第二號公告

1983-2-8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第一階段工作，是重新樹起民主運動的大旗，鼓舞海內外民主人士的士氣，在北美建立聯絡站以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們宣佈，第一階段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

按原訂計劃，「中國之春」雜誌主編李林及「中國之春」舊金山聯絡站領導小組成員馮斌於元月上旬赴港，進行具體的工作。在香港各界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下，各項預訂工作進展十分順利。

「中國之春」認為，香港是國內與海外民主運動進行聯繫的一個樞紐，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中國之春」民運總部向支持和聲援國內民運的香港各界人士致以崇高敬意并表示深切感謝。香港同胞一向具有優良的革命傳統，在中國近代史上人民爭取民主與自由的奮鬥中，香港同胞做出過極大貢獻，起到過獨特的作用。在過去「北京之春」民主運動開展時，香港各界人士曾給於「北京之春」多方面的支持。王希哲等民運戰士被捕後，香港同胞更是冒着危險進行聲援、營救活動，出現了很多動人的事蹟。這些，都將載入中國民主運動的史冊。香港同胞自覺支持國內民運的種種努力，也給予了我們海內外民運人士極大的鼓舞。我們「中國之春」熱切希望香港同胞繼續給予民主運動以人力、物力、智力和財力的支持。

「中國之春」和香港各界人士一樣，關注一九九七和香港的前途。我們認為，香港的美好前途，不能靠乞求獲得，而應靠香港人民團結奮鬥而獲得。香港的民意必須充份表達并受到尊重。我們也願指出，香港問題之所以嚴重，香港同胞之所以憂慮香港的前途，其源概出於中國大陸現存社會制度的專制與腐敗。因此，中國大陸問題解決不了，中國社會制度不加以根本變革，香港的前途問題也就得不到圓滿解決。從這一點講，香港各界人士，不畏懼共產黨的強權，積極聲援和參加國內民主運動，把祖國的前途和香港的前途聯繫在一起，是有膽識，有遠見的。我們共同的結論只有一個：唯有爭取祖國的光明前途，才有香港的光明前途。

爲了今後在香港持久的開展工作，「中國之春」民運總部在香港建立了聯絡站。該聯絡站的中心任務是宣傳「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觀點和立場，聯絡香港各界志同道合的朋友，進行國是及香港前途問題的探討。今天，「中國之春」民運總部核心小組成員，「中國之春」雜誌主編李林和「中國之春」民運發言人王炳章分別在香港和北美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中國之春」香港聯絡站成立，并已開始工作。鑑於目前香港的特殊情況，凡欲與香港聯絡站聯繫者，請寫信給下述信箱：

P.O. 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另外，我們同時宣佈，又有一批新的「中國之春」聯絡站建立并已經工作，今天宣佈以下幾個聯絡站，希望當地志同道合的朋友聯繫。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聯絡地址：P.O. Box 1259

701 West Hastings

Station A

Vancouver B.C. V6C 2T1

美國猶他州暨鹽湖城聯絡站：

聯絡地址：P.O. Box 11264

Salt Lake City

Utah 84147

美國亞利桑那州暨圖森聯絡站：

聯絡地址：P.O. Box 42561

Sun Station

Tucson Arizona 85733

聯絡電話：602-795-2172

美國匹茲堡聯絡站：

P.O. Box 7122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15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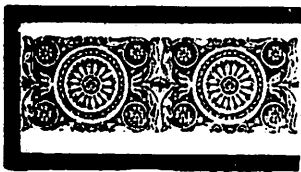
聯絡電話：412-681-7279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站：

P.O. Box 1679

New Branswick.

New Jersey 08903



# 編後語



本刊的這一期，衝破了種種困難，終於又和大家見面了。放下編筆之前，我們的第一句話，就是向全美、全中國、全世界各地的關心和愛護我們的讀者表示衷心的感謝。從你們的身上，我們更加感覺到了中國民主的希望。本期特地從千百來信中摘編了十五封刊登出來，不成敬意。

本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本刊主編李林就外界一些關於中國之春的謠傳寫的「對一些問題的澄清和回答。」和本刊評論員文章「民主現代化的第一步」。

本期刊登了二篇理論性較強的文章，一篇是關微宏的「社會主義各國計劃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對五種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作了考察和比較。一篇魯楓的「布拉格之春告訴了人們什麼？」回顧總結了「布拉格之春」的經驗和教訓，並與中國目前的經濟、政治、社會作了比較。本期原還打算刊登中國訪問學者李蒙即將發表在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 上的學術論文「毛以後的中國經濟改革」，但因版權手續尚未完成，只好留給第三期了。理論上的探討是本刊長期性的最重要的工作，我們將繼續加強這方面的份量。

本期還有幾篇文章可讀性很高。一篇是廣州的民運戰士，王希哲的戰友汪岷的文章「必由之路」，談到了從李一哲到中國之春的經驗

和教訓。一篇是趙小青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談到了中共「十二大」組織路線的一大難題。我們欣喜地收入了中國大陸的民運的來稿，周正欣、李文通的「丟掉幻想」和新創刊的地下民刊「小草」編輯部的賀信。我們期望更多的尖銳深刻的短文來豐富中國之春的雜文園地。

本期的爭鳴園地刊登的中國公費留學生王紹光的來信，和李浩然的「答王紹光書」，將會引起不少讀者興趣。中國之春不害怕任何的批評，相反，我們歡迎批評和爭論，我們認為任何真理都是爭論出來的。

最後，本期還登載了一篇小說—報告文學—「我為什麼要申請政治避難」，記敘一個中國公費留學生被逼走上申請政治避難的真實故事。另外，我們登了聶紫的詩歌。中國之春並不是一個純政治的刊物，文學藝術與政治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我們呼籲有良心的文學藝術家們加入到民主陣綫，作出貢獻。

我們是一群在學的年輕人，雖被目為「狂妄」，却實還有一點自知之明，我們深深知道，中國之春的责任重大遠遠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因此，懇請各界批評指正，就不是一句客套話了。

## 徵稿啟事

一、本刊的政治立場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二、本刊的辦刊方針是公正、開放、客觀、實事求是。

三、本刊文字以政論為主，兼顧文藝以及各類作品。

四、各種不同政治觀點的來稿都不影響編

輯取捨。凡文字與中國民主運動有深遠關係的作品，將優先採用。

五、來稿用原稿紙書寫，翻譯稿要附原文。

六、來稿不退。

七、地址請寄 P.O. Box 243

N.Y. N.Y. 10185 U.S.A.

本刊編輯部



A/p

The people Wogohina